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总第117期

1993 · 2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年—1992年出书要目——

《改革开放中广东党的建设》	傅锐主编, 曾东汉、 陈丁福副主编	3.60元	1991.5
《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	方锐、刘福祥主编	4.20元	1991.6
《党员教育概论》	刘应山主编, 谢国雄、 侯外林副主编	精: 4.50元 平: 2.50元	1991.5
《党员管理导论》	方锐、刘福祥主编	3.80元	1992.11
《光辉的历程——广东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	黄浩主编	5.00元	1991.11
《沿海开放地区党建研究——沿海经济 开放地区党建工作研讨会文集》	张永德主编	7.00元	1992.5
《论新时期共产党的素质》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 建教研室主编	3.50元	1991.5
《邓小平在广东》(大型画册)	刘陶主编 梁伯权摄影	80.00元	1992.5
《广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践》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广东省人事局编	5.00元	1992.8
《新的足迹——广州青年工作研究文集》	易佐永顾问 余世喜、 王志雄主编	4.80元	1991.2
《历史主体的弘扬——社会主义与群众 路线》	张先贤、孙志东主编	4.00元	1991.11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简论》	梁木主编 薛克媛、孙 志东副主编	4.60元	1992.12
《社会主义更新、完善、发展的辩证法》	张江明主编 李辛生、 巫贵均副主编	2.60元	1991.7
《社会开放学引论》	李恒瑞主编	4.00元	1991.12
《改革开放的轨迹——广东省十年地方 立法》	陈兆中、程信和主编	5.50元	1991.10
《行政复议理论及应用》	林炎章主编	3.85元	1992.5
《领导工作与社会协调》	钟阳胜著	3.20元	1991.5
《社会主义社会稳定、矛盾、改革的辩证 证发展》	张江明主编 梁渭雄副 主编	6.50元	1992.6
《回归自然——道家的主调与变奏》	冯达文著	4.60元	1992.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特区建设》	黄兰淮主编 陈维烟、 张木明、郑俊钦副主编	2.50元	1991.10

《保安全管理学》	骆鉴华、刘育檀、陈锦泉主编	6.50元	1992.8
《现代中国税务管理之路》	陈流明主编	5.60元	1992.6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美]傅高义著 凌可丰、丁安华译	7.80元	1991.5
《广东改革开放研究丛书》			
(1)《战略性的突破——广东农村改革概述》	马恩成主编	4.30元	1991.10
(2)《广东改革开放评说》	王琢、文武汉等著	7.40元	1992.8
(3)《起飞的轨迹——广东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梁桂全、沈贵进、吴金华、陈祖煌著	7.40元	1992.6
(4)《珠港澳经济一体化》	冯平、刘季芸、张信源、田晓霞等著	5.50元	1992.6
《亚洲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1)《泰国的农业工业化道路》	林志鹤著	3.70元	1992.6
(2)《香港的第三产业》	华青、邓瑞林、吴天青编著	4.40元	1992.4
(3)《南朝鲜经济发展战略演变》	刘永焯著	4.20元	1992.4
(4)《台湾的民营经济》	陈恩著	4.30元	1992.4
(5)《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	陈乔之、曹云华著	4.00元	1992.4
《当代岭南学术论丛》			
(1)《质量经济学概论》	郭克莎著	6.80元	1992.2
(2)《外向经济论》	王珥著	(精)5.40元	1992.2
(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从非商品经济论到商品经济论的发展史》	杨永华著	9.80元	1992.11
《反通货膨胀论——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	刘涤源主编	(精)6.50元	1992.4
《崛起中的中国农村股份合作经济》	于幼军著	8.10元	1992.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将领传》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平)9.00元	
		(精)11.00元	1991.5
《莲花山风云》	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5.80元	1991.5
《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	胡提春、曾庆榴主编	5.70元	1991.8
《方方文集》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主编	15.00元	1990.12
《珠江纵队史》	本书编写组编著	(平)5.50元	
		(精)6.50元	1990.10
《粤桂边纵队史》	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本书编写组编	(平)5.50元	
		(精)7.50元	1992.7

《百团大战始末》	王政柱著	3.35元	1991.5
《怀念王作尧将军》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6.00元	1991.9
《抗战时期的粤北学运》	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等编	5.00元	1991.11
《怀念许士杰》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7.00元	1992.10
《叶挺独立团史料》(广东革命史料丛刊之一)	叶挺独立团纪念馆编	6.50元	1991.1
《南路特委与张炎将军》(广东革命史料丛刊之一)	中共吴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4.80元	1991.12
《东征史料选辑》(广东革命史料丛刊之一)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1992.12
《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7.00元	1991.9
《中共韶关党史大事记》	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3.00元	1992.8
《大亚湾风云》	中共惠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8.20元	1992.4
《赤石暴动革命烈士传》	中共武夷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5.00元	1992.5
《珠海人物传》	珠海市政协编	5.10元	1992.9
《东纵北江支队战斗历程》	本书编写组	6.30元	1992.6
《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男人》	肖黎、马宝珠、吕延涛主编	11.50元	1992.11
《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女人》	肖黎、马宝珠、吕延涛主编	9.50元	1992.11
《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洋人》	肖黎、马宝珠、吕延涛主编	9.20元	1992.12
《心理学文集》	吴江霖著	5.50元	1991.12
《达志文集》	魏达志著	10.00元	1992.3
《广州年鉴》(1991年)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	35.00元	1991
《珠海年鉴》(1990年—1991年)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	45.00元	1991
《汕头经济特区十年》(1981—1991年)	本书编纂组编	28.00元	1991
《广东年鉴》(1992年)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		1992
《深圳经济特区年鉴》(1991年)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	40.00元	1991
《珠海年鉴》(1992年)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	50.00元	1993
《广州年鉴》(1992年)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	48.00元	1992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93年第二期 (总第117期)

主编: 梁渭雄 副主编: 张硕城 刘斯翰

· 科 学 技 术 ·

社会科学性质功能与改革发展的讨论

..... 梁渭雄 叶汝贤 张尚仁 郑炎潮
范 英 张华夏 邹永图 丘 挺 (5)

充分发挥科学的生产职能作用 卢黄熙 (21)

· 经 济 ·

对广东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评估 梁 钊 (26)

论市场经济的特征 杨 敏 (32)

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基本特征 严庆和 代 航 (36)

对按劳分配的新认识 高伟梧 (41)

生产资料流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赵玲玲 (44)

关于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问题的探讨 谢礼生 曾昭武 (47)

特区房地产业发展初探 张 旗 (52)

· 哲 学 · 党 建 ·

谈谈调查研究的几个问题 冯灼峰 (55)

论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现实活动的统一

——兼谈对哲学应用的理解 陆杰荣 (60)

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初探 章海山 (65)

小议阶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 钟立功 (70)

珠江三角洲党的建设的特色 陈嗣伯 (72)

·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历史 ·

- 文化共识与中国近现代民族凝聚力刘宗碧 (74)
- 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发展章权才 (78)
- “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述要孔庆榕 (82)
- 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天 祥 (83)
- 论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刘泽华 侯东阳 (88)

· 文 学 ·

- “文学与市场经济”会议文摘 (93)
- 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钦 鸿 (102)
- 论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美学特征王本朝 (108)
- 论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张惠民 (114)
- 司空图的审美图式论孙汉生 (119)
- 记中山大学馆藏海内孤本《韵玉函书》陈定方 (123)

· 教 育 ·

-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王 蕙 余洁薇 (127)

· 书 评 ·

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可贵探索

- 评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陈跃飞 (133)

ACADEMIC RESEARCH

No.2, 1993

CONTENT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Reform of Social Sciences.....	Liang Weixiong, and Others (5)
Giving Full Play to Sciences in Production	Lu Huangxi (21)
An Basic Apprais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Guangdong	Liang Chao (26)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 Economy	Yang Min (32)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Persons Engaging in Socialist Economy	Yan Qinghe and Dai Hang (36)
Some Ideas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Gao Weiwu (4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lation of Production Means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Zhao LingLing (44)
Conditions for Renminbi to Become a Free Convertible Currency	Xie Lisheng and Zeng Zhaowu (47)
A Primary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Zhang Qi (52)
A Brief Talk about Several Problems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Feng Zhuofeng (55)
The Unity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hilosophy and the Realistic Activities of Non-philosophy --- also concer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ic application.....	Lu Jierong (60)
An Initial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thic Thoughts.....	Zhang Haishan (65)
A Simple Talk about the Unit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Zhong Ligong (70)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Emerg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en Sibo (72)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Liu Zongbi (74)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during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Quancai (78)
Main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Chinese National Ethos and Cohesion"	Kong Qingrong (82)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Tian Xiang (83)
On the Concepti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Lineages of Both Chinese Emperors and Confucian School	Liu Zehua and Hou Dongyang (88)
Abstracts Discussing "Literature and Market Economy"	(93)
A Brief Talk about the Research by Chinese Mainland upo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Qin Hong (102)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Contem- 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Benchao (108)
About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Poetics upon the Theory of "Ci" Put Forward in the Song Dynasty	Zhang Huimin (114)
Sikong Tu's Theory of Aesthetic Patterns	Sun Hansheng (11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nly Existing Copy of a Chinese Phonetics Dictionary "Yun Yu Han Shu" Kept in the Library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Chen Dingfang (123)
Necessities of Strengthening the Section of Citizen Consciousness in Character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People	Wang Hui and Yu Jiewei (127)
A Valuable Approach to Establishing a New Modernizational Cultural System — a comment on "Cultural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by Li Zhonggui	Chen Yuefei (133)

社会科学性质功能与改革发展的讨论

编者按：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指导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科学的新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及其地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求社会科学工作的改革和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为此，广东省社科联及本刊于最近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本刊开辟专栏，将会上的发言摘要予以刊载。我们希望学界同仁、广大读者都来关注这个讨论，积极投稿，参与争鸣。

要全面认识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功能

梁渭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科学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正在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功能，发挥着它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作用。党的十四大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一个十分正确十分重要的方针。

但与此同时，当前也还存在着淡化社会科学的倾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功能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片面的“唯意识形态”论的传统观念上；同时，也看不到现代大科学的新发展。

邓小平早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文选》第45页）继后，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我国的功勋科学家钱学森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哲学研究》1991年第8期）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科学的新认识。它冲破了长期来束缚着人们思想上对社会科学认识的“唯意识形态”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科学发展新时代中社会科学的新状况新功能，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全面功能和重要作用提出了新的思路。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必须坚持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发挥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科学首先是科学，具有着科学的共同本质。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从科学的本质意义上来说，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这个“有力杠杆”和“革命力量”，首先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确立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光辉思想。随着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这一光辉思想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概念、原理、学说、设计方案、管理方针和操作技术等的特殊生产部门(产业部门)，它的成果不仅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社会物质生产的设计、过程和效果等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改造作用。在生产力发展中所体现的科学力量里，不仅有自然科学所造成的技术进步力量，而且有社会科学(特别是如经济科学、管理科学、边缘科学和社会技术等)所提供的决策、运筹和技术力量。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当包括社会科学。当然，不同的学科对社会生产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促进方式和作用状况有所不同，有的直接些，有的间接些；有的可以量化，有的较难量化。但必须肯定，社会科学是具有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学科，其意识形态性是很鲜明的，其功能主要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包括的社会科学，并不是指社会科学的全部所有学科，而是从社会科学的本质意义上来说的，是从部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密切关系来说的。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科学的确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既要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来说明；也应该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我们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大科学观，全面认识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功能，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社会科学越来越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

叶 汝 贤

钱学森教授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我非常赞同钱老这一看法。

当然，钱老不是说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生产力。因为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非常复杂的，它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门类、学科，有的学科(如基础理论研究)仍然远离生产过程，把它们归属生产力范畴是不适宜的。但是，从社会科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看，它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它越来越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却是人们不容怀疑的历史发展大势。

从生产力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并非一开始就成为生产力。在科学产生之前,人类的生产依靠的是体力、直接技巧和经验的积累。科学产生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未对生产的发展产生有效的影响。在古代,只有一门科学——哲学,才高踞于生产过程之上。往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但此时它也只能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马克思认为,古代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从属于劳动者的直接技巧,只是到了近代才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从这个时候开始,科学才结合到整个生产过程中,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才成为生产力构成的实质性要素,科学才成为生产力。(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由于科学技术的参与和愈来愈取得主导地位,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依靠个人经验和直接技巧的劳动虽然还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但已变得无足轻重,科学技术越来越变成“第一生产力”。统计资料表明,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生产力增长的60%至80%依靠的是科技进步。从马克思的“科学是生产力”的命题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反映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伟大的发现。

考察社会科学发展史也可看到,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关系,同样经历这样的历史过程。如果说最初产生的自然科学还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那最初的社会科学更是远离这一生产过程。到了近代,几乎与自然科学分化为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同步,社会科学本身也分化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愈来愈密切,生产过程采用社会技术愈来愈普遍,社会科学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表现在:

第一,社会科学通过其认识、选择和预测的功能,不仅被直接地运用于制定路线和政策,而且被直接地应用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与规划。路线指引、政策导向和宏观决策是经济发展的灵魂,往往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当代经济是总体性和变动性最强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总体性和变动性表现得更为强烈。如何认识、把握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克服盲目性,保持经济高速、稳定地发展,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政府官员、智囊团、企业家们经常思考的问题。现代经济可说是一种理性经济。任何有远见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都重视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才的作用,他们不仅舍得经费上的投入,而且亲自推动社会科学在经济中的运用,他们本人往往就是应用社会科学解决经济难题的行家。

第二,近年来,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向应用方向蓬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那类同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科学的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在经济科学将近四百门学科中,就有80%以上属应用学科。连美学这类原本非常抽象的学科,也通过迅速发展起来的实用美学(如“劳动美学”、“技术美学”、“建筑美学”等)而直接结合到生产过程中去,成为增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向可操作性的方向发展,这是社会科学越来越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表现。

在讲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时,不能不谈到组织管理。组织管理

从来就是现实的社会生产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区别在于，古代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是自发地进行的，近代随着管理科学的产生，这种自发也就走向自觉，而组织管理也就成为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践证明，有效的组织管理，才能有效地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类生产力的实体性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据统计，在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生产增长0.2%，熟练劳动者增加1%，生产增长0.7%；而优秀管理者增加1%，生产则增长1.8%。（见《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第27页）由此可见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组织管理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第三，近代科学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势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技术学、工效学、创造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些学科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过程，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表明，科技的发展、科技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为社会科学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最强有力的条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表现了科学发展的综合过程。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年科学的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现在科学走向综合，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已经预见到，将来只有一门科学。从这一角度也可看到，社会科学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科学越来越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本身所要求和决定的。经济是基础、是中心，除了战争和革命年代，经济的这种中心地位，是决不能够动摇的。社会科学，除了少数学科如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以外，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围绕这个基础、中心旋转，为这个中心服务，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所以，社会科学越来越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认识不到这一点，重复重理轻文的错误，把社会科学排除在“第一生产力”之外，必然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社会科学作用问题之我见

张尚仁

从科学的发展来说，虽然科学的分化是近代才发生的事情，但自然科学具有科学的性质，早在古代已经表现出来，如古代人已能准确预见日蚀。而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认识领域，不仅历史短得多，而且其科学性也不能说已为人们所普遍地接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得到普遍承认的。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关于每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论，都歧见杂陈、争论不休甚至自相矛盾。这种状况，也就使社会科学的性质、地位、职能及其作用问题变得更加难于解说了。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化，人们要系统地改造社会，也就要求系统地认

识社会。作为认识社会的成果的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功能问题，也就再次引起为人们的重视。在最近的报刊上，有的同志提出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观点，以此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由此而引起热烈的讨论。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先分析一下这个观点是运用怎样的思路提出来的。

在人们的思维过程中，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要运用一定的概念框架的，也就是把所要思考的问题放在原有的概念框架之中。从以往的理论讨论来看，不少问题都是这样引发出来的。比如，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这种概念框架下，就提出了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并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更有甚者，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框架下，有的教科书中竟然有介事地去分析战争与石头的矛盾。我总觉得，这样提出问题来讨论，容易转移研究的重点，引发许多宽泛得多的问题争论不休，对问题本身的研究反而容易被忽视。现在提出的社会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显然也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直接引申出来的。如果就其“是”还是“不是”针锋相对地争论下去，很可能展开出科学包不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怎么样？社会科学如何影响生产力等一系列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当然也并非无助于加深对社会科学的功​​能的理解，但这样毕竟不是直接地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为重点来思考，我的意思是，社会科学的功能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但围绕社会科学是不是生产力来讨论，不见得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合理的思路。

就社会科学的功能这个问题本身来思考，我认为从一般层次上可以将社会科学的功能概括为社会认识功能。这是一般的抽象，其意义在于说明人是自然基础上的有理性的社会存在物。既然如此，人的理性就不仅要认识自然，而且要认识社会。社会科学正是人认识社会进而作为社会存在物这一功能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一般的抽象，还要具体化。将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加以具体化，我认为可以概括为论证功能、价值选择功能和方法功能这三个相互关连的层次。

社会科学的论证功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面对过去和现实的解释性论证；再一方面是面对未来的预测性论证。人类与动物不同，动物在漫长的时间中几乎是在同一水平上繁衍，人类则在历史进程中加速度发展。人类获得加速度的动力源泉，在于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正因为这是人类发展所必须的，所以人类对走过的历程和现实的进程都要力求作出解释。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社会现象作出论证性的解释，就是社会科学的功能。所谓论证性的解释，就是说无论是认为某种社会现象正确或错误，都要阐明理由。通过论证区分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之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另一更为显著的特点，还在于人类能预测和规划社会发展的未来，并通过自觉的实践去实现这种规划。这种预测和规划，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的又一重要功能。而预测和规划，更是必须论证的。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成为实践的指导，才能提高人类实践的自觉性。

社会科学的对象，涉及社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和变动性,使人们作出的解释和预测不可能是一致的。尽管每一种理论都力求提出自己的论证,而各种理论的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有的论者为社会科学的结论不能象自然科学预测日蚀时间使人们普遍相信而苦恼,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自然是无意识的,而社会则由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所构成。所以,社会的丰富多采和变动是自然难于比拟的。正因为社会科学对社会的研究能提出多种多样的理论,这才为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多种的选择。然而,理论提出的选择可以是多种的,人们在一段时期内的现实实践则只能遵循某一种理论指导。在多种理论中选取哪一种用于指导现实呢?这就要发挥社会科学的价值选择功能了。价值选择也是一种论证,但这种论证明显地包含着社会主体的目标选择。通过价值选择确定的目标,成为人们明确的指导思想,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决不能低估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几经选择,党的十四大形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其伟大意义已经在实践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通过社会科学的论证功能提供多种选择;通过社会科学的价值选择功能确定某一目标。但这都还不是目标的实现。从目标的选择和确定到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通过怎样的实践去实现目标,则是一个方法问题。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又都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方法诚然可以通过实践去摸索,但如果总是停留于摸索,社会势必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地总结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这一功能,同样是由社会科学来发挥的。

社会科学的论证功能、价值选择功能和方法功能,是在社会认识与社会实践统一的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因而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样来理解社会科学的功能,或许比概括为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更科学一些。

作者单位:广东行政学院

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

郑炎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越来越被人们承认和理解。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没有人怀疑或反对了,但是,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是否是第一生产力,怀疑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例如胡绳同志就认为:“有的同志说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对这种说法我有些怀疑。”“一般说来,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参见《人民日报》1992年11月30日)

我认为,必须在理论上承认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

人类的需求一般分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随着人类的发展,精神需求的比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而物质需求的比重相对逐渐减少。为此,人类的生产也基本上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产出物质产品,精神生产产出精神产品。进行物质生产

以物质生产力为主，以精神生产力为辅，进行精神生产以精神生产力为主，以物质生产力为辅。科学技术作为物质生产力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物质生产力的社会科学技术，主要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管理、体制，把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科学技术、工具、人以及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组织和科学的管理。物质生产过程是一个广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即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几个环节的循环和一体化过程。为此，广义的物质生产力应包括生产力、交换力、分配力、消费力。毫无疑问，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既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来推进，也需要社会科学技术生产力来推进。比如，物质产品生产出来后，要进行交换，这就需要人们掌握经济科学技术去研究认识市场结构、市场功能、市场规律，进行市场预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经济科学技术就成了直接生产力。现代物质生产过程和经济管理越来越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比如行为科学、激励机制、心理学、精神学等日益应用到物质生产过程和经济管理过程。可见，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并日益成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力。怀疑、否定社会科学是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就等于怀疑、否定人类自身的物质文明发展史。

更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技术是人类进行精神产品生产的主要直接生产力。人类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三大需求。生存需求主要是物质需求，所以，人类为了生存，首要的是进行物质生产，提供物质产品。但在此基础上，人类的享受、发展需求越来越重要，比重也越来越大。享受和发展需求主要是对精神产品需求，如音乐、文娱、艺术享受的社会化，就产生了录像机、电视机、录音带、卡拉OK机、镭射唱片、舞厅、剧院等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产品，所以，歌星、音乐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等都是精神生产的第一生产力。人们需要发展，就要获取大量的知识、信息、资料、情报，接受教育和再教育，这样，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信息情报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就成了发展精神产品的直接生产力。

人类的生产，除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外，还包括人的自身生产和再生产，即人类自身的繁衍。所以，人既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也是人生产力。人生产力既靠生理、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技术来促进人的优生、优育、健康发展，也靠性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精神学、行为学、历史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技术来解放人、发展人、完善人。可见，社会科学是人自身发展、人自身生产的直接生产力。

现代经济增长表明，经济增长(物质生产增长、精神生产增长、人生产增长)的速度与效率，不仅仅取决于土地、劳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且也取决于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选择和创新，体制也是生产要素。并且，体制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的影响作用还大于其他生产要素。前西德的奇迹主要是将军事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国80年代和近一、二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是改革开放，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如农村的承包制代替大集体、市场导向取代计划导向。新体制的选择和创新，主要是通过经济科学、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趋势进行科学的研究

分析，并且将这种科学认识转变为实施技术、对策，创造新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技术是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选择和创新的直接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和干扰，社会科学长期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被作为为错误路线服务的舆论工具，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科技人员，社会科学不是生产力。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市场机制引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已日益变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生产力，社会科学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日益为人们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已经和必将进一步与自然科学一样被人们承认为直接的生产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要理直气壮地讲社会科学是生产力

——与胡绳同志商榷

范 英

胡绳同志认为，社会科学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但一般说来“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详见《人民日报》1992年11月30日）这些观点值得分析探讨。

一、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几乎是不必证明的一般常识。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不仅是社会科学，而且还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均来自实践，受实践检验，又指导实践。这是它们共通之点。不具实践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就不是科学。凡科学，不会游离于生产力范畴之外。生产力范畴之内，自然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不亚于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的这种作用排斥在指导实践作用之外，是“唯社会科学作用”的一种“左”调。同样地，具有对实践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其生产力的成份也不低于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生产力的重要成份排斥在生产力范畴之外，是“唯自然科学生产力”的不科学态度。所以说，在生产力范畴内，不仅应有自然科学的地位，也应有社会科学的立足处。不然，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与不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自然科学却属于生产力，这些相互矛盾的逻辑是令人怀疑的。

二、毛泽东早就讲过，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自然科学，一门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又是有一定联系的。它们所以联系得起来，并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二者都属于生产力范畴。生产的发生与发展，促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从混沌一体到逐步分化成相对独立的东西，又使相对独立的东西，得到各自的成熟与发展，并使它们在成熟与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吸取对方的有益养分，以丰富自身，从而成为社会前进运动的杠杆。很难设想，生产力中可以没有社会科学，而只有自然科学，便能够成为社会前进运动的杠杆。现实中，不要社会科学的社会，或者社会科学严重残缺的社会，或者社会科学不被当成生产力看待的社会，尽管其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基础，甚至于有一定的进展，但它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力，总是畸

形的,软弱的,可怜的,不尽人意的。正因为如此,才要在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科学,生产才有高度发展的可能。生产力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内在的本质关系,本质互通,本质交融和本质一体,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如果把它们一个置于生产力中,另一个置于生产力外,无疑是在人为地进行分割,为生产力的发展制造障碍。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许多地方讲过社会科学是生产力的问题,认为“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前述所指的“智力”和“知识”,既是指自然科学的“智力”或“知识”,也是指社会科学的“智力”或“知识”。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智力”或“知识”,就是“一般智力”或“一般社会知识”。这种一般的智力或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增强,以致于愈来愈成为“控制”和“改造”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愈来愈变成“直接的生产力”。从这里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改造”社会生活过程条件的,只能是作为“一般智力”或“一般社会知识”的这种生产力,包括潜在的,显露的,都会变得更加直接,成为“直接的生产力”。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显露的生产力,即自然科学生产力,比较注意其存在,也开始承认它为生产力,而对潜在的生产力,即社会科学生产力,则不敢加以肯定,更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以为老祖宗没有直接讲过。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就一针见血地阐明了社会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他们在指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的同时,还强调过“一般的生产力”,就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册,第423页)“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当然有潜在的方式和显露的方式。潜在的方式便是社会科学自身这种知识形态,这是不言而喻的。长期无视或不敢肯定这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即潜在的生产力的存在,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撇在一边,则迟早要受到它的严厉惩罚。

总而言之,我对胡绳同志关于社会科学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这一点,有共同的看法,但把社会科学排斥在生产力范畴之外的观点,则不敢苟同。固有是论,以祈争鸣。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科学与生产力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含义谈到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关系

张华夏

我国哲学界有许多问题的讨论不注意语理分析,结果混争了一场,发现原来起因于一些概念的混淆和语义的含混。当然我们不能象西方一些分析哲学家那样,把语言哲学看作是哲学的核心。不过在讨论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或“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问题时,首先澄清一下语义是有必要的。

一、“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分析含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主语是科学技术，它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类型：（1）理论科学和基础研究，它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人工自然”的基本规律，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属于前者，而工业电子学属于后者；（2）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它研究上述的科技原理的应用，研究将它们物化为生产技术、工程技术或工艺流程的原理与方法；（3）开发研究，它主要是将理论上的成果和实验室的技术通过中间实验改造为可直接用于生产的東西；（4）生产技术，它是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它包括实现着物质生产的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和体现科技成果的物质设备与装置。

再来看谓词，“是生产力”这个谓词表示什么意思呢？首先，在哲学的语言中，“是”这个词是最不明确和最有歧义的了。如果要精确化，“是”这个词至少包含三个不同的意思：（1）表示属于；（2）表示转化；（3）有时还表示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或决定的因素。至于“生产力”又是什么含义呢？有时指的是“潜在生产力”“后备生产力”，有时指的是“现实生产力”。有时指的是“物质生产力”，有时指的是“精神生产力”。为了讨论简化起见，我们特界定所说的生产力指的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力”，它包含马克思所说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这样“是生产力”这个谓词便有了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A）所谓X是生产力指的是X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即 $X \subset \text{生产力}$ ；（B）所谓X是生产力指的是它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或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要素，即 $X \rightarrow \text{生产力}$ ；（C）所谓X是生产力指的是它对提高生产力起着重大的作用，或者说X是一个自变量而生产力是它的因变量或函数，即 $f(x) = \text{生产力}$ 。

一旦我们对“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个命题作上述的语义分析，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这个问题便分解为 $4 \times 3 = 12$ 个子问题。我们现在对这十二个问题作出下列问卷式的回答（是为√不是×）

表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吗？

生 产 力	科学技术：	(1)基础研究	(2)应用研究	(3)开发研究	(4)生产技术
A. 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吗？		×	×	√	√
B. 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吗？		×	√	√	√
C. 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	√	√	√

上表将开发研究列入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主要因为发达国家70%开发研究机构是公司或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研究人员象马克思所说的“是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们的劳动属于生产劳动，他们的设备是公司或企业总生产设备的一个部分。

二、“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综合含义

但是，分析的回答与“分析的哲学”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它往往不能将我们要表达的

总体思想表达清楚。上面的分析就没有涉及(1)、(2)、(3)、(4)之间和(A)(B)(C)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表一的横行来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生产技术之间是紧密联系的。现代大生产,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应用尖端科学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后的社会生产,将理论科学、应用科学与生产技术连成一个整体。人们称之为“科学—技术—生产联合体”,而“多学科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相互协调,实现了一体化。于是,不但科学愈来愈依赖于强大的工业基础,而且生产本身愈来愈依赖于技术发明,而技术发现愈来愈依赖于科学理论的新发现。并且,科研成果从理论到应用的周期又愈来愈短。我们不得不将科学、技术、生产看作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综合生产力系统。所以,从系统论和“综合哲学”的观点看,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属于一个社会的综合生产力系统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个命题的第一个综合含义。

再来看表一的纵“列”。表一的分析没有涉及“属于生产力范畴”、“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三者的关系。事实上,是否属于生产力范畴的问题是个“静态”问题,可否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也是“半动态”问题,它没有完全揭示发展科学技术与发展生产力的动态关系。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要提高生产力,主要要靠什么,决定的因素是什么。这才是一个综合性的动态发展性的问题。手工业时代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是劳动者的“工艺”或“手艺”,科学在其中没有很大的作用;早期工业革命即机器大工业时代,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用机器装置代替手工劳动,这时科学对提高生产力开始起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于是得出结论“生产力当然包括科学在内”。(同上,第46卷下册第211页)但是到了本世纪70、80年代,情况进一步发生变化,要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第一位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因素,不是增加劳动力、设备和资源的投入,而是科学技术,特别是当代高科技,于是必然得出结论,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命题的第二个综合含义,而且是量化的含义。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函数问题。依据马克思对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分析,“劳动生产力(P)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L),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S),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C),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K),以及自然条件(R)。”(《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括号及其中的英文字母是我加的)这就是生产力函数,即生产力 $P=f(L, S, C, K, R)$ 。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该函数的一阶全微分来表示,即:

$$dP = \frac{\partial f}{\partial L} dL + \frac{\partial f}{\partial S} dS + \frac{\partial f}{\partial C} dC + \frac{\partial f}{\partial K} dK + \frac{\partial f}{\partial R} dR.$$

它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由许多增量引起,其中包括追加劳动力,提高其熟练程度 dL ,追加设备 dK ,追加开发资源 dR 等等,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起主要作用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即劳动者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新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用数学式表示为:

$$\frac{\partial f}{\partial S} dS > \frac{\partial f}{\partial L} dL + \frac{\partial f}{\partial C} dC + \frac{\partial f}{\partial K} dK + \frac{\partial f}{\partial R} dR.$$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计算，本世纪以来，在美国总产量的增长中，归于劳动和资本投入量增长比例不到三分之一，而归于技术进步的比例大于三分之二。（李翀：《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第37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理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社会科学与生产力

自然科学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所以科学技术从它的主体来说，是一种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也同样用来解决经济关系问题（如用计算机解决银行信息的储存与处理），解决上层建筑问题（如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公安机关的侦察与破案问题），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如建立新文化传统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部分科学技术，从分析的观点看，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不是生产力。同样，社会科学主要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问题的，这一部分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自然不属于生产力。但是，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的，解决提高劳动者的组织管理能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组织管理水平的。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部分社会科学的比重会愈来愈大。有关这部分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和科学技术一样在第一节三个意义上是社会生产力。我们可以仿照表一建立下面的表二。

表二：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生产力吗？

某些社会、经济、管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生 产 力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开发研究	生产组织
A. 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吗？	×	×	✓	✓
B. 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吗？	×	✓	✓	✓
C. 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吗？	✓	✓	✓	✓

生产过程的配置、组织与管理，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在上节的马克思的生产力函数表达式中，函数全微分式的第三项 $\frac{\partial f}{\partial C} dC$ 表示的正是“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改进，它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或内在变量。现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知识的进步看作是生产力的源泉或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其实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两个方面。他们还将资源配置的改进看作是提高生产力的另一个内部源泉，而资源的配置的改进主要是生产组织的改进，是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时期，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相应改进企业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管理可以说是当前推动我国生产力发

展的根本的动力，尽管那一些是外生变量、那一些是内在变量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但是情况非常明显，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科学技术要迅速转变为生产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来说，其作用决不亚于自然科学技术。

社会科学与生产力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其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生产力，阻碍我们对这个问题深入认识的是某种传统观点，这种传统观念认为：（1）社会科学只属于上层建筑和阶级的意识形态。（2）上层建筑（包括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教育）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它要通过基础的折光间接与生产力发生作用。（《斯大林选集》下册第505页）有些同志就在这个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得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不是生产力的结论。其实，社会科学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能力，改进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实现生产者之间以及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良好配合，怎么会不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应当开展对社会科学、社会技术与社会发展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

邹永图

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作为极其复杂的有机系统，是由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组成的。除了人类自身这种复杂的社会主体之外，社会客体由于人类多样性的活动而形成了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以及人类共同体系统。人类已有的五千年文明史，形成了上千个社会科学门类 and 分支。虽然社会科学作为人们对人类社会主客体的理性认识的一种形态，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息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是，按照人类各种复杂的活动的系统，可以相应地把社会科学归纳为五大科学群：生产科学、经济科学、政治科学、文化科学和人生科学。这五大类的社会科学群在人类的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大体上说来，社会科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发展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一是具有认识社会规律和指导人们变革社会的功能；二是具有为人们的实践提供决策和对人们各种行为（活动）进行组织和管理功能；三是具有为人们思维活动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和人们生活的导向和价值选择的功能；四是社会科学作为精神生产力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和成为其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五是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的文明要素，具有促进人们提高精神文化、道德素养，使人们得以全面发展的功能。

在充分肯定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客体系统发挥作用的功能时，还必须注意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生产力功能和经济功能，随着时代的前进显得愈益重要

和强大，它不仅是社会的精神生产力，而且日益成为物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看到由于社会科学作为对人类社会从无阶级到有阶级再到无阶级这个漫长历史过程的理性认识，其本身内在地同时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性、历史性与现实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等等有机统一的特点。因此，社会科学历来有不同的性质。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由于性质不同以及为不同阶级所运用，其功能的发挥是双向的。就是说，社会科学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也可以阻挠或破坏社会的发展。当然，作为真理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有机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最为强大的精神武器。

要使社会科学的真理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推动社会前进，使社会科学的各种功能得到全面的发挥，就必须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抽象命题具体化和现实化，尽可能成为可操作的东西，由理论形态的“软件”变成客观形态的“硬件”，从而充分而具体地显示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看来有两种基本的途径，可以有效地在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之间架设起使两者互动的桥梁：一种途径是通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使社会科学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之中，把对自然的认识与对社会的认识统一起来，最终到达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结构及社会环境的作用。另一种基本途径则是通过大力开发“社会技术”，使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社会发展联成一体，互相推动，具体有效地发挥社会科学的功能，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我们的思维框架，要从“自然科学 $\longleftrightarrow$ 自然技术 $\longleftrightarrow$ 生产发展”的单一的互动关系，自觉地转换为“社会科学 $\longleftrightarrow$ 社会技术 $\longleftrightarrow$ 社会发展”这种全面的互动关系，从而使人类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达到有机统一。

关于“社会技术”的概念，人们较为生疏，需要进一步研究。“社会技术”概念，一方面是相对于“自然技术”而言，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自然科学（借助于物质手段）应用于改造自然的手段、方法、工艺、技巧等等称为“技术”，这实际上只是“自然技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表明，除了“自然技术”，还有人们依靠社会科学理论通过各种社会组织而进行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手段、方法、措施、技巧等等的“社会技术”。如果说，“社会科学”是以认识社会和人自身为己任，解决其对象“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那么，“社会技术”则以改造社会和人自身为己任，主要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这就是社会技术与社会科学相对区分之处。正如自然科学只有经过自然技术才能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一样，社会科学要发挥其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也只有经过社会技术才能实现。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无产阶级不成熟的反映，而且从根本上找不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技术，所以不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不同，它通过无产阶级运用的阶级斗争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这些“社会技术”，改造了旧社会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肯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变动和改革的社会，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也不断提出了改革理论，而社会主义社会大多仍停滞不前，经济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但未找到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技术”。这就是只承认“计划”这种单一的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否定或忽视“市场”这种更为重要的手段。不仅经济的调节手段是社会技术，而且建立经济体制也是社会技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四大充分肯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也说明了运用新的社会技术必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质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运用一系列的社会技术才能成功。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变革和改造社会，应当十分重视社会技术的创造与开发。

社会技术同社会科学相比较，具有更普遍的应用性与具体性。就社会技术的本质而言，乃是人类为改造和变革社会而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的技能、方法和措施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的指导，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但是实践的结果如何，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用何种社会技术或多种社会技术的结合程度。一般来说，社会技术必须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及体制、机构，应用有效的社会手段和方法，采取社会管理方式和措施等等来体现。迄今为止，大体上可以划分出以下社会技术的门类或系统：

（一）社会生产力配置技术系统；（二）社会经济管理技术系统；（三）社会政治统治技术系统；（四）社会革命与改革技术系统；（五）社会精神文化技术系统；（六）社会信息技术系统；（七）人类行为规范技术系统；（八）人类认识与价值选择技术系统。社会技术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其门类或系统的众多繁杂上面，而且表现在其每个门类或系统又有各自的子系统以及每个系统又有相互差别的多种基本要素。

社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比自然技术的发明和利用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社会制度、阶级利益、历史条件、文明程度、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社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术，不能搬到社会主义国家中来应用；即使同一个共产党在执政前与后也不能采取同一种领导方法。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意味着必须采用和不断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各种有效的社会技术，才能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除此之外，开发和应用社会技术所以困难，还在于它必须借助一定的自然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必须依据人们的素质和水平的提高。毋庸讳言，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技术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尚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加强对社会技术问题的研究，积极创造有效的社会技术，努力开发和应用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技术，对于建设文明、富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十分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

不能小看社会科学的作用

丘 挺

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为人们所确信，自然科学的作用和价值已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而社会科学呢？其作用和价值事实上还未被全社会所认识所重视，对

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淡化的倾向，有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失落感。要使全社会都来认识社会科学、重视社会科学，除了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要做出成绩来，以显示社会科学的作用和价值以外，正确认识和大力宣传社会科学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和价值，也是不可缺少的。

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本来就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科学也应当同生产力有多种联系，它的研究和应用、理论和实践，是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这是必然得出的逻辑结论。

社会科学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归入上层建筑范围；另一方面，它毕竟是一门科学，有科学的性质、功能和作用，因而具有科学性。这就是说，它具有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从意识形态性上说，社会科学有指导实践的作用，而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就是生产实践，它能指导生产实践，难道就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生产力吗？从科学性上说，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发展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手段，它为社会变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理论，为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并与自然科学相配合，在实现对社会改造的同时实现对自然的改造。比如，属于社会科学的管理学，它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就具有巨大的作用，这难道不具有生产力性质吗？

这里牵涉到对生产力范畴的认识问题。我们既不能把生产力范畴泛化，把上层建筑中的诸种因素和内容都划入生产力中；也不能把生产力范畴实体化，不能把生产力范畴仅仅归结为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更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去研究生产力范畴。生产力是一个体现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或他人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或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马克思、恩格斯这种生产力双重关系论说明，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制约和规定，我们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去对生产力作静态的研究，应当结合生产关系去对生产力作动态的研究。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仅与自然科学相关，而且与社会科学相关，生产诸因素的结合问题，劳动的组织与劳动力的管理问题，以及与这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问题，不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吗？何况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决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如何使人这个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最充分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界限分明的状况，密切了同自然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结成联盟，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特别是软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在社会发展、政治决策、科学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来属于社会科学的多种应用性的经济学科，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更为明显。这种状况表明，社会科学不仅也是生产力，而且也是重要的生产力。

充分发挥科学的生产职能作用

卢黄熙

在科技革命时代,科学不仅具有传统的综合、描述、说明、总结等职能,而且还出现了新的职能,即参与社会生产,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开辟道路,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生产职能。生产职能已成为现代科学的主要的、显著的职能。

一、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科学的生产职能作用在不断增强

首先,现代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特别是步入机器生产时代以来,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和变革作用日益显著,马克思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①邓小平同志更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②因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将不取决于人的直接劳动(因为人的直接劳动,愈来愈多地被科学知识发明的机器所代替),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

社会科学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容淡化的。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其实践,往往影响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和重大决策。看一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吧!不正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个伟大理论的正确指导下,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生产力,并使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吗?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又必将大大加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社会科学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往往影响全局,危害至深。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若干社会科学的失误,都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人们记忆犹新:50年代中,“批了一个马寅初(控制人口论),中国人口猛增了两亿”,给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多大的负担!至今人口过多仍然成为我们沉重的包袱。又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爆发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对生产力的破坏和物质财富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都从反面说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因此,一定要象重视自然科学那样重视社会科学,一定要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科学功能 and 价值。

作者单位:广州市委党校
(本专栏责任编辑:冯生)

在生产上的应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④这就是说，科学技术成为了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将使生产过程成为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变成了监督者和调节者，甚至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由电子计算机来处理。

由于科学在生产上的技术应用，使生产的经验方法被科学方法所取代，生产日益成为科学成果应用的对象，实现了“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⑤从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科学技术因素占经济增长的比重越来越大，科学成为了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特点，是科学迅速转化为社会的直接生产力。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过程，是现代大工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⑥

在现代，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呈现出以下特色：一是科学结晶成分在生产力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自然因素的比重；二是脑力劳动者在整个生产工作者总体中所占的部分越来越扩大，如战后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西德和日本，其脑力劳动者增长得很快，西德从30.1%上升到45%，日本从28.2%上升到45%；三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周期大为缩短；四是高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效益日益显著。比如，美国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寻找用传统勘探技术无法找到的天然气田和油田。使用这种技术，能显示出地下数千英尺深度的立体图像，看清岩石的结构。人们估计，这种技术将给石油勘探业带来革命性变化。上述这些特点和因素，使现代社会生产出现了从主要依靠体力转向主要依靠智力、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的实质性变化，开始出现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从人向劳动资料转移的质变，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科技发展竞争。哪个国家和民族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落后，哪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陷于被动。谁在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领域领先，谁就能在国际上称雄。

再次，现代生产要得到发展，没有科学的参与和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不可能的。现在，不仅许多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而且现在许多新兴工业部门都是在科学成果大规模地运用于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诸如，在原子核物理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核动力工程。固体物理领域的若干发现，导致了半

导体材料和用品的生产,以及量子放大器和超导体材料的生产。晶体学和高压物理学的成就则产生了人造金刚石工业。高分子化学和聚合反应的动力学的创立,出现了合成纤维工业、合成橡胶工业和塑料工业等新的化学工业部门。生物学领域的成就为医学、工业和农业解决了一系列问题。电子计算机、复杂的自动管理系统、宇宙机器人等,则是控制论成果应用得最多的一些领域。在社会生产的某些单个环节上,由于科学成果的应用也产生了质的变化,比如纺织工业中采用的无梭织布、无纺工艺、电力精纺等。而当代宇宙技术和航天工业的发展,是现代科学在人类生活中最令人信服的体现。

总之,在现代社会,科学生产职能作用的增强已成为社会和时代进步的主要标志。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间国力竞争的焦点。

二、科学与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是发挥科学生产职能作用的基本途径

首先,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生产需要或个人需要的物质财富,只为生产物质产品创造前提条件。因此,科学要实现其社会生产的职能,必须经过一定的途径,转化成为生产的直接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不过它是一种“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即潜在的生产力。科学只有运用于实际生产过程中,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相结合,渗透到生产力诸实体性要素中发挥作用,才能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⑦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将会极大地提高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就会大幅度地提高工具的效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会帮助人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其次,科学只有与生产力诸要素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改进和提高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形式和方法。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不是表现为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并列着增加了一个生产力的单独要素,而是科学与生产力诸要素结合在一起。科学体现在生产力的所有要素中,贯穿于劳动生产的整个过程,就能使生产力诸要素的生产运用过程的劳动本身更加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工艺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方式的改善与提高,表现在生产的组织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技术方面)的改善和提高。这些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紧密联系的方式的这种提高与进步,是以科学与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从而提高生产力诸要素水平和性质为前提的。渗透着现代科学成果的生产力诸要素是现代生产工艺流程和生产的组织形式不断完善和提高的基础,而现代科学又为科学地管理和驾驭它们提供了可能和保障。

再次,现代科学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使生产的所有因素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科学与劳动工具相结合,使科学越来越物化为各种新的复杂的技术装备,物化为

各种机器和机器体系，使生产工具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变，生产工具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革。第二，科学渗透到劳动对象中去，使科学越来越物化为各种新材料、新能源，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对象，如化学合成材料、超导体材料等。具有耐高温、耐高压、防潮、防火、耐机械作用和化学作用、耐放射性辐射等预定特性的人造材料，在生产上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又如，核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使人们向大自然索取原材料的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拓宽着物质生产领域。第三，科学渗透到工艺流程领域，引起了生产工艺的根本变化，生产日益成为科研成果的工艺应用。诸如化学工艺、电子工艺、电化学工艺、电子物理工艺、激光工艺、微生物工艺等等，就是科学成果在工艺过程中的体现。所有这些新的工艺方法都加快着生产的过程，使生产的整个工艺过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完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连续过程。第四，科学与劳动者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使其生产技能得到不断提高。随着科学广泛地不断地物化到生产中去，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得到不断发展和提高，一方面使生产过程从劳动者体力的限制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对劳动者应有的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科学知识，否则他们就无法掌握复杂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在科学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的今天，劳动者对现代生产的关键作用和意义，已经不在于所付出体力的多少，而在于知识、智力水平的高低和创造性能力的强弱。科学技术素质已成为劳动力构成的首要因素。第五，科学运用于管理之中，使生产管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代社会生产已从“科学管理”转向“现代化管理”。

以上，科学与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引起生产诸因素质的变化，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事实，向我们揭示了科学实现其社会生产职能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指出了提高现代生产力水平的基本方向。

三、为充分发挥科学生产职能作用创造社会条件

首先，充分认识科学生产职能作用，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全社会进一步造成重视科技、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党的十四大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尤其需要全社会提高科技意识，多方面增加科技投入，真正依靠科技进步。同时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下决心采取重大政策和措施，进一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并形成规范化的奖励制度。

其次，加强和改善科学的物质技术基础。科学对社会生产影响的大小，其生产职能发挥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强弱。这种物质技术基础表现在科学机构即科研所、设计院、科学实验室和高等院校的数量和质量。对我国来说，目前除了继续建立一些必要的高科技研究基地和机构外，要对现有科研力量及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组合，对科研部门进行完善和提高，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普遍使科研

设施和装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中型企业都要建立产品技术开发机构,加强科技成果的中间试验和二次开发工作。要在全中国逐步形成一个多学科、多层次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和培养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工作体系。与上述相联系的就有一个科研投入问题。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研究发展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发达国家是2%,我们仅是0.7%。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要增加对科技的财政拨款,并要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全社会投入的新机制,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再次,抓好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机制的转换。科学实现其社会生产职能,不仅在于出了多少科研成果,关键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途径是否畅通,是否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措施。现在科学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形成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我国每年有重大科技成果几万项,但应用生产中的比重很小,大大低于国外一些国家的比重。这种状况应努力解决。根据近几年的经验,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应在以下几方面作好文章:一是发展和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产业化。二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实行人才分流,兴办所办企业和校办企业,直接进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三是建立一批有内在联系的学科之间相联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为特征的综合性的科研基地。四是发展产业界与科研部门、高等院校之间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建立生产、科研、教育一体化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五是大力发展和培育科技市场,把科研机构 and 科技成果推向国内外市场。六是健全法制,维护信誉,提高科技界、高等院校与企业界合作的成功率。七是在普遍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基础上,把科技开发、应用与科技人员的责权利挂起钩来,实现“脑体正挂”,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八是建立一套能把科技研究与发展生产之间的诸多问题协调起来的统一的政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

②⑦ 《邓小平文选》第37页、第85页

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4-35页、第212页、第212页、第219-220页

作者单位:广州海军舰艇学院

责任编辑:冯 生

对广东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评估

梁 钊

一、广东率先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发生了巨大变化

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实质上是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先走了一步。市场导向的改革给广东的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果，人民得到实惠，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发挥了自己的特有的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取得较大成功。

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已提前于1987年实现第一个翻番，预计1992年将实现第二个翻番，又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各种综合经济实力，同全国各省、市、区相比，从原来比较落后的省份，跃上了全国的前列。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广东能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除了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改革开放政策之外，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敢于解放思想，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传统的经济模式，跳出计划经济的旧框框，从市场上突破，放开价格，带动企业制度创新和新企业兴建，走了一条迈向市场经济之路，初步建立了一套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初步显示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广东率先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变化之大有目共睹。

——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取得成功。广东的农村改革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家庭联产承包没有滑向单干和私有制，而是保留了集体经济、集体财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农村集体经济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1991年突破千亿大关，总收入达1008亿元；二是真正面向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初步建立市场运行新机制。广东的乡镇企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敢于闯荡国际市场，其发展，使世人瞩目，令人惊叹。

——各项经济改革配套进行，主要是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搞活流通。改革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市场繁荣，供应充分，商品琳琅满目，各类商品高、中、低档，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凭证限量供应的艰难困境，已经成为历史。

——投资体制改革，改变过去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状况，改国家投资为社会集资，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多渠道筹集资金。13年来全省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34.61亿元，年平均递增26.5%。电力、铁路、公路、桥梁、通讯、港口、码头、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改造，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的几年超过几十年，有的甚至大大超过了历史发展的总和。1991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发电装机容量由251.74万千瓦增大到955.68万千瓦，增长3.79倍；通讯事业飞快发展，改变了打电话比不上骑自行车快的通讯严重落后状况，现在广东拥有程控直拨国内外的电话占全国的25%以上，移

动电话占全国的一半。

——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对外开放格局，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利用外资的规模也随之得到迅速扩大。目前，利用外资的方式已由过去从“三来一补”起步转变为以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为主；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突破了过去单一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状况，正向国有、地方所有、社区所有、合作制、股份制等多种灵活的公有制为主体，外资、私营和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格局发展。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一、二产业得到有效调整，外向型经济结构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已具备了大开放、全方位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

——造林绿化改变了生态环境。1985年第一次山区会议以来，广东真抓实干，充分运用农村改革成功的政策，在造林种果发展开发性农业中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把造林种果开发性农业推向市场；实行严格的检查与奖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穷山恶水的山区环境，绿染南粤，去年获国务院颁发的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光荣称号，为后代子孙，创造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比较大的改善，走出了一条先富后富、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的路子。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20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约400元，到1991年，已分别达到1143元和2536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8.8%和6.3%。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迅速增加。1991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彩电83台，电冰箱62台，洗衣机85台。1991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22亿元，1979年到1991年平均递增36.8%。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5.4平方米增加到1991年的13.71平方米，农民人均生活用房面积由8.73平方米增加到18.03平方米。现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富裕地区开始步入小康向富裕型迈进，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温饱向小康前进。消费水平、消费质量、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消费趋势都在发生变化。

——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人的素质、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为人才辈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广东人民“团结、求实、开拓”精神受到了普遍赞扬，强烈的市场观念、时效观念、开放观念、竞争意识、拼搏意识、重视人才、科技、信息的意识有了很大的加强，对深入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步伐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广东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给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使经济发展开始步入良性循环，形成了较强的发展后劲。

良性循环的标志之一是：14年经济持续、稳定、高速、高效发展。广东从原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省份，逐步跃上了全国的前列。社会总产值1978年为350.81亿元，1991年为3890.0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5.4%；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184.73亿元，1991年为1780.5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2.6%；国民收入1978年为160.78亿元，1991年为1380.31亿元，平均年增长1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80年为136.94亿元，1991年为857.5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6%；外贸出口总额1978年为13.88亿美元，1991年为

136.88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9.3%。

广东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对国家的贡献也不断增加。1979年到1991年，广东净上交中央财政收入从8.57亿元增加到69.8亿元，增长7倍多。1980—1991年间，累计净上交中央财政331.36亿元，平均递增19.1%，高于广东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中央在广东的企业（主要是海关、银行、邮电、铁路）同期上交中央的财政由4.8亿元增至100亿元，增加21倍，这同广东经济繁荣发展是密切相联的。

良性循环的标志之二是：广东经济14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马鞍形，没有出现自身衰退的周期，也没有受到外界的严重冲击。14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递增12.6%，其中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递增12.5%，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年递增12.3%，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年递增13.5%，不但经济稳定增长，而且具有很强的后劲。

良性循环标志之三是：由于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搞活流通，把生产要素的主要部分推向市场，97%左右的消费品和90%左右的生产资料已进入市场并在市场供求运动中形成价格，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实现平衡，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品凭票定量供应的短缺经济的旧格局，又避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打破短缺经济格局，又避免生产过剩危机，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

良性循环标志之四是：资金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实现了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二、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性

市场经济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这里讲的不可逾越是讲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概莫能外。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普遍性范畴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一切活动都要以市场为中心，企业是完全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法人地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享效益、自担风险，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第二，市场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切生产要素都要进入市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关键产业、金融、贸易、技术信息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围绕以上支柱形成成熟的市场体系。

第三，社会资源配置要通过市场来完成，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一同发生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社会保障与法律体系。

第四，与商品、货币、市场相关连的一系列普遍性的范畴都是不可逾越的，如价值、价格、成本、利润、循环、周转、投入、产出、金融、信贷、利息、利率、股票、

股息、汇价、汇率、税收、税率、期货、地租等等，都是社会经济运动的普遍形式。

第五，在社会化、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经济有可能高速滚雪球式发展，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保持经济发展的必要平衡。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市场化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财富的增殖过程。

第六，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互相渗透，联成一体，经济技术交流成为不可缺少的条件，形成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

以上基本特征，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普遍性要求，集中地反映了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对于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能把落后的、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狭小、分割、封闭和发育不全的市场叫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大力培育市场；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为改革的目标；要大胆改革、大胆突破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旧体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市场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接，进一步实现市场化、国际化和集团化。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的普遍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同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相结合，是商品价值规律、市场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与社会主义特有规律的统一。这就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的变化，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价格信号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调。同时又要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兼顾效率与公平，既鼓动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实现现代化，面临着许多困难，任重道远

广东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取得显著的成绩，但是，全面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广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与十四大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广东经济基础脆弱。近几年来，迅猛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加工工业、轻纺、家电工业，缺少大型骨干企业、重化工业、原材料工业。广东是钢材消耗的大省，但仅有两个小钢厂，花了很大力气才搞到年产100多万吨钢。广东又是化纤纺织和塑料制品的大省，但严重缺少原材料，没有大型乙烯、聚丙烯等化工企业，近年发展了一大批铝型材厂、铝制品厂，但却没有一个炼铝厂。

（二）广东教育科技落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省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仅有48人，在全国排第18位。科学技术落后，获国家发明专利的比例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增国家学部委

员广东一个也没有，最后查实有半个，就是由贵州调来的一位科学家仍在贵州兼任职务。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经济效益不理想。广东同日本、台湾、韩国相类似，均缺少原材料，但后者是进口初级原材料，加工成高档、精细原材料，而广东却直接进口高档、精细原材料。广东从国外大量进口高级合金钢、超薄型不锈钢板，大量进口化纤、塑料用的聚脂切片等精细化工原材料，造成产品成本高，附加值低。

（四）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导向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并不等于已经形成市场经济。广东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当前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还存在许多难点和弱点。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远未形成，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还有待探索，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国有企业产权登记和清产核资工作进展缓慢，有关保障国有资产增殖的措施不具体不清晰，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外部 and 内部两个方面的配套改革困难重重，《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的各项经营自主权还远未落实，一句话，国有企业的一切活动还不能以市场为中心运转。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相结合的灵活、协调的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平均主义与分配不公两大难题如何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改革，也只有面向市场，才能找到突破口。

——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的任务十分艰巨。广东的流通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虽然取得很大的进展，消费品、生产资料、服务领域大都进入市场，但城乡一体化的大市场、大流通的体系还有待建立和完善。金融、人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信息以及产权等要素市场，还处于初创阶段，许多生产要素的配置仍然以计划手段为主，其价格以及利率、汇率、工资等还没有真正放开。当前一方面是出现了股票热，另一方面又没规范的股票市场，出现了许多幼稚的畸形的现象，这有待理顺和纠正。

——庞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产物，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去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甚至每精简一次再膨胀一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职能未变，计划经济体制、条条专政设置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甚至是设置障碍和影响效率的部门，定了许多冗繁的规章制度。1992年11月14日《广州日报》刊登了《一个烧腊档的真实故事》，办个烧腊档申请营业执照盖了44个公章费时240天，交了16次费，还未办完手续，这种令人生畏的“公文旅行”，都是传统体制下有关制度规定的，不彻底改革，如何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呢？机构改革非“拆庙”、“搬神”不能凑效，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转变职能，精兵简政，强化服务功能，弱化权力功能，提高效率，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难点在于真正转变观念，打破“官本位”和“大锅饭”、“铁饭碗”，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康庄大道的系统工程。

——当前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还囿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和权力为主的方法和直接管理微观事务的功能，严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宏观管理职能，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难度还很大，任务也很艰巨。主要任务是：真正把权还给企业，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完全自主地进入市场，并以市场为中心开展活动进行经营；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协调，制定有利于重点倾斜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扶贫政策等，调节社会的需求与供给，通过市场协调实现在分配方面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注意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建立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必须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要花大力气转变行政权力管理为法规管理，普及法律知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加强法律约束。

——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机关、企业、学校办社会，追求“小而全”、“大而全”的状况，严重阻碍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浪费。企业包揽社会保障功能造成一些老企业包袱沉重，无法摆脱，无法实行公平竞争。

——我省外向型经济虽然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同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是没有建立强大的海外销售网络和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进出口贸易仍未改变主要由别人代理，海外订单在别人手上的格局，存在着“隔山买牛，隔山卖牛”和设备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被人砍三刀的状况。二是创办海外企业、海外工程承包还处于初创阶段，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和行政管理方法，多数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仍处于惨淡经营，不成气候，未能形成集团公司和跨国经营。我省真正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业还未进入海外市场拼搏；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有利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必然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尽快培养大批懂技术、懂管理、懂外语、懂涉外法规和国际惯例的优秀人才，才能适应在更高的层次、更深的内容、更广的范围上发展外向型经济，更有效地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尤其要在海外投资、跨国经营、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方面有大的突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我们抓紧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的要求是一致的，这是一项十分光荣而又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我省设想，今后20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分两个阶段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现在起至2000年前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比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三番多，平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3.4%，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2000年到2010年为第二阶段，力争在国内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科技教育的综合能力、产业结构水平、人民生活富裕程度、医疗卫生水平等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12.4%。我们不仅要在经济总体实力上赶上“四小龙”，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要比它们强，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型，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充分地显现出来。

论市场经济的特征

杨 敏

一、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普遍性范畴，其一般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主性。现代市场经济是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它实行以企业为本，贯彻企业自主，突出企业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一切活动都以市场为中心，它不是按照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的计划指令，而是依据市场信号，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发展，自我调整。这就要求参加市场经济活动的每个企业，都必须拥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投资决策、产品定价、进出口经营、人事劳动、工资奖金分配、生产设备处置、横向经济联合、内部机构设置等权力；同时，还要求企业必须有归自己支配的资产，有自身独立的利益，能够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立足于经济大舞台。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是完全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见，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在于以企业为本，突出企业作用。它和以国家为本、突出政府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竞争性。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突出特征。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所谓竞争，是指卖方之间、买方之间、买卖双方之间为了争取有利的生产和销售条件，围绕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把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从现代化、社会化的高度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围绕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既要大胆吸收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敢于拿来为我所用，又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广东要用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更加解放思想，继续先走一步，对外更加开放，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郑英隆

商品价格和质量而进行的较量。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竞争，使资源由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由供过于求的部门流向供不应求的部门，从而促使资源配置优化。竞争对商品当事人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它迫使每个竞争者必须花大力气研究市场形势，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增强市场竞争的能力。竞争是无情的，它奉行优胜劣汰的原则，迫使每个商品当事人面临成功与失败的双重选择。竞争又应是平等的，任何企业都应有平等的法人地位和权利。政府的职责就是为竞争创造平等的环境，当好竞争法则的制定者、仲裁者和服务者。只有平等竞争、保护竞争，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

（三）自发性。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是经济运行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为它是靠“看不见的手”，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手”来指向的，是由自发性的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的。市场调节更主要的是一种短期利益驱动，它对投资大、周期长、利润小，而又关系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建设项目，则是缺乏效果的；尤其是对非盈利性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则是失灵的。所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本身蕴含着价格波动、产销脱节、结构失衡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就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因为如此，现代市场经济才引进某种计划机制，借助于政府的调控作用来制衡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也会存在经济运行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还会出现通货膨胀、企业破产、职工失业等现象。因此，这就需要发挥计划的功能，切实有效地控制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内在的协调性、运行的有序性和增长的稳定性。

（四）开放性。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它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不断突破狭小、分割和封闭的市场藩篱，把一切经济活动都卷入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市场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实物产品要进入市场，而且资金、土地、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要进入市场，从而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完备的市场体系。而市场也要求空间不断扩大，它不仅向所有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开放，向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开放，而且向国内各地区、各城市开放，向国外开放。开放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个企业、各个地区乃至各个国家，必然全面对外开放，发展各类市场，实行大市场、大流通，参与全国和世界的市场竞争。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扩张力和开放性，它不为部门、地域之间自然、经济和人为因素形成的市场壁垒所阻碍，从而把内向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成一体。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因此，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所谓特殊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它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它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是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它在国民经济整体上，在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中占支配地位。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它的比重上，更表现在它对关键领域的统治力和对其他经济成份的影响力上；公有制并不等于国家所有，国有也不意味着国家经营。公有制是相对国民经济整体而言的。它既不排斥非国有的公有制，也不排斥非公有的私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不一定以国有制为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将逐渐从直接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中退出来，使经济活动和市场运行主体由国家转为各类企业。这样，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就会逐渐减少，其它非国有的公有制经济的相对比重就会逐渐增大，尤其是集体经济和股份公有经济就会成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公有制和股份制结合，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公有股份制既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并且必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其运行主体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公有制经济。

(二) 它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相适应，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也仍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不是以按资分配为主体，这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科学认识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我们在分配领域一直是以计划决定分配，地区按类别，企业按级别，个人按年限，这种分配制度没有真正反映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和劳动贡献。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就应当在计划指导下由市场来决定分配。劳动力的素质由市场来判别，劳动者的贡献由市场来评价，劳动者的收入由市场来调节，从而使以劳动为依据的收入的确立、分配与调节通过市场来进行。这样，对企业说来，必然是谁创造的财富越多，谁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对劳动者来说，必然是谁的实际贡献大，谁获得的收入就越高。这种建立在劳动差别上的收入差别，在总体上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应当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就必须承认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和交换的等价性，并根据各自的贡献给这些要素的所有者以应得的报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报酬不能笼统地称为非劳动收入，实质上它属于劳动积累的增殖，或称劳动的边际收益，不仅应当允许，而且应当受到保护。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既要鼓励先进，刺激效率，合理拉开差距，又要缓解社会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 它是以政府调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以政府调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们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机关，以政府调控为主导，当然体现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但它不是经济调控的主体，整个市场体系必

须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调控。政府调控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各类市场的直接干预，而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外汇政策，以及各种法规去调控和管理市场。在这里，虽然计划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计划主要是指导性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其主要功能只在于确定经济发展目标，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控制经济发展格局。应当指出，由于我国地广人多，不同地区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基础差异极大，各地区的市场发育状况也不一样。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实行中央政府总调控与地方政府具体协调相结合，重点应放在地方政府协调的调控形式上；而政府调控的职能也应以宏观为主，战略为主，协调为主，服务为主。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三、市场经济的功能特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市场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市场表现出其本身内在的功能。这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国家对宏观经济的间接管理，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联系功能。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促进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交换活动，同时也就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结合。市场是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实现形式，它的基本功能是把参与市场交易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谁参与市场交易，他就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在经济利益上是有差异的。市场以自己的联系功能把它们从经济上紧密地联在一起，使社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行，这便为国家通过调节市场来引导国民经济顺利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整个社会经济联系的纽带和媒体，成为多重社会经济复合关系的载体，各种经济关系（诸如要素之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等）都通过市场得到沟通和强化，从而把生产社会化推向更深更广的境界，以至达到生产日益国际化的程度。

（二）利益调整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和与价格有关的税收、利率、工资、汇率等经济杠杆，是经济生活的调节器。它们调节经济生活的途径，是通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等方式，影响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所以，市场具有利益调整功能，其本质在于重新分配经济利益，从而引导经济活动主体改变经济行为。利益的调整是经济杠杆的支点。正是市场的利益调整功能，使得国家可以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等多方面的经济关系。这是国家可能借助市场来引导企业运行的依据之一。

（三）信息传递功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各种经济信息的集散场所。市场集散的各种经济信息，是人们的经济活动的直接反映。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要根据市场提供的经济信息来做出自己应有的决策。由此可见，传导信息是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功能。这就要求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分析市场供求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以便做出相应的对策。同时，国家为了调节市场，也要进行市场

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基本特征

严庆和 代 航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个概念，原指那些以利己为动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单位和个人。具体说来，它包括消费者（效用最大）、投资者或企业主（利润最大）、劳动者（收入最大）以及政府和土地资本所有者等。承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合理地引导人们追求自身利益会增进社会利益，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概念亦可为我国借用。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提出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目标，个人利益问题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我们过去那种片面强调共同利益，而忽视甚至否定个人利益，只能延缓社会主义建设。在承认人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属于正当行为的前提下，如何协调人们的利益矛盾以及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矛盾，最终促使社会利益的顺利实现，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如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经济人概念就毫无社会意义，最多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在当前建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际，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人，主要意义有：（1）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各自利益的正当性和重要性；（2）明确追求自身利益应当有益于社会国家的观念，使社会主义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于社会利益的实现；（3）使各个经济活动主体从关心自身

预测，通报市场信息，以引导企业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生产经营。这样，市场信息传导功能，就成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基本手段之一。

（四）社会评价功能。评价一种商品的价值，评价一个企业的业绩，评价管理水平的高低，以至评价一个产业的前途，最公正、最准确的就是市场。一种产品如果适销对路、价廉物美，就会成为抢手货，生产这种商品的厂家获得的经济效益就会一目了然。因此，市场自然地成为评价商品是否符合社会需要和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需要的场所。也就是说，市场具有实现和检验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功能，是评价商品生产活动的唯一客观标准。市场的这种社会评价功能要求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使企业在平等的条件下各展身手，进行竞争，促使企业改进技术，改善经营，进而使企业及社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作者单位：商业部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郑英隆

利益的实现出发,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自觉接受市场“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调节,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中生存谋利;(4)可以更好地划清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自身利益,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交织含混之处,如政府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企业家的双重目标利益,消费者权益,等等。

我们认为,在市场上追求各自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人,应该表现出自主性、追利性、竞争性和预期性四大基本特征。

(一)自主性

社会主义经济人的自主性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能够自由、自觉、自主地从事生产、交换、消费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认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和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随着各种经济活动者的利益主体地位确立,个人利益与集体(企业)利益逐步从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确保切身利益顺利实现的客观要求势必把社会主义经济人的自主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具体来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主要体现为:(1)拥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如劳动力、存款、债券、股票、住房等),可以自由地运用这些财产来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如进合资企业劳动,自主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出租房屋,出售或购买股票等;(2)在市场交易活动中,通过签订各种契约合同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如同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契约,成为该法人组织的劳动者;(3)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承担市场风险,享受劳动成果等。

与此相应,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人的企业或企业联合体,应该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由于过分强调全民或集体的公有性质,失去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无法行使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不再直接插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在所有者“缺位”状态下,产权关系模糊,企业仍然无法行使正常的生产经营权。如果企业不能随意处置资产(租赁、转产、兼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定价、销售和招聘解雇劳动者等的人、财、物、购、产、销权利,那就谈不上企业法人的自主性。既然企业没有自主性,企业经营效果的好坏,生产效率的高低,企业就无法负责,而国家也无法负责。目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增强自身的活力与素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很明显,只要我国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和产权制度日益清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自主性一定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追利性

社会主义经济人的行为目标是追求各自利益，而且是最大的利益。根据一般经济理论，经济人追求最大利益的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2）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3）投资者追求预期利润最大；（4）政府按照成本——效益实现其最大利益的政策目标。当然，上述最大化利益也可能是经济人通过机会对成本（把一定的资源用于获取某方面利益而放弃可能得到的其他方面的利益）的比较而进行。比如，当企业觉得它用自己拥有的100万元资金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比自己购进机器生产产品更为合算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地购买股票。

在社会主义市场上，作为经济人的消费者，在商品供应越来越丰富，消费水平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以自己的购买活动来获得最大效用，确立消费者权益。当然，消费者要真正使效用最大，还需要一些主客观条件，譬如，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一般不会出现“短缺”，生产者主权为消费者主权所取代，伪劣商品应遭到抵制，同时，消费者还应是一个理性人，即完整地了解自己的偏好，选择要有传递性和反身性等。

社会主义企业追利性要复杂一些。一般说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一开始就与市场息息相关，很少受到行政干预，追求最大利润是不言而喻的。而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制度模糊，企业的经营目标包含了商业目标（盈利最大化）和社会目标（为社会发展和稳定而必须承担的非商业性目标）。当企业商业目标与社会目标发生矛盾时，商业目标常常屈从于社会目标，如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裁减企业富余人员，但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又使企业无法辞退工人。为此，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与社会目标分离开来。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处理短期利润与长期利润、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的关系。实际上，为了获得一个会计年度的利润，采取承包制和工效挂钩的国营企业常常会少提折旧虚增利润，不对机器设备进行及时的更新改造，把本来属于积累补偿性质的折旧基金，挪作非生产性的福利开支，追求资产利润化或利润福利化（据估计，1979—1988年间，我国没有提足折旧率的不下3900亿元；而提取的折旧资金2500亿元中，近20%用于职工福利）；一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近年来变相蚕食国有资产，把公产化为集体股、个人股高息分红；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方资产不经评估，国有资产权益流失于利润分配之中；还有一些企业极力使企业经营目标的利润最大化蜕化为职工工资收入最大化或福利最大化。我们认为，在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同时，应正确界定企业利润分配中包含的国家利益、职工利益以及法人代表利益，以保证企业的追利行为能够体现出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同步增长。

再看投资者的追利性。如果投资是指直接购买厂房设备进行生产，人们是否投资取决于对利息率和预期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的比较。预期利润率大于利息率，他便进行投资。如果把投资的含义放宽为购买证券或其他财产，人们是否投资主要在于衡量资金的机会成本。无论如何，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比先前垫付资金更多的收益。

政府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人，如果它直接投资于生产领域，其追利性也无非是获得最

大利润；如果投资于公共物品，则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把用于公共物品所需花费的成本与它可能带来的效益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来决定公共物品是否适应生产。当然，当政府把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如充分就业、物价总水平的稳定、经济增长等当作自己的行为目标时，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追利性就要受到影响。

（三）竞争性

确立了利益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人，其自主性与追利性必然通过市场行为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人的行为特征是竞争性。

竞争的一般涵义是互相争胜，努力超越对方。竞争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上，有下列三种形式：卖者（实际的和潜在的）之间的竞争，买者（实际的和潜在的）之间的竞争以及买卖双方的竞争。卖者间的竞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有利的销售市场和购买者（这里略去对生产要素市场卖者间竞争的分析）。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常常把卖者所处的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四种类型。卖者在这些市场上的最重要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为了能以较低的价格赢得市场和顾客，那些处于竞争优势的卖者（如企业），就必须以低的成本和高的效率进行生产。但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由于必须考虑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的效用（与效用有关的不单单是价格，还有主观或客观存在的产品差异），因此，卖者竞争更倾向采用非价格竞争的方式，如产品质量、营销渠道、促销手段、公共关系、售后服务等方面展开的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上，作为卖者的经济人（各类企业与个体户），为了实现各自的最大利益，不仅采用价格竞争的方式，如1989年出现的彩电、冰箱、电扇价格大战，而且更多地采用诸如广告、售后服务、营业推广等非价格竞争方式，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并且通过竞争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买者间的竞争主要是争夺有利的购买场所和商品出卖者。在消费品市场上，消费者总是选择最佳的购买场所，力争购买最适合自己需要的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势必会形成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如以高价购进商品，或降低自己的需求品味屈就现有商品的品质、式样、包装、色彩等。理论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从长时间看，“需求将自动创造供给”，但由于供给能力有限（生产能力、资源条件等），上述情况总会在短期内程度不同地存在。如一些创新产品，一时间激发了顾客需求欲望，顾客就会争相购买。反过来看，消费者的这种竞争必然促使更多的新产品上市。而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作为买者的企业为了购买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生产，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不过，由于生产要素市场还未完全建立，买者之间或卖者之间的竞争还未能充分展开。

在社会主义市场上，买卖双方的竞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各自的最大利益。作为卖方的企业，总是想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和尽可能多的销量去占领市场，使商品销售总收益减去成本后的利润能够最大；作为买方的消费者，总是想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自己最满意的商品，使其效用最大。一般地说，在买卖双方的竞争过程中，消费者显得更为主动和有力，因为他拥有选择商品的权力，能够自由地决定“消费者选票”的投向。特别是在现

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企业的生产销售是以市场为导向,消费者为中心,买卖双方的竞争最后常常转变为卖者之间的竞争。例如,某种商品卖者所定的价格与买者打算支付的价格有差距,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或许最终会造成一个提供较低价格和较高服务质量的新的卖者出现。要说明的是,如果交易中卖者用欺骗手段对付顾客,他的竞争者将夺去他原来的顾客。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买者也可能组成“消费者协会”或其他团体来抵制和揭露卖者的欺骗行径。

社会主义经济人在生产、交换、消费领域展开竞争,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好处是明显的。如,竞争有助于减少浪费,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竞争不允许生产者浪费时间资源;竞争能保证消费者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称心如意的商品;竞争能培育和完善的优胜劣汰的社会机制等等。

(四) 预期性

处于变化着的宏观与微观环境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在生产经营决策过程中应该具有预期性。

所谓预期性,就是“对经济变量的未来价值的信念或看法”。(见皮尔斯编《现代经济学词典》,宋承先等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口、经济、自然、科技、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竞争者、公众等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它们常常表现为各种经济变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人的决策。社会主义经济人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进行正确的预期。按照西方合理预期学派的观点,只有当人们对经济变量未来价值的信念或看法与今后经济发展的事实吻合时,人们的预期才是正确的、合理的。也只有当人们的预期正确合理时,才可能谋取最大利益。当然,人们在预期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完备,主观判断能力有限,缺乏足够的理性等等,完全有可能产生一时的失误,但从长期来看,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总会及时纠正错误,力争搜索更完备的信息,使自己的预期尽量与发展着的现实情况吻合。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理性的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就应当对政府政策进行正确的预期,并采取相应的生产经营对策,创造出一个既符合国家政策又用足国家政策的“小气候”,加快自身的发展,获得最大的利益。

合理预期,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最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包括那些明显的统计资料和那些藏匿于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知识。当然,仅仅有了充足的信息还不够,在计算工具广泛使用的今天,经济人为了避免自己主观判断失误,应使用先进的计算技术建立数学模型来求取经济变量的未来值,使自己的决策尽量朝着实现最大化利益的方向推进。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系 苏州市职业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对按劳分配的新认识

高伟梧

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那么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如何认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与理论呢?这是分配制度改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 市场经济所能实现的社会分配。

现实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全社会的直接生产也就不可能是全社会的直接分配,只能是通过企业组织形式来组织生产、交换和分配。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层单位,同样要求成为社会分配的基本单位,在企业进行初步分配。企业的分配对象不可能是具体的劳动产品,由企业把产品交给国家,然后通过全国统一的劳动券形式进行劳动分配的设想起码在现阶段是不切实际的。事实早已证明完全由国家集中调配产品是行不通的,只能由企业产销见面直接交换。这样,企业产品销售后所得的是价值,就不是个别劳动直接等于社会劳动量,社会所承认的只是必要劳动量。要是经营不善,产品销不出去,或者价格偏低,企业就要亏损,不可能实现正常的分配。就算是正常的情况,所实现的产品价值中,生产资料原价值转移的部分C,首先必须扣除,否则不可能继续再生产,C的扣除是补偿而不属于产品分配,实际上分配的是扣除了C之后的新创造的价值部分。

新增值部分应怎样分配?从前的国有企业将其分作两部分:一是职工的劳动报酬,一是上缴国家的税利,企业没有提留,也就没有积累和自主权。企业没有自主权就不是健全的企业,真正的企业是资金运动的主体,企业要能自我积累才能自我发展。改革之后,国有企业产品销售所得扣除了原材料成本的新价值就分为三部分:职工的工资、国家的利税、企业的留成。这三个部分应怎样界定呢?

首先说工资。有的同志提出新成本观念,认为成本只有原材料C,工资属于利润分成,利润

就是所创造的价值,不是扣除了工资之后的剩余价值。这样,新价值就分为工资、税利和企业留成。劳动工资分配的根据与标准是什么呢?怎样界定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呢?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自主劳动就应自主分配,不应是资金利用劳动者,而应是劳动者利用资金,劳动成果应归企业联合劳动者所有,按照社会需要扣除之后由联合劳动者自己分配,企业的积累与消费比例由联合劳动者自己决定,扣除企业的积累留成,就是按照职工的劳动贡献分配给个人。劳动贡献与成果的分配比例可大可小,又应怎样确定?如何实现对企业的约束,克服短期行为,不至于产生片面追求个人分配的最大化?事实证明,国家把利润都拿走了,必然挫伤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企业得不到扩大再生产,国民经济也就得不到发展;而由职工把企业的利润分光,企业与国民经济同样得不到扩展,劳动者的长远利益也要受损害。

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①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即使同是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使用的范围和程度也有区别,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组合,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占有使用权决定收益权,同时通过收益权来实现。劳动者要求劳动力的消耗得到补偿,同样,土地所有者、资金所有者也都要求实现自己价值的增殖,通过增殖,增加社会生产资料,推进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必然是按照自身固有规律运动,各自要求取得增殖与收益,而不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资金的无价格利用,必将造成对资源的大量浪费,完全由行政机关来无偿调拨资源,违反市场规律,也必然是贿赂贪污现象禁而不止。由于供求竞争的推动,所有生产要素都转化为资金,都要求获得资金的平均利率。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也要参加价值分

配，而不光是劳动力资源所有的劳动者，显然，由劳动者任意决定价值分配比例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能只考虑个人的目前利益，还要考虑社会总体的利益。

资金是对社会生产资料占有的一种所有权形式。为了维持或扩大社会再生产，生产资料必须得到不断的补偿与增殖，补偿是使生产资料不受损失，增殖就是增加社会生产资料，这是社会得到巩固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作为社会生产资料价值形态的资金运动，是体现着社会物质基础的运动与要求。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不会因所有制的不同而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在全社会实行联合劳动者与物质生产资料的新型关系成为可能，物质资料不再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社会主义是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开始实现对物的统治与支配，但这还只是在全社会的总体上；在具体企业中，资金仍然是组织生产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中介，还须以价值的运动来带动物质资料的运动，作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实现形式。所以，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劳动者调控资金，在具体企业中还不可能是劳动者“雇佣”资金，成为资金运动的主体；劳动力还是作为被利用的生产要素，它的增殖通过资金增殖实现；劳动者联合体还须尽可能增加企业的资金积累，推动生产与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创造的价值必须在劳动力、资金与土地三方面分配，三者的比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于各自的价值，决定于供求与竞争所决定的价格。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承认劳动力的商品性质，不然，我们就难以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中区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与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卓炯同志说：“否定了劳动力的价值，也就否定了商品价值区分三种价值因素，因而也就取消了量的分析的可能性。”^②这是有见地的。资金与劳动力的关系首先是由商品生产一般的过程中确定的，表现为不变资金与可变资金。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过程中量的关系也就决定分配中的量的关系。

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着市场经济共有的资金增殖规律和工资规律。工资规律就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调节着工资水平，工资围绕着劳动力价值或价格上下波动。企业职工工资的基础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才能确定企业与职工利益分配的量的界

限。企业的劳动成果完全是劳动者创造的，要是完全根据劳动贡献分配只能是区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但不能确定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明确国家、企业与劳动者的分配关系。

经济学家冯兰瑞说：“社会主义，在通常的情况下，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M，总是会分成M₁、M₂和M₃三部分，M₁用于生产领域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和提高生产领域劳动者的生产水平；M₂用于国家的各种公务消费……；M₃用于扩大社会再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用于劳动者个人的，总是等于由劳动力价值所决定的必要产品的数量同剩余产品中用于提高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那部分产品的数量两者之和。”^③这就是V + M₁，是符合实际的。如此劳动者的工资就必须计入成本，这也是“全民企业条例”所明确规定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还是C + V + M，而不仅仅是C + M。有人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对价值的三位一体的分割，新价值分解为V + M，社会主义是联合劳动，劳动者是主体V不构成成本，更不应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其实，新创造价值分成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市场经济的共性，即是一般的分配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才存在剥削，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因为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实体与主体，有不同的产权与收益权，同样也会对价值产生分割，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割，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的价值分割不能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社会主义分配更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生产资料生产资源归全民所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只能在社会劳动者中进行分配。所以，承认按资分配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二）现实的社会分配与传统的按劳分配区别

由此，从根本上来说，现实企业的工资分配跟传统所认识的按劳分配是不同的。

（1）从整个社会经济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样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存在于、从属于生产要素分配。但因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要素统归联合劳动者所有，劳动者生活消费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成为区分劳动收入高低的主要尺度，可以说是一种按资与按劳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2) 企业是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因而也就是社会分配的主体。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社会的直接分配,能够分配的只能是通过交换后实现的产品的价值;国家与企业之间不是按劳分配的关系,除了必要的社会扣除,还存在按生产资料投入量即按资分配;企业之间是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实现企业劳动价值的途径。

(3) 以货币为实现分配的形式。分配,既然要借助于价值形式,就必然要求实行货币工资制;劳动者领取的不是劳动券,而是地地道道的货币,这货币也不是一些同志所说的在企业内起着劳动券或内部证书的职能;劳动力是商品,从特定意义上说,也是货币,因为是货币也就必然存在市场的再分配。

价格是市场再分配的杠杆,这价格不止是物价,还有工资、利息、汇率等等,是广义的价格。由于资源稀缺性以及可替代性程度不同,由于科技转为生产力的进度不一样。还由于社会、人口的种种变化,价格体系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存在着不断上升的趋势。市场进行着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通过市场交换,职工的货币收入不但因所得实际利益不同而拉开差距,而且还可能引致直接的间接的投资,变成资金和资本。

(4)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直接决定于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工资受市场生活消费品物价的影响同时也直接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既然现实中存在着市场经济模式的工资规律,价值规律也就不只是影响着或调节着社会的工资分配,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工资的总水平以及工资与实际消费水平的关系等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工资分配的计划,必须建立在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

(5) 劳动不是唯一的分配尺度,其它生产要素也要参与分配,取得收益,除了按资分配还有其他的标准与方法,按岗位分配、按能力分配等等,总之是多种标准与方法并存。

(三) 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按劳分配

一种意见是传统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按劳分配的实质不变,变化的只是实现形式,即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这是因为,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所决定的,商品经济是经济的运行形式,是表层的经济关

系,改变的只能是分配形式。还有一种类似的观点,不过不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论证而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分析。他们认为,按劳分配与商品交换是同一原则,商品经济条件下同样能实现按劳分配,只不过是处于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低,显得不成熟,“劳”中掺合有某些非劳的因素罢了。所以不能说传统的按劳分配被否定了,而只能说未得到完全的实现。有的同志更进一步推论和以事实证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按劳分配是无法得到实现的,而必须通过商品经济,通过市场,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才能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彻底克服平均主义,按劳分配也才真正得到实现。持相反意见的同志则认为,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传统的按劳分配已经被否定了,因为已经不存在非商品货币关系的前提条件。在商品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为商品,劳动成果表现为价值,不只是分配的形式与标准改变,分配的功能与根据都不相同,是不应再套用“按劳分配”的。

我认为首先要确定我们所要研讨的具体对象是什么,是按劳分配的形式,是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还是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再生产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不可能存在非商品货币的关系的传统的按劳分配的体制,历史事实早就证明,现实经济条件下强制推行传统的按劳分配,只能搞绝对平均主义,挫伤劳动者积极性;分配制度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就不可能坚持下去。现行的工资分配制度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方式与形式,不再是由中央集中起来进行分配的直接的实物方式与形式,而且还否定了原有的按劳分配的一些具体原则,如排除物质资料条件的影响,看重个人劳动的贡献等等。所以,我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产品的分配方式、形式以及体制,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应该说传统的按劳分配是被否定了的。不过,马克思创立的恩格斯列宁发展起来的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与思想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否定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不为经济的实现形式而改变。主要的是:(1)在联合劳动者内部进行分配;(2)社会进行必要的扣除,保障社会积累和公共基金,反对“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3)以劳动贡献为尺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反对不劳而获;(4)承认劳动收入以及家庭实际生活消费水平的差别;(5)劳动

生产资料流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赵 玲 玲

生产资料流通,在我国又叫物资流通,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风风雨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它的命运与商品交换关系、市场经济的命运是共同的,长期以来被忽视、压抑。生产资料被完全排斥在商品流通之外,物资部门则是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里管得最多、统得最死的部门。改革开放以来,突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1938年开始了物资体制的改革。国家缩减了指令性分配物资的种类和比重,扩大了生产企业的产品自销权,改进了计划物资的供应方式,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出现了多渠道并存,多种经济成份经营,生产资料市场初具雏型的局面。然而,生产资料流通领域的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相比,步伐太慢。时至今日,还有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物资企业不少仍依附行政体系,生产资料市场发育迟缓,全国统一的开放的生产资料市场远没有建立起来,生产资料流通仍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仍然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严重的障碍。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就必须从思想认识上、理论研究上和实际生活中重视生产资料流通,了解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使生产资料流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是权利也是义务,必须对劳动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劳动纪律;(6)消灭剥削,共同富裕。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和思想,而不应该是具体的方案方式和体制,原来“哥达纲领批判”所提出的分配思想只不过是按劳分配的一种模式。但是我们过去把它看成是按劳分配一般和社会主义经济一般,不只是分配的一种体制而是基本经济制度,谁不这样做,谁提出异议,谁就反对社会主义。事实恰恰相反,以传统的模式贯彻按劳分配,却达不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劳动分配所提出的最根本原则与要求,不可能是多劳多得和共同富裕,只能平均主义和普遍的贫困,结果失去了应有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束缚了生产力

中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第一,生产资料流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和必经阶段

市场是一种经济关系,“是商品所有者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同时,它表现为一种运动,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不断循环来实现市场的经济功能,而流通是运动过程的特定的必经阶段。《资本论》第二卷专门论述和揭示资本和商品流通过程和规律。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资本循环要正常地顺利地进行,必须不间断经过三个阶段,发挥三种职能(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职能),并且要时间继起、空间并存,否则,这个循环就会受到阻碍,就要中断。这个循环经过的三个阶段中,有二个阶段是流通阶段,即 $G-W$ 和 $W-G'$ 。 $G-W$ 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生产资料流通的阶段。生产企业要进入生产,就必经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生产企业购买燃料、原料、工具和设备,如果这些物质条件不具备,就无法进入生产过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或者叫细胞,是千千万万个各类各样的企业,如果绝大多数企业在第一阶段就碰到困难,市场经济的微观系统就难以运作,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 $W-G'$

的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深化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否定传统的按劳分配的体制模式,也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则与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重新塑造按劳分配的新机制与新体制,而不能是在原来的旧体制上进行某些适应性的修改与补充。

“市场经济必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有的同志又这样提出问题。上面已经阐明,生产要素商品化,通过价格竞争,促进资源向价格高的部门与企业流动,才能节约资源,优化组合,提高效率与效益,这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与优点,然而承认生产要素产权的收益,并不是要否定按劳分配,因为劳动力不只是生产要素而且是和物的

是第三个阶段，也是流通阶段，即产品成为商品，商品售卖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成为商品售卖出去，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就无法实现，企业的生产成本无法补偿，资金就不能周转，再生产就不能进行。这两个流通过程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也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对于这两个流通阶段与生产阶段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正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统一，才构造了商品经济，正因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才使得商品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市场离不开流通，流通初始阶段是生产资料流通，所以说，生产资料的流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前提和必经阶段。

第二，生产资料流通影响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是整个社会流通的基础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时候，研究了第Ⅰ部类生产资料和第Ⅱ部类生活资料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不仅是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上补偿已经消耗掉资本价值的过程，而且是在实物形态上补偿那些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过程。这种双重补偿实际上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市场流通问题。而实物形态的补偿，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一个现实和重要的问题。由此，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需要具备这

要素相对应的另一个方面的要素，在价值构成中物的要素是价值转移，劳动力要素除了要补偿自身的价值以外还创造新的价值。物的要素、资金参与分配，实现收益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表现为国家、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分配关系，也是属于企业的与全社会的联合劳动者，也就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扣除；劳动者个人之间的经济上的差别，主要地决定于劳动收入；劳动报酬仍以劳动为尺度，只不过这“劳动”应是劳动力的价值，对物化劳动成果，不再是个别的自然的劳动时间或者活劳动量，对劳动者个人还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物质的生产要素的产权收益是国家与企业所有，也即联合劳动者所有，表现为劳动者的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就不会产生剥削，就不会因之而否定社会主义与按劳分配。

样的比例关系，即实现公式： $I(v+m) = IIc$ 。这个等式体现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表明，要使整个社会的简单再生产和流通过得以正常进行，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 $I(v+m) < IIc$ ，第Ⅱ部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就不能得到补偿；如果 $I(v+m) > IIc$ ，第Ⅰ部类就会有一部分的生产资料不能实现，社会流通过到了困难，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了破坏，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就无法进行。正因为第Ⅰ部类在社会生产、社会流通中的先决作用，列宁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把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列为一条经济规律。优先增长原由于先导需求。可见，生产资料流通状况对两大部类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是重大的。

社会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得经过流通，而任何流通或多或少都与生产资料流通发生关系。比如劳动力的流通，它必须与生产资料的配置相适应，有多少机器就得雇请多少劳力；再比如生活资料的流通，也与生产资料的流通密切相关，吃、穿、用、住、行没有一样离得开生产资料，即使享受资料也离不开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流通的状况影响绝大部分生活资料的生产、销售，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利益，而任何购买行为都是货币的流通，从而生产资料流通也间接或直接影响货币的流通。所以说，生产资料流通是整个社会流通的基础。

按劳分配为主应当是劳动者或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收入以劳动（包括经营性劳动）收入为主，不应把按劳分配为主理解为以活劳动为主，更不能认为按劳分配就是坚持传统的工资分配制度。

- ① 马克思：《经济政治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98页、第264页。
- ② 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中国财经出版社，第117页。
- ③ 冯兰瑞：《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十二版，第177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谭湛明

第三，生产资料流通体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功能

市场经济优势功能施展的主要场所在流通领域。生产资料的流通，体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功能。在所有的物质资源中，生产资料是我国重要的、最基础而又紧缺的资源。市场配置生产资料资源的过程，就是生产资料按照市场需求流通的过程。市场经济配置物资资源的主要手段是生产资料价格。通过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调节微观经济活动，实现需求导向性的资源配置。通过生产资料价格的调节作用，促进了短缺资源的开发即短线产品的生产，控制了长线产品的生产，从而实现资源的短期有效配置。

第四，完全放开的、通畅的生产资料流通是企业通向市场的桥梁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不是通过生产资料流通获得，而是靠计划指标部门调拨。改革开放后，努力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最近又提出把企业推向市场。要把企业推向市场，从企业内部来说是经营机制的转换，而经营机制的转换必须提供一系列的外部条件，其中，完全放开的、通畅的生产资料流通是搞活企业、把企业推向市场的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首先，企业活力的增强主要依靠生产资料流通。企业活力的标准是“六个力”，其中四个力即“产品竞争力”、“技术开发力”、“资产增殖力”、“对市场应变力”均是在流通领域，尤与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关系密切。由于我省的生产资料市场建立较早，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省乡镇企业的原材料80%通过生产资料市场购得，大量的生产资料制成品、加工品在生产资料市场流通，使得乡镇企业的活力大大增强。其次，生产资料流通顺畅与否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流通中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一是流通时间（包括购买和售卖时间）。生产资料流通时间越长，生产过程的更新就越慢，它对生产时间是一种限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很大。二是流通费用。流通费用的节省，等于增加企业的收入。我国生产企业的流通费用相当高，占商品总成本的40%左右，这是一种浪费。如果能降低流通费用，将大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三，完全放开的、通畅的生产资料流

通给企业提供了平等竞争的环境，从而也给公正评判企业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条件。可见，生产资料流通的完全放开和通畅是把企业推向市场的重要外部条件。

第五，开放的、规范的生产资料流通是与国际物流接轨的重要环节

市场经济没有国界，生产资料流通同样也没有国界。我国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一旦国门打开，各行各业包括生产资料流通状况就要向外透明。这既是对我国生产资料流通企业的挑战，也是发展生产资料流通的历史契机。生产资料流通在国际上通称“物流”。国内落后的生产资料流通如何与国际物流“接轨”？这是个难题。现今国际上生产资料流通非常发达，其现代化、社会化水平相当高，且随着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生产资料流通也走向国际化。现有的物流跨国公司二万多个，年总销售额占国际贸易额的一半。返关后，国际物流状况对我国生产资料的生产、流通是一大冲击。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把压力变为动力，搞好生产资料流通，按照国际物流的惯例，积极发展外向型的、规范化的生产资料流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生产资料流通的重要性以及与市场发展的相关性决定了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起重要作用。可以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起来的关键。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时期，必须创造条件，使生产资料流通向完全市场化转变。

第一，要有发育正常的生产资料市场

从总体上看，目前生产资料市场发育缓慢，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一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这是生产资料市场发育不良的重要表现；二是条块分割，地区封锁；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只有尽快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才能使生产资料市场良好发育。首先，生产资料价格的计划价要尽快取消，向市场价并拢，否则，市场信号扭曲，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分配、消费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其次，要尽快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建立全国统一的生产资料市场体系，使生产资料自由流通。其三，要尽快培育和完善

关于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问题的探讨

谢礼生 曾昭武

将我国经济溶入世界经济进程之中,这既符合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对调节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将起更加重要作用。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将提到议事日程来。

一、实行汇率制度改革及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为适应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现行外贸和汇率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建立由国家宏观调控、市场供需决定的汇率制度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1991年,我国对外贸和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外贸补贴,对外汇留成及使用进行

新型的流通形式,如发展配送业,期货市场,推广企业“零库存”,建立跨国公司等。最后,要制定生产资料流通的法规如营销法、反垄断法等,同时,要整顿生产资料流通秩序,公平交易,平等竞争。

第二,搞活国有物资企业,处理好主渠道与多渠道的关系

现在,国有物资企业已从“皇帝”变为“平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但目前其组织结构、行为规范上还带有深刻的行政性烙印,有的至今仍是行政性公司,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很远。国有物资企业必须与其主管的行政部门彻底分离,搞好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塑造自己,真正建立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成为完全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目前要尽快组建大中型物资企业集团,实行规模经营,集约流通,发挥“主渠道”的优势,同时要处理好与辅渠道、次渠道的

了调整,把按地区分配外汇的办法转变成按产品分配的办法,给几十家大中型企业以直接贸易权,这对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就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趋势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而言,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显然还不够。特别是汇率制度和人民币自由汇兑问题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已成为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企业面对国际汇率变动风险,不能直接参与国际外汇市场的运作和外汇交易,没有足够躲避风险的手段,这必诱使企业对外经济行为趋于短期化及简单化,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关系。生产资料流通的多渠道是与我国现阶段多种经济成份相适应的,这是发展市场经济、搞活流通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在这众多的流通渠道里,必须坚持主渠道的主导地位,才能保证国家掌握生产资料重要物资,调控生产资料流通,稳定生产资料市场,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的需要。

第三,生产资料流通必须尽快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我国生产资料流通社会化、现代化水平很低,流通太过分散,流通效益差。不少企业自产自销,供销人员满天飞,仍处于小而全、大而全的封闭状态,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很不适应。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往往市场经济越发达,其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社会分工就越细,生产对流通的依赖就越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流通是作为一个专业性的产业来独立发展的。其实,生产资料流通的特点也要求

二、现行复汇率制不符合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要求

目前,我国出口商品实行以官方汇率结算,而进口商品如无足够的外汇指标,则须用调剂价格买入外汇方可进口。国内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与官方汇率有一个差价,一般比官价高,加上高估人民币值与黑市汇价有较大的差距。由于事实上的有价无市,因而企业需要外汇时,常常难以及时购入,致使企业的正常经营受阻。

由于汇率制度不合理,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严重脱钩,企业生产经营无法正确核算,直接影响国际竞争能力,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现行内部结算价格造成许多出口产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亏损,出口的换汇成本高于国家规定的结汇牌价,造成许多创汇高的产品出口越多,亏损越大,外销不如内销,无法形成出口刺激杠杆,累积了出口创汇的惰性。

由于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不能正确反映外汇市场供需状况,就不能合理地调节外汇资源的使用,使一些耗汇型企业用汇成本低,从而滋生了不合理的用汇现象,加剧宏观上外汇需求缺口。

汇率的经济调节功能,从本质上来说,是调节商品的进出口,以比较利益调节各国资源的配

实行专业化经营。实行专业化经营能对厂家、用户及时供货,省时省力效益高。此外,在发达国家,生产资料流通设施先进,有四通八达的销售网络,物流管理也相当科学。流通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大力发展流通产业。首先,生产资料流通必须实施独立的专门管理,生产企业应将物流活动让渡给生产资料流通企业。其次,必须规划开发现代化的包装、仓储、运输、流通加工等物流设施、技术,加速生产资料流通的现代化。其三,必须培养大批生产资料流通技术和管理的专业人才,提高生产资料流通的服务素质。

第四,加强宏观调控,减弱或纠正市场经济的负效应

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对经济生活会产生负效应。在生产资料流通中,完全的市场调节会产生“短期效应”。凡是销路好的生产资料盲目增产,投入流通,短期内虽缓解了供需矛盾,

置。而要充分发挥汇率机制对外汇供求及其流向的调节作用,只有建立外汇市场,实行外贸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议定,由市场供需决定,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货币,这样才能使稀缺的外汇资源随着汇率的变动而流向效益较高的企业,使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重竞争中寻找自己的最佳发展道路。

三、新兴工业化国家汇率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汇率制度的发展都是随着本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步伐而逐步改革的。其遵循的轨迹基本上是由严格的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较浓的行政干预色彩、复汇率制、本币不能自由兑换转向比较宽松的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较少的行政干预色彩、单一汇率制、本币可以自由兑换外币的,其特征是行政干预的淡化,经济运作以市场供需调节为主。

如经济取得惊人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和近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不俗成绩的泰国,都是在经济发展早期就着手对其外贸和外汇管理体制,特别是汇率体制改革。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转轨的准备阶段和转轨

但从长远来看,将会破坏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和各类产业的协调发展。另外,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企业、部门、地方行为短期化,相互间会发生利益冲突。这就需要国家政府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和调节,实行有效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减弱或纠正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国家政府为了实现对生产资料流通的调控,必须提供一个宏观环境,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生产资料供给略大于需求,这样,生产资料市场才能相对稳定,便于调控。同时,国家必须制定、颁布一系列生产资料流通的政策和法规法令,建立生产资料流通信息网络,咨询机构,做好对生产资料市场运行的监控,使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结合,短期经济利益与长远经济利益相结合,地方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相结合。

作者单位:广东工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石成

之后,为了使汇率正确反映市场供求状况,都采取了取消复汇率制和多次对本币进行贬值的措施。

台湾1935年将10多种汇率改为复汇率,1939年实行了单一汇率,使台币成了自由兑换货币,其间还于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三次将台币贬值,幅度分别为71%、53%和31%。80年代以来,台湾更是加速了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至1992年5月底止,台湾的外汇存底达845.8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

香港历来采取高度自由化经济政策,实行单一汇率制,港币可自由兑换与流通。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他们采取了港币固定盯住美元,保持1美元等于7.8港币的固定汇率制。许多经济学界人士认为,香港经济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与实行联系汇率制分不开的。

南朝鲜60年代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制订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改变复汇率制为单一汇率制,同时对南朝鲜元进行了多次贬值。1962年至1972年,南朝鲜的出口额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80年代中,其汽车工业又打入了美国市场,令美国人刮目相看。

新加坡70年代初,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金融业上,逐步形成了金融机构门类齐全、资金雄厚而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建立了“亚洲”美元市场。在此基础上,其汇率制度更具有自由度较高的特点,成为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7年泰国也是采取复汇率制,存在一个与官方汇率制相平衡的自由外汇市场。1955年底,官方汇率取消后,采取了单一的汇率制度,不仅推动了其原有商品的出口,同时还促使新的出口商品出现。1956年以前,泰国玉米产量甚少,到1962年,则一跃成为世界玉米市场第五大出口国,出口产值约2400万美元。^②

上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实行单一汇率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外向型经济发展走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步骤。

四、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背景

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建立合理反映市场经济活动的单一汇率制和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的现实条件如何呢?

从宏观上看,我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了市场机制,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机制趋于成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从外汇管理制度而言,80年代引入和建立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1980年10月开始开办国内外汇调剂业务。经过10多年的发展,外汇调剂市场经历了一个从建立到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从市场形式看,经历了从中国银行调剂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建立了专门外汇市场参与调剂的过程。

从调剂主体看,经历了从现汇调剂到现汇调剂和额度调剂并存的过程。

从调剂价格看,经历了逐步放开的过程:开办之初,规定外汇调剂价格以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1美元兑2.8人民币)为基础,加10%浮动幅度,即以1美元兑3.08人民币为最高限价。

从调剂规模看,交易量越来越大。1980年调剂外汇只有几亿美元,到1988年已增加到85.66亿美元,1990年已增至100多亿美元。^③

虽然我国外汇调剂市场已获得一定的发展,引入了一些市场经济机制,但仍不能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一)外汇调剂范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目前还有许多居民和个体经济不能参与外汇调剂,即使开办了个人外汇调剂市场的地方,也对个人参与调剂的条件规定的太严,外汇调剂价格限定得较低,而且只准调出,不准调入。这样,无疑抑制了境外侨汇和其他外汇的流入,并且助长了黑市交易,对外汇调剂市场的发育成熟十分不利。加之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各地外汇调剂相互封锁的现象比较严重。集中表现为在市场外汇紧张时,以行政手段限制本地外汇调出,而当市场疲弱时,则限制外地外汇调入,其结果是使跨地区的外汇调剂受到严重障碍,影响了外汇资金的合理流动,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同时外汇调剂市场仍未能改变我国复汇率制的现状。

就我国来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充分自由兑换和建立浮动汇率制,使之高度的自由化、国际化。近期首先应是实现人民币的国内自由兑换。换言之,即是在统一和完全放开国内外汇市场的基础上,人民币汇率从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及黑市汇率并存的多轨

制向统一的单一汇率制过渡,不再公布官方汇率,或仅仅公布参考汇率,汇率由外汇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决定,国家则从宏观上,以外汇市场的干预、资本管理、货币政策,包括利率、贴现率及存款准备金等,如果国库券能发展到美国国家债券发行的水平,国家还可以用证券市场的干预及公布参考汇率来影响人们的买卖心理来间接地影响和管理汇率,使汇率围绕目标汇率上下小幅度地波动。这也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汇率管理的经验,完全可以为我们所引用。即使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汇率制度都是以政府间接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为特征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纯自由浮动的,比较著名的有欧共体(EEC)的“洞中蛇”汇率管理体制及EEC中荷、比、卢三国的“洞中小蛇”汇率管理体制。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与之相配套的是必须继续放松外汇管制,让国内所有厂商及个人均能自由而不受限制地用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实现人民币的国内自由兑换,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自由兑换。这一近期目标,完全可以进入试行阶段。因为我国目前已具备了基本条件:1.经济、金融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到1992年,我国外向型经济贸易比已达到19.3%,高出出口大国的日本,进出口贸易在GNP中的比重已达到33%,出口额达到71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3大出口国。近几年,“三资”企业逐年增多,总数已达3万多家,外商投资已超过800亿美元,④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国大财团和金融机构也加入到此行列中来。2.外贸体制改革富有成效,商品出口结构有了进一步改善,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较猛,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有了较大提高。3.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1990年底为283.9亿美元,1991年升至426.6亿美元,增长49.2%。4.外汇调剂市场已初具规模,且发展较快,正逐渐向高层次发展。

(二)但是也要注意在近期目标试行阶段解决的几个问题。随着外向型经济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其趋势应向国际标准的外汇市场发展,形成两个层次的外汇市场:第一层次是国内外汇市场。它的基本功能是实现本币即人民币与外币的相互转换,故又可称为货币兑换市场;第二层次是国际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挂钩,主要办理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主要起到以下几个作用:1.清算作用,充当国际经济交往的支付手

段和清算手段,实现购买力的无国境限制的自由转移;2.融资和资本流通作用;3.避免风险作用。外汇市场既可开展现汇交易,更重要的是进行期汇交易,以套期保值来逃避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外汇市场最基本的条件是本币的自由兑换性。只有人民币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与外币以及外币与外币才能在我国进行自由兑换,国际资本才能自由流入、流出,才能真正建成国际外汇市场。

从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撤销外汇管制,无论本币、外币都可以自由买卖,建立自由外汇市场,是其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信号。香港1973年建立自由外汇市场后,提高了港币的国际地位,港币有价证券也进入了国际证券市场,其经济也步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五、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的前提

要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吞吐外汇资金,调节外汇平衡,平抑外汇价格,以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外汇平准基金人民币部分可由中央银行拨出专项基金,外汇部分可由国家外汇储备中拨出。香港政府建立的旨在稳定港币汇率的外汇基金,就值得我们借鉴。根据1992年7月港府公布的数字,1991年底香港外汇基金为2360亿港元,外汇基金持有的外币储备相当于290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12位,人均5000美元。有雄厚的外汇基金前提下实行的与美元固定联系汇率制,是香港经济在80年代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1991年底的外汇储备是426.6亿美元,西方经济学界人士认为,如果我国坚持现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按照目前的趋势,即保持进出口增长率大致在每年15%的水平,到199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将达到740亿美元,这个中等数字看来是可能性最大的结果,即使因美国、西欧等国施加压力,或我国正式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而放宽进口额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也可达到580亿美元。⑤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外向型经济正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发展势头很好,外汇储备稳步增长,为我国建立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为目的外汇平准基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底,中国银

行由1990年在世界各大银行排名中的第30位上升至第22位。^⑥

2. 人民币进行适当的贬值。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起飞的实践看,在经济步入迅速发展的阶段,总是先对其汇率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汇率制度的改革,又总是以本币对外币的贬值为前奏的。因为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总是处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时期,而在此前总要经历了一段进口替代时期。进口替代时期汇率制度是以本币对外币的高值为特征的。因为高值本币汇率起鼓励进口替代的作用。步入出口导向型时期,对本币进行适时适当的贬值,将原本高值的本币汇率转变为由市场供需机制形成的实际汇率,有利于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起到刺激出口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人民币兑外币币值进行适当的贬值,是否能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增长的,仍有一定的争论。

反对贬值的认为用本币贬值的方法来促进外向型经济有一定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贸易弹性条件必须成立,即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当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都为无穷大时,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绝对值之和必须大于一。

从我国改革开放10多年的实践经验看,反对人民币兑外币适当贬值的论证过程及其结论均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在-0.35左右,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为-0.86左右,两者绝对值之和大于一,^⑦且我国1985年10月30日开始把汇率下调至1美元兑3.20元人民币,并随后连续进行了几次贬值。最近一次贬值是1990年底,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5.44人民币,其效果是较好的。随着这几次人民币兑外币币值的下调,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

从我国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日益要求参与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所揭示出的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不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现行汇率背离了市场的真实供求关系,从而必然在稀缺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造成严重的效率扭曲,使符合经济原则的资源配置受到阻碍。要解决这个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难题,必须使仍然存在的人民币兑外币汇率适应市场要求。

六、人民币兑外币汇率贬值的机会

从我国目前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人民币兑外币贬值恰逢其时,因为:

1. 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率不高。物价上涨的幅度不大,此时人民币贬值引起的物价上升不致于引致通货膨胀,从而可以避免经济和社会的震荡。

2. 国内可供出口的资源 and 可供生产出口商品的资源缺口在逐渐缩小,出口势头好,国内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较低。近年来均保持出超大于入超,1990、1991年连续两年出超均达100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增长幅度较大。在此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后,出口增长及减少不必要进口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在目前非必需消费品进口压力逐渐增大的形势下。

3. 国际市场环境和国际经济变动趋势对我国商品的出口及外资流入均比较有利。目前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经济正在重新分工,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夕阳工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利用人民币贬值作为手段,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分工份额,扩大出口。一些资金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可因此获得发展,如计算机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医药工业等等。

4. 1990年人民币兑外币贬值的时滞效应已基本实现。从理论上分析,本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增加外汇储备,但要发挥这一作用,需要有一个时期,通常本币贬值的最初阶段此作用非但不能发挥,而且适得其反,只有经过一段时期,一般为12—15个月后,其本币贬值的正效应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界所说的“丁曲线时滞效应”。

我国最近一次人民币贬值是1990年底,至今已近两年,其“丁曲线时滞效应”已得到充分发挥。且就现在外汇调剂市场及黑市情况来看,官价人民币低于外汇调剂价,外汇调剂价又低于黑市价,显而易见,人民币兑外币仍存在高估现象,市场供需信号反映人民币尚应有较大的贬值,才能真正反映人民币兑外币的真正价值,近期内对人民币进行适当的贬值是势在必行的。

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兑换自由化进程的经验来看,本币贬值的幅度,一次不宜超过75%,同时也不应低于20%,否则将难以发挥本币贬值的最佳作用。我国现行人民币官价经多次贬值

特区房地产业发展初探

张 旗

特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区,它的十几年试验与实践,风风雨雨,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艰难过程与决心,也许正因为此,它所迈出的每一步,它所作的每一个举措都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特区在今天表现出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结果,它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有关经济特区建设与发展思想的英明。特区房地产业的取向之路,是特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分析其发展历程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与选择或许可以对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某些启示。

后,与黑市价相比,大约仍高估了30%左右。针对这种实际情况,人民币兑外币贬值既可一步到位,亦可分多步走。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已10余年,据经贸部有关人士透露,如果目前我国与GATT的谈判顺利,我国将于1993年底恢复国际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现在的外汇市场信号也反映出此项改革必须及早出笼。人民币兑外币贬值过去采用的是分多步走,笔者认为最合适是采取分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近期内先贬值30%左右,使之官方人民币汇率与现行黑市价基本持平;第二步是适时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与流通,建立由市场供需机制,由国家外汇基金调控的统

一区的过去,和全国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袭着我传统的国家土地使用制度,特区建立之初的建设用地,基本上都是行政划拨。

特区房地产业的取向发展起步于对土地无偿使用制度的改革。深圳特区从试办伊始的1980年至1987年,按行政方式划拨了82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同时亦向用地单位收取了土地使用费3250万元,在改革我国原先的土地无偿使用制度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进而,从1987年下半年起,深圳特区又在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上作出了新举措,在全国率先废除行政划拨用地制度而改用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有偿出让土地方

一的单一汇率,从而推动形成符合国际标准的我国两层次的外汇市场。

总之,只要存在人民币兑外币的官方汇价及外汇调剂市场的调剂价的差别,就存在着外汇汇价的双轨制,就不能消除人民币兑外币的黑市交易,这种多轨制的汇率制度加之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就必然大大地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影响经济的发展,由此看来,对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建立统一的、单一汇率宜早不宜迟,这也是经济发展对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

- ① 德国的《趋势》杂志1992年5月号文章《中国正在起跳的超级老虎》
- ② 联合国《欧洲及远东经济年报》(1963年)第11页注15
- ③ 参见赵效民《论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载《财贸经济》1992年第3期
- ④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年6月10日夏泰宁:《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观念的变化》
- ⑤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1年12月13日《中国增加储备》一文
- ⑥ 美国《幸福》杂志1992年8月期
- ⑦ 参见朱云海、陆冠虚《上海经济研究》1988年第一期《对我国汇率下调效果的评估》一文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经济系

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责任编辑:黄振荣 郑英隆

式：1987年12月1日，在国内首先公开拍卖一幅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结果以525万元成交；接着不久，又陆续出让了3幅土地，并收回2300多万元；……。这些尊重价值规律要求的土地管理体制变革，不仅为深圳投资环境改善、市政建设等赢得了必要的启动资金，而且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奠定了基础。

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级地产市场放开，迅速地带动了以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单位为主体的二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市场开发与产业成长的互相推动使特区的房地产业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景象。据初步统计，深圳现已建起了含单项开发、多元化经营的各类房地产公司103家；1980—1990年，特区内开发的土地有70平方公里，占划拨与出让土地面积的89.6%；建成各类商品房1384万平方米，总投资95.5亿元，占整个特区基本建设竣工面积总投资的56.5%；实现利润15.3亿元，上缴税利达10亿元多；创造性地提供了人均居住面积10.35平方米的房地产供给条件，这大大地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1979—1991年，全市基建投资累计有297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投资占40%。

特区房地产业市场取向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第一，综合全市100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情况来看，近几年，特区房地产业上缴财政的税利每年都在10亿元左右，占全市总税利的10%以上，这是在80年代初期简直是无法思议的。第二，特区房地产业的形成和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大大地强化了特区人的土地资产意识；促进了企业把土地作为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去考虑经营决策的文明进步，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政府实现对土地从资源管理到资产管理的转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第三，到1991年底，深圳通过房地产投资引进的外资约占基建投资总额的10%，对外开放能力也因此而得到大大的增强。第四，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金融业、建筑业、建材业、房屋装修业、家具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当前，特区的房地产业发展正面临着新的问题与困难。主要的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特区原有的优势在发生新的变化。去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在肯定深圳特区的“排头兵”成就的同时，亦寄语全国人民：“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

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从而在沿海诸多地区和陕西、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内陆省份迅速造成了更多的“新热点”。这种新的对外开放格局，给深圳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与要求。深圳昔日的“优惠”与优势已所剩无几，而内地许多城市则比深圳更有优势，如综合科技能力、市民综合文化素质、工业基础等。时下越来越多的特区企业热衷于到内地投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区投资环境的某些方面已落后于其他地区。这些变化必然会对特区的房地产业产生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影响。二是特区自身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与效率正在蜕化，排队认购抽签表、排队安装电话、排队寄取邮件、排队存取款、排队看病，甚至连过马路也要排队等的“排队现象”，更多的是管理的阻滞、思想的阻滞这类主观因素所致。政府公务人员中相当大地出现有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情况，政府职能部门的事难办、话难听、脸难看、办事效率低，文山会海，官僚作风等时有发生，企业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特区经济的发展正在面临着有可能衰退的新考验，这不能不对特区的房地产业与房地产市场产生这样那样的冲击。三是使市场经济走向法制的轨道尚有待完善和提高。深圳在建立地产与房产的市场机制，培育房地产市场中，得风气之先，取得了社会公认的成就，但发育不良、运行不规范的问题亦相当突出。其原因主要是对房地产这一特殊产业、特殊市场缺乏必要的足够的研究，以致于对事实上存在着的诸多违背价值规律、市场经济法则的非规范行为并不能作出积极而合理的疏导与整理。在房地产领域，人制大于法制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政府职能部门过多地采取直接干预，而不是用市场经济型的间接调控手段和价格策略。四是深圳现有的一些条文规定并不是从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出发的。比如有关规定就要求，买房必需有深圳户口（事实上，在深圳工作的人中有深圳户口的不过为十分之一），而且买了一套房子就不能买第二套，再加上对境外人口购房的限制，使得深圳房地产市场上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根据深圳市现有有户人口的住房状况，结合市政府有关购房规定计算，今年深圳内销住宅需求量大约为2万多套。但从供给方面看，目前深圳市103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估计有5万余套上市；此外还有68栋高层建筑已经报批，年内约有4万余套上市，因而今年将有

7万余套住宅的销路成问题，几十亿元资金将难以回笼。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与问题显然是有碍于特区房地产市场的发育成长的，这同时也就客观地规定了特区房地产业发展的新使命与新要求。

其一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尽快调整和转换政府对房地产业或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职能。厉有为市长最近所作的施政报告为我们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改进工作作风，并迅速把它落实到实处”。这是深圳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再造深圳特区经济新优势的一项方向性工作，也是新时期深圳特区房地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与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的经济干预是一种利益再分配，为此，政府对房地产业或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引导应本着结构协调的思想原则，充分考虑和分析房地产的供需结构与水平，加速房地产市场的培育与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应主要从财政金融政策、区域发展规划、土地用途、建筑密度、使用权年限等方面来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用限制需求的办法来管理房地产业。

其二是要从根本上冲破那些阻碍着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人为区域”樊篱。市场的本质是开放的，是反对封闭的。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属于国家，但这与公民享有所有权的具体形态——产权，如财产权、房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并不矛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来说，房地产商品的买卖双方都不应该受户口所在地区的限制，或者所谓的“有分寸限制”；况且，深圳特区本来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因而深圳房地产市场上的“户口所在地界限”应该是不存在的，现存的人为障碍宜尽早拆除。否则，进一步催化房地产业，健全房地产市场，实现房地产商品的自由流动、自由买卖，就要成为一句不具实际意义的空话大话；完善特区的市场体系乃至整

个市场经济新体系，也就至多不过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其三是继续深化住房体制改革，借助提租促售的办法，加快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步伐。回顾深圳房改方案实施四年来的整个工作，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补贴提租、大步到位、鼓励买房等措施，目前，以补贴、提租、售房为核心的住房新机制已走上轨道，住房开始逐步由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向一次分配转变，由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深圳房改运作的各个环节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各个环节之间亦有许多不相衔接的地方，房改方案的实施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此，围绕着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要求出发，现阶段深圳房改的深化应主要地体现在巩固和进一步完善住房新体制，加强房改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促进房改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上。

其四是建立和健全房地产交易法规。1987年以来，深圳市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和颁布实施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深圳市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办理程序》、《深圳市房地产登记程序》、《深圳土地招标投标试行办法》等一系列的条例规定。它们对深圳房地产业与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转和规范化管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相对完备的房地产交易法规体系，尤其是有关二、三级市场的交易法规还远未建成。交易法规建设的滞后不能不是制约着今后深圳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问题不尽快解决，要开拓深圳“房地产出口创汇”新局面，显然是“无所适从”的；要使深圳进一步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与改革的“排头兵”，也是维难的。

作者单位：深圳市蛇口信毅企业公司

责任编辑：张洁

谈谈调查研究的几个问题

冯灼锋

一、调查研究是科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的重视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调查研究有很多精辟的论断，如“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等等，都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联系我们的工作实践来看，调查研究确实是科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讲的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一句话，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来决定我们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步骤。正因为调查研究具有科学性，所以调查研究又是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没有科学性，就不可能卓有成效。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我们从调查的涵义来分析。调查是什么？调查就是采用各种方法搜集情况和信息（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而占有大量的材料，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为对事物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次，从研究的内涵和方法来探讨。所谓研究，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推理和判断，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分析、推理和判断的过程就是研究。通过调查占有的材料很多，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现象，而不是本质。只有通过研究、分析、推理和判断，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为什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弄清事物的本质？道理很简单。现象和本质是不一样的，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而现象的表现形式却往往有多个，有真象，也有假象，有真假并存的现象。事物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表现出来的现象不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质，如果笼而统之，就会象我们经常讲的指冬瓜画葫芦，就不能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了。

再次，从研究过程的多次反复来看，研究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研究的进一步就是在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推理、判断，从而找到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找到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就可以使我们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这样，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才不致于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办起事情来才能顺当。总之，调查是占有材料，认识事物的现象；而研究，则是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的过程。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使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一致，为我们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只有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作出的科学决策，才能体现实事求是，才叫做从实际出发，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不调查研究，不按客观规

律办事，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1958年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也没有充分分析，没有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凭主观想象、主观臆测提出的口号，这不知道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因为这种决策不是建立在符合客观事物实际的基础上，因而这个决策不是科学的，是错误的，后果很严重。

也有许多正面的例子。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什么搞得那么好，就是党中央在总结了建国以来，尤其是充分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在掌握大量事实、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根据我们的国情，根据世界发展大趋势，若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再继续搞政治运动的话，我们的经济就搞不上去，而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果断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十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了前28年，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很快，城乡的变化很大，就是因为我们的路线方针符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客观实际。又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人们是不是都看到整个农村都要走家庭联产承包这条路呢？党中央作出这一决策也有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有一个不断总结、加深认识的过程。当安徽凤阳县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引起党中央领导的重视。当时全党还不是都接受，看法还不太一致。在这情况下，党中央允许看一看，在观望的同时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农村的生产力，适合当前农业的生产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在全国推开。一推开，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快，几十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在三四年内就基本解决了。因此说调查研究对于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的，我看一点也过份。

二、调查研究要经常进行，而不能一劳永逸。

为什么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

理由之一，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古希腊卓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两次走过同一条河流。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两次走过同一条河流呢？因为河水是流动的。表面上看，这条河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河水在流动，这条河的其他物质如杂草等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当你第二次通过这条河的时候，你原来走过的那条河已经变化了。新的产生而旧的灭亡，一切都在永恒不断地流动变化之中。所以任何事物都既存在着，又不存在着，因为它存在的时候又在变化之中，变成了别的东西，也就是原来的东西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从变化、发展的观点来观察事物所得出来的朴素的然而正确的辩证法的结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变的，这是区别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界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别的事物一样，也是发展变化的。打个比方，我们今天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尽管形式还是家庭承包这一形式，但承包的内容、承包的方式等等都是变化发展了，承包管理较之过去健全和规范得多。我们开始搞家庭承包的时候是简单地分包下去，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搞公开投包了。大家都记得承包初期，就是前几年还经常听到什么“口头合同”、“烟纸合同”，现在慢慢变得条文化、规范化、法制化了，各级还建立合同仲裁机构。这不就发展了吗？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比较于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确实是发展了，变化了。又如我们广东的农业生产，改革开放以来，我认为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初期的前几年，主要是增加生产总量，解决温饱。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农业生产是数量型的农业，只追求产量，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纠正以粮唯一的做法，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大农业，发展商品农业。三角洲地区可能早一点，很多山区都是在1983年以后调整结构。温饱问题解决了，大家感到仅仅种粮食没钱用了，吃饱饭还要用钱，要致富，所以就提出要纠正以粮唯一，搞大农业、商品农业，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商品率，这是第二阶段。进入90年代以后，又提出发展“三高”农业。1992年全国总结了广东的经验以后，6月下旬在广东召开了“三高”农业经验交流会。农业生产就开始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农业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这可以算是第三阶段。广东农业生产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一方面充分说明农业生产和所有的事物一样，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人们要正确认识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加以解决和引导，才能够适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要求。因此，就必须进行不断的调查研究。如果今天搞“三高”农业，仍然坚持80年代搞数量型农业的指导思想，那是不行的。在农业生产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怎样去指导和引导农业发展呢？首先，要对“三高”农业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做出引导。数量型农业的目的在于解决温饱，它是质量型农业发展的前提。“三高”农业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温饱解决了，人们的消费要求也相应提高，再种大路货就很难卖出去，而高产优质产品才有市场，才能卖个好价钱。我到茂名的高州，听他们说1992年传统的大路货龙眼三四块钱也滞销，而优质的储良大广龙眼十六七块钱争着要，货车一直开到果场。就拿粮食来说，我们机关干部宁可到市场买8角、1元的大米，粮店的配给米没有人去买。需求是不断提高、不断变化的。市场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是优质的，质量不高，再多也不行，无人要。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就不能再只要数量，不顾质量了。只有搞“三高”农业，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只有把质量与效益结合起来，农业才有前途。所以，“三高”农业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离开了市场，盲目发展，就会坏事。为什么“三高”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因为这种农业多数不是为解决温饱而生产，它完全是商品化的生产。既然是商品化，就要以市场为导向。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引导农民发展“三高”农业，才能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推动“三高”农业。要制订正确的政策措施，不调查，不研究，那是不行的。还是用几年前那种办法，那种观念，那种政策，是搞不好的。要使我们的认识适应发展变化的情况，并

能够采取相适应的措施来解决新问题、新情况，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进行调查研究。

理由之二，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不知到知，从知少到知多，从浅到深的过程。一次调查研究，不可能对事物认识得清清楚楚。当然可以认识一些问题，甚至可以把握一些规律，但总是有限的。只有不断地调查，不断地研究，才有可能对客观事物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讲到这里，要联系一下韶关市委对林业发展的认识过程。韶关市的干部和群众对韶关林业的认识就是在不断调查、不断研究中使认识不断加深的。我记得，1984年市委发现了翁源的铁龙林场和南雄的帽子峰林场有一个共同点，两个林场经济发展都较快，当时发现两个林场都搞综合利用、综合经营，林场从单一经济向多元化经济发展。后来市委在调查总结和肯定了这两个林场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就提出林区同样要调整结构，同样要克服生产单一、经济单一的状况，提出林区同样要建立多元化经济。为了推广这两个林场的经验，1984年，韶关市委专门就此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提出靠山吃山，首先要养好山。我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是不完整的，吃山还要养山，否则，就会坐吃山空。1986年又总结曲江小坑林场和乐昌龙山林场联合当地乡村农民发展林业的经验，这两个国营林场自己的山地种完了，没有山头可以种了，而劳动力又有剩余，林场又有资金和技术，却没有地方发展，他们就向当地附近的农民租地联办林场，发展新的经营，两个场都各自从一个场变成两个场，面积扩展一倍。市委在调查总结了这两个场的经验以后，又提出以国营林场为依托，发展联办林场，加快改革、加快造林绿化、消灭荒山的步伐。韶关的联办林场就是在总结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全市的联办林场面积就达到300多万亩。1985年，全市荒山的面积是400多万亩，几年消灭荒山的过程中，联办林场占的面积就有300多万亩，加快了造林绿化。农民有山，但无力去种；林场有能力，没有山，联合起来，就是把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89年荒山基本消灭完，在消灭荒山的基础上，以后林业怎么发展，市委和林业部门的同志对八个县进行了调查，然后提出林业上新台阶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四化”，即林种树种结构科学化、生产基地化、经营商品化、管理法规化。如果能够这样做，韶关的林业就大有前途，大有希望。我在韶关工作过，所以对韶关林业的发展印象很深刻，韶关市对林业生产的认识的系列化、系统化是逐步形成的，是不断研究、不断认识的结果，一般来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越深刻，越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越能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就真正能达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必然王国就是规律性，自由王国又是一个飞跃。根据规律去处理问题，所作出的决策就有科学根据，准确性就较高，就能站得高、看得远。要达到自由王国，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地调查、不断地研究。

三、调查研究是系统的程序和完整的工作过程。

如果我们把调查研究比喻为工厂生产的话，那么调查就是收购原材料，研究则是加工出产品。没有原材料，就不可能加工出产品，所以说调查研究是系统的程序。如果没有加工，再多再好的原材料也不可能成为产品，所以说调查研究又是完整的工作过程。调

查就是占有材料，是研究问题的起步。没有调查，没有占有大量的材料，就没有研究问题的基础，更谈不上认识的深化。没有调查，研究问题就成了“无米之炊”。研究就是对占有的材料的加工，就是通过分析、推理、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仅仅是现象，还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不仅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即使认识达到了飞跃，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也有再研究的必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来讲，人们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开始，但是感觉到的东西不等于认识，“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很好的感知”。我们所掌握的一大堆材料，只是现象，只停留在感性上面，通俗点讲，就是只知道那么回事，但不知道所以然，还要研究其所以然。我们总结经验也要注意，一些好经验，要推广开，不能照套照搬。因为再好的经验也有时空限制，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是可行的，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或换一个地点却不一定行得通。如果不加分析，不加研究，一律照准、照搬，就往往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总结经验，但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经验，其实经验还是感性的东西，还没有达到飞跃，因为它只是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说经验依然是感性的东西，还不能说已经上升到理性。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再进一步提高，才能达到认识的飞跃。我们总结、学习、推广、借鉴经验，常常会遇到这些问题，也要密切注意这些问题。可以说，到了解决所以然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进入自由王国了。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决策才能比较好地体现实事求是，符合客观规律，就象加工一样，产品才能符合标准和规格。讲这些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弄清调查是必不可少的起步，而研究则是认识深化、正确决策和正确处理问题不可逾越的程序。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调查研究是系统的程序和完整的过程，两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当然，在一个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交叉反复情况，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新的问题再继续调查，在再调查的基础上又进行研究，如此反复，不断使认识深化。这种交叉反复的过程，也是系统的程序和完整的工作过程。

作者单位：广东省农委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 现实活动的统一

——兼谈对哲学应用的理解

陆 杰 荣

(一)

哲学曾经有过令其它研究方式无比羡慕的历史。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the mother of sciences)似乎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诚如黑格尔所比喻的那样,哲学的猫头鹰大抵是在黄昏时候起飞。其它研究方式只有在隶属于哲学的研究方式的时候,才有其拓展思想空间的理论可能性。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的发展大体表现为这样一种理论情形的话,那么现代西方哲学则要反对哲学研究方式的“专制”地位,提出要重新理解以往的哲学(形而上学),进而以各种非哲学的研究方式取代哲学的研究方式。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黑格尔所理解的那种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哲学或如实证科学(科学哲学),或如人文科学(现象学),或如语言科学(分析哲学),或如美学(解释学),或如道德学(存在主义);总之,古典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方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应当受到质疑的,而理论诘难的现实结果就是以非哲学的研究方式去消解(批判或否定)哲学的研究方式。

令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也反对黑格尔关于抬高哲学研究方式的理论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研究方式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黑格尔所倡导的那种哲学研究方式根本不能凌驾于其它研究方式之上。哲学的研究方式本身要能够给现实的世界“带来变化”,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反对仅仅诉诸于哲学研究方式来提供关于世界图景的观点。换言之,对马克思来说,哲学的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的研究方式是以非哲学的现实活动为前提的,哲学的研究方式只有在同非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统一中才能谈及所谓哲学的应用问题,哲学的应用又不仅如现代西方哲学那样,以非哲学的研究方式去化解哲学的研究方式,因为这种化解的结果通常是以否认哲学独特规定为存在条件的。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哲学研究方式其内在的双重含意。其一是指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研究方式区别于非哲学研究方式,如同区别于科学、宗教、艺术、伦理一样;其二是指实质意义上的,哲学的研究方式根本不同于超出理论范围之外的实践方式。如果说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变革具有全新意义的话,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对哲学应用的理解是把哲学的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并建立在非哲学现实活动基础上,只有在这二者的辩证统一中才能洞察马克思哲学观的实质所在。

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似乎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不存在方向上的歧义性，然而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以其特有的方式论及到了哲学是在何种意义上及何种层次上谈应用规定的。哲学的应用仍然有其层次上的要求。哲学的应用作为马克思哲学观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将哲学的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的现实活动统一起来。以往的哲学家或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无论这种方式是哲学的（如黑格尔），还是科学的（如科学哲学）、艺术的（人本哲学）。前者诉诸于哲学的研究方式，后者关注于非哲学的研究方式（学科意义上的），但它们都无法说明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研究方式的现实的客观的基础即非哲学的现实活动，无法给世界“带来变化”。改变现实的世界当然不能没有哲学，也不能仅求助于哲学。哲学的研究方式必须同非哲学的研究方式加以结合，只有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理解马克思对问题说明的新思路。

（二）

哲学原意为追求智慧的学问。人之所以要寻求智慧sophia，总有其特有的要求，或为思想“锻炼”，或为安身立命，或为心灵慰藉，然而哲学的智慧又非wisdom。wisdom侧重于功用或效能，至少这一倾向在哲学产生的最初阶段里，是受到非难的。哲学作为寻问Logos，把握“绝对”的学问，当然不同于能够求于功利的学术。哲学不是工艺学，它作为一种思想的“逍遥”，大概是与现实的这个世界无争的。古希腊的哲学通常都抱着这样纯净的信念。

例如柏拉图，哲学被他推崇为至上的学问。就学科分类来说，哲学显然高于艺术（诗）或历史。哲学的研究方式所把握的对象对其它研究方式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哲学是以eidos为对象的。“eidos”是理念，不是现象，因而不能流变不居。哲学所关注的是动中所不动的存在，因而它才为“真”与“理”，至于其它研究方式根本不能称做是“真理”，哲学成为绝对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实体”，为“本体之学”，它寻求的是“第一因”，故可称为至上的学问。至上的学问渊源于人内在的形而上学的冲动，这种冲动又不是与实证科学根本无缘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其它学术追问事物的具体原因，而本体之学乃是在科学之后physics，如此才有“meta”作为前缀。^②在亚氏看来，哲学的研究方式之所以根本异于或高于其它研究方式，在于它的对象是研究“一”或“全”。对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来说，哲学非“应用之学”，却又容纳了所有应用之学，哲学以思想的方式容纳了世界，提供了对世界解释的图景，它可以洞察这个世界，却无法说明世界的变化。eidos只是哲学的一种憧憬，却又是无法付诸实际的憧憬。理论毕竟是理论，它无法进入现实领域。

古典哲学这一理想在近代哲学中以新的方式体现出来。近代哲学的发展自然无法回避近代科学的挑战，这一矛盾以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研究方式二者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应能比照科学的方法，以取得科学之地位。唯理论侧重于哲学的研究方式，追求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而对这一点的论证又是哲学研究方式自身所无力完成的。道

路当然存在着，这就是通过天赋的东西来保证这一研究方式的表面完整性。经验论寻求的是用新的方法去建造哲学的形象，哲学的研究方式必然借助于经验的（实证科学）途径加以论证，这样看来后果又是无法跨越的，哲学的研究方式又被经验的方法所否定。近代哲学所追寻的“新工具”的结局是十分发人深省的，或者用哲学的研究方式去构造“新工具”，或者用“新工具”去否定哲学，矛盾似乎是不可消除的。近代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涉及到了哲学应用的问题，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康德也面对着近代哲学的这一矛盾。对他来说，解决新的矛盾的方式就是要回到原有的理论起点。康德认为，哲学的研究方式对人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如同形而上学是不可或缺的一样。^③哲学倘若谈之应用的话，至少要解决两个互为相关的问题。两个问题合为一体，就是要确立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在这个残酷的痛苦的世界里，人不能没有安身立命的依据，而能提供这一依据的唯有哲学（形而上学）。如果说哲学能给人带来收益的话（康德没有用效益这个词），这或许就是哲学的唯一功能（功用）。作为主体的人通过构建性功能来确立知识，又通过调节性功能来确立至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康德的本意就是，哲学的研究方式不能直接给这个世界带来变化，却又作用于人这一中介环节，对世界发生某种作用。亚里士多德的提法被康德部分地加以纠正，却又以新的方式保留着其基本的主旨。

黑格尔极为推崇哲学的研究方式，这不仅表现为他把哲学看作是高于宗教与艺术的，而且表现在他力求用哲学方式去解释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思想演变的逻辑。黑格尔的理论意图极为明显，这就是用哲学来取代这个世界。然而黑格尔的努力仍然未能超出对世界解释的范围，虽然他并不是仅仅求助于解释，尽管他的哲学解释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宽泛，却无法产生“真实的结果”。例如黑格尔强调哲学的研究方式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本质是思想的、概念的。对他来说，只有思想才是能动的，才能构成概念的系统，才能提供对世界的本质解释。黑格尔推崇哲学的研究方式目的在于用逻辑化的方式去构建现实的世界。

概观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西方古典哲学家大都十分重视哲学的功能，而罕言哲学的应用问题。哲学作为超越其它学术之上的“大学问”只是戴着睡帽的大脑里的思想活动。思想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但毕竟不能真正做到“惊天动地”。智慧终究是智慧，无法把它变成某种工艺学层次上的“敲门砖”。哲学的研究方式固然高出一筹，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学科，但它只是一种静观的精神鉴赏品。综上所述，西方古典哲学大体表现为如下几种理论特征：其一，哲学的研究方式理应是纯而又纯的，而纯的东西只能是思想；其二，哲学的研究方式只表明思想的此岸性，即无法在客观进程中表明自身的现实性，哲学研究方式永远限于理论的范围之内；其三，哲学的研究方式存在的依据在于满足人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心理需求，这种形而上学的需求是恒久不变的；其四，哲学研究方式之所以高于其它研究方式，根源在于它要说明世界的总体，它的功能在于提供对世界的解释。

(三)

古典哲学家始终是哲学家，他们对哲学研究方式尽管十分推崇，却无法借助于哲学理论来给世界带来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家是最软弱无力的。哲学家的软弱却又不能印证哲学的无能，问题的关键是要揭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现实突破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并不是哲学家（旧有意义上的），他不诉诸于对世界的解释，虽然这一解释是多种多样的，而是要使哲学能够产生“真实的结果”，作为哲学的研究方式理应也必然要给世界带来变化。

这是“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在这里，马克思以自己特有的论证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哲学应用的理解。哲学只有同世界发生接触并相互作用才能谈到哲学的应用问题，就哲学谈哲学，或只求助于哲学的研究方式是无法说明甚至都无法提出这一问题，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必须要注意到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现实活动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哲学家把哲学看作是独立于一切非哲学东西而存在的臆想。马克思指出，哲学决不仅仅是作为思想的旁观者而对历史的变化无动于衷。哲学的研究方式固然有特定的价值，但非哲学研究方式特别是非哲学的活动对哲学而言有着巨大的意义。哲学的研究方式绝对不是亘古不变的心灵的慰藉，而总是历史过程中时代精神的表现。哲学并不是纯然的，而是存在于非哲学的历史之中的，“哲学本身没有历史”，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研究方式的现实基础就是非哲学的现实活动。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内在逻辑分析，只有寻求到这一联结的客观前提，才能用哲学对世界的解释来改变世界。只看到哲学的研究方式的功能，而无视非哲学的活动对哲学的意义，其理论充其量也依然是对世界的解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要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

其次，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只有在与非哲学的活动相互作用中才能给世界带来变化，这就是哲学应用问题。在他看来，哲学的研究方式之所以要超越自身，就因为它不能在思想范围内来发挥自身的功能。哲学不是单纯解释世界，而为了改变世界就需要正确解释或认识世界，因而哲学就不能仅停留于思维的领域之内，而是借助于实践使自身加以客观化或对象化。哲学研究方式要把自己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中，从而以特有的方式来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说明世界。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研究方式的统一最根本的是以非哲学的现实活动为前提的。

第三，马克思强调哲学的应用是以不损害哲学固有的功能为先决条件的。哲学诉诸对世界的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解释并不是功利层次的解释，哲学的应用不是如实证科学的“立竿见影”，而是在非哲学的现实活动基础上确立，并与历史发展条件相吻合的关于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支持。在这样的规定意义上，马克思并不一概反对康德把哲学看作

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比喻。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认为不存在超越历史之外的这样的安身立命的依据。人当然需要有安身立命的依据，提供给自身所谓世界观层次上的支持，只不过这一依据具有历史的特点，这却是康德没有看到的，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哲学已经不存在了，这里只存在着世界观。要认识作为统一体系的世界，必须先认识自然界和历史，而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

哲学仍然是世界观，这是哲学研究方式特有规定使然。正是世界观的功能，才使哲学扮演了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角色。然而哲学的研究方式又不是纯然自足的，因而必须面对历史与自然。只有先认识整个自然和历史，才能卓有成效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也只有如此，才能谈及所谓的哲学应用问题。

这样看来，哲学的世界观功能是不能废弃的，而要谈之应用，就必须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其一，要认识自然，而认识自然不单纯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只有借助于其他学科，通过各门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认识自然，这就表现为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研究方式的统一。其二，要认识历史，无论是哲学研究方式，还是非哲学研究方式都是在理论范围的，只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才能理解诸种研究方式的相互联结。这就表现为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的历史活动的结合。只有在这诸种关系的结合之中，才能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思路，也才能较为正确地把握关于哲学应用的某些问题。

（四）

概述以上非系统性的推论，结论要点如下：

1. 只有将哲学研究方式同非哲学的现实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使哲学自身的“普照光效应”有了施展的可能。这种结合，才能彻底地结束以往哲学只是纯然地解释世界的历史。哲学作为普遍层次的理论思维才能成为真实的思维，而真实的思维才能产生真实的结果。

2. 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的现实活动二者的结合是哲学应用所依据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本身不是抽象的，而是要包含着诸多特殊规定的内容。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的现实活动的结合有着诸多的理论层次的中介，既包括从哲学研究方式到非哲学研究方式，进而到非哲学的现实活动的若干环节；又内在的体现着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哲学研究方式本身是“硬核”、“软件”及其边缘“地带”的综合，其应用决非急功近利，而是要研究全部历史，借助于所有学科成果。

3. 哲学的应用不是如同具体实证科学那样所要达到思维的简洁性与经济性。哲学的研究方式应用无疑应包括这样的特点，但哲学的应用主要是提供世界观层次的活动依据，作为某一特定时期的终极或最高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不是“观”世界的某一部分，而是要“观”世界的总体，一方面它要提供认识世界的指南，而非公式；另一方面，它要提高人的品位，前者“为学”，后者“为德”，正如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哲学不能烤面包，但哲学使人在吃面包时能感到另有一种滋味。

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初探

章海山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个热门话题,其中包括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这种研究首先有个如何比较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属于封建社会形态的伦理思想,而西方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三种社会形态及其相应的伦理思想。因此,比较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欧洲中世纪伦理思想比较,这是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伦理思想比较研究;也可以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伦理思想比较,这是不同社会形态伦理思想比较研究。本文着重这种比较研究,在必要时涉及古希腊奴隶社会的伦理思想,作为西方近代伦理思潮的渊源而提及,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潮对中国影响最大和最直接。

(一)从经济形态方面比较两者伦理思想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体制,决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总体上属于封闭型或保守型,主静、内求以及中和为其基本特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开放式的商品经济,伦理思想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型或发展型,以主动、外向、竞争为其基本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是小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土

地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自给自足,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自然条件——土地,个人把土地作为维持自己生存的实体,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因此,在古代中国,个人只有依附封建社会群体才能生存,个人不可能是单个的个人,不具有个人独立发展的条件。在封建关系中,个人作为地主或农民的社会规定性相互发生关系,表现为人控制人的关系,个人无条件地依附、从属封建统治者。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决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流或总体,是一种主“静”和内求的伦理体系,集中表现在调和、持中及追求静止的和谐上。它把个人的思想感情、行为的持中不仅作为道德的尺度,而且作为社会与万物的本源及价值标准。《中庸》称之为“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因为如此,个人的品德好坏成为治理国家的依据,故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达到“中和”境界的主要途径是内心修养,以寡欲、尽心和养性的“身心收敛”来达到目的。

社会的现实状况是个人依附群体、绝对服从君主,而道德上则十分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并把它提高到天下兴亡的高度。这似乎是矛盾的,然

4. 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的现实活动的结合,也就是哲学的应用最根本的是思维方式的革新,因而二者统一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就是人类历史实践活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②《形而上学》第I部分。

③参见《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导言部分。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而这正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总体特征。把道德局囿于个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积极主动的修养以达到行动上绝对服从封建统治。内心世界的“动”，正是为了外在世界的“静”；个人能动地服从群体，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即静。封建的经济结构最少变动，缺乏内在的经济活力，伦理思想必然主静，反过来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的最有力的精神手段。这种主静型的伦理思想体系虽是保守的，但毕竟反映了道德要求社会生活和谐协调的一面，反映了人类道德发展的一个侧面。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占居统治地位，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生产力，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处于永远的不安定和变革之中。它不仅打破了本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况，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日益扩大，使各民族的保守性和局限性都成为不可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彻底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关系，无情地斩断了劳动者与土地的联系以及对封建统治者的人身依附，个人摆脱了封建共同体的束缚。无论从商品生产或交换的经济关系考察，个人主观意识上都形成自我中心的观念，视自己为目的、他人手段。个人只有在不断扩展、提高自己过程中，才能生存发展，资本主义竞争更把资本必须不断增殖的内在规律变为外在的强制，迫使个人不断发展。由于异化个人成为物奴隶，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又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并提供了可能。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制度决定伦理思想体系主流或总体上是外向开放型和发展型的，以满足、发展个人利益作为伦理体系的总目的。伦理思想主动、外向集中表现为不断追求个人利益，视外物、社会为手段，自己是目的。例如霍布斯、爱尔维修、费尔巴哈等人认为人的欲望是合理、合乎道德的，人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不断产生新的欲望，道德和人生价值就在不断追求、满足自己欲望过程中体现和实现。欲望无止境，人的追求就永不停止。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等人虽然强调理性的重要，但认为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正确指导人去征服外部世界，在于与他人关系中实现道德和自我价值，在于更好地使人指向外部世界。这种伦理体系的总特点，是主张发展、强调人向外部世界扩张，以利于个人的发展，这种理论，往往导致个人主义和唯我主

义，道德实践已证实了这一点。

(二)从国家起源方式比较中西伦理思想特点。中国国家起源属于亚细亚方式，家族是国家的根基，故伦理思想极为重视调节家族内部关系；西方国家起源属于雅典式，它打破血缘家族关系进入国家，故而伦理思想十分重视调节个人和群体的关系。

中国的国家起源方式是以氏族的血缘家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国家又不断强化家族，形成稳固的宗法家长制。家族内部家长制的统治和保持家族的内聚力，不但是家族兴旺的依据，也是国家统治的前提。维护宗法家长制的重要，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非常重视调节家族成员关系的家庭伦理，置它高于社会伦理，在一定意义上，家庭道德规范成为首要伦理原则。孟子在“人伦”中把调节家族内部的核心关系——父子关系的道德规范列为首位，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礼记》中把人伦演变为“十义”，其中八个道德规范为调节家庭内部成员关系的。《大学》提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则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鲜明地指了出来。尔后的董仲舒制订的政治纲领和伦理纲领的“三纲”中，其中二纲属于家庭伦理。因此，中国传统伦理中“孝”这一德目被抬高到“天经地义”的高度，视为“至德要道”，以“孝亲”作为“忠君”的前提。“孝”成为缩小了的“忠”，“忠”成为扩大了“孝”，恰好适应中国的宗法家长制和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

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不仅使家庭关系披上了含情脉脉的外衣，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使中国家庭的内聚力特别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依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家庭的兴衰也就是个人的兴衰。这就造成家庭成员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得不到发展。当然，这种传统伦理思想又造成了中国家庭稳定、和睦这一优良传统，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对于社会主义家庭建设是有利的。

西方以雅典为代表的国家起源方式，恰恰与中国不同。雅典打破氏族的血缘家族关系，以居住的地区和财产划分阶级而形成国家，家族相对来说远没有中国那样重要。古希腊的社会结构中，自由民个人和城邦群体的关系远高于家族内

部成员的关系。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核心和主要德目都是调节自由民个人和城邦群体关系的,调节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德目处于很次要的地位。近代资产阶级更把家庭建筑在资本和私人发财方面,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简单的金钱关系。因此,伦理思想方面家庭伦理也居于很次要的地位。由于经济结构及由此决定的人际关系,资产阶级伦理道德主要是调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般的社会道德原则往往适用家庭伦理。因此,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家都很少涉及家庭伦理思想。

(三) 从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人性论比较中西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德性主义人性论为主流,道德成为人的目的。西方伦理思想则以感性主义或理性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前提,道德是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儒家的德性主义人性论为主流,认为人性是天赋的,人人皆有“仁义礼智”的德性。孟子指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本性,它们成为仁、义、礼、智等德性的根源,因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善源于人性自身,因此道德不需外求,而在于“存心养性”。人性善——道德修养——人性复归,形成一个封闭式的伦理思想体系。

依照中国传统的德性主义人性论,道德成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所在。实际上,道德本身应当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手段,同时提高人自身的道德水平又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其原动力不在人自身,也不在道德本身,而在于人自身之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性与道德同一的德性主义人性论,把人生价值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在实践上必然导致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无为主义,这有利于维系、巩固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但也不应否认德性主义人性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道德中的作用,强调道德在人生价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为自律论的道德论还是包含某些合理的理论因素的。

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也是人性论,但人性不等同于道德,而是道德得以成立的依据和标准,故称为人性主义的道德论。资产阶级人性论主流有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分,形成二大派别,也由此造成道德论上的一些差异。

费尔巴哈的“我欲故我在”是典型的感性主义人性论,认为人来自自然,人的感性欲望是人的本性,人都是天生趋乐避苦、自爱自利的。人的感性欲望、人的利己心本身是合理的,无所谓善恶。人的价值或人生目的就在于追求物质利益、满足种种感性需要,人自身的感性欲望就是目的,外物都不过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道德无非就是在人们追求自己私利和需要满足过程中,协调人际关系,不致造成损害。人的感性需要或欲望就是道德的标准,道德是实现人性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人性论的命题,认为人的本性在人的理性,理性使人具有无限的价值,使人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种理论强调人在理性指导下的行为都是善的,道德是理性指导人的欲望满足的结果。

近代资产阶级基于人性论基础上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它提倡以人为中心,视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为人的价值所在。道德不是人的目的,而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手段。资产阶级这种人性主义道德论,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神道主义道德论而提出来的。神道主义道德论以神为中心,人自身及人的道德都服从神,为神而牺牲,道德就是人克制自己的一切欲望和需要而接近神,是一种典型的人为道德而牺牲的禁欲主义。因此,这种人性主义道德论无疑是反封建斗争的结果,是大胆的启蒙和公开的进步。然而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人的发展包括道德的发展是以人受物的控制为代价而取得的,人的异化、道德的异化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束缚人的发展。

(四) 从道德和哲学的关系比较中西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把伦理观同本体论、认识论紧密联系为一体,西方伦理思想和哲学相对分开,伦理学的目的是认识人自身,哲学是认识世界。

中国思想史上,哲学本体论上的“天”或“理”作为一种客观精神是世界的本源,在伦理学上则作为道德的本源。这就形成了哲学原则伦理化,伦理原则哲学化的特点,而且以伦理为本位。“天人合一”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命题,它把天道和人道一致起来,作为哲学本体的天道和作为伦理本体的人道合一,从而使世界本源具有道德意义,正因为哲学本体的伦理化,所以道德修养过程往

往就是认识过程，或者说认知过程与道德修养过程同一化。孟子提出“尽心”（提高天赋德性）然后“知性”（人性），“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又说“存心”、“养性”就可以事天，这样又把实践过程归结为一个道德修养过程。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把伦理原则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甚至方法论的高度，往往会导致道德决定论，最终走向禁欲主义。《大学》提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与“仁政”、“德治”观点相一致的。但是从根本上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异于人的异己力量即天道是核心，尽“人道”以知“天道”，目的在于认知、履行天道的要求。朱熹把它归结为存天理、去人欲，导致禁欲主义。可以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总体上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否定人的禁欲主义。从另一角度考察，伦理哲学化，对于形成中国传统伦理观重人格、重气节、重修养和重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些优良传统，是具有一定合理成份的。

西方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开始，就把伦理学同哲学分开，亚里士多德十分明确地区分了伦理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以及两者的目的和作用的不同。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发展了古希腊的这种传统，他们基本上把伦理学和哲学作为善（认识人）和真（认识世界）两个领域适当加以区分。如培根就明确提出自然哲学是认识自然的科学，道德哲学是认识人自身的科学，近代经验论思想家们基本都持这种观点。康德也认为人凭纯粹理性去认识世界，求得真，这是哲学；人凭实践理性去认识人自身，求得善，这是伦理学。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属于精神的不同能力，它们认识不同领域的不同对象，达到不同的目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基本上持这种态度。

伦理学和哲学适当分开，从理论上讲，有利于这两个学科的独立发展，也有利于人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自身。这种传统源于古希腊，但到近代才得以充分的发展，这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要求人们充分认识自然，改造、征服自然，也要求人们充分认识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各方面得到发展的人自身。

（五）从伦理和政治的关系比较中西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点是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伦理和政治一体化。西方伦理思想中，伦理和政治双

轨化而相对分开，两者均服从人的幸福。

中国是宗法家长制和专制制度合一的社会，维护宗法家长制的道德规范也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政治手段，而维护专制制度的政纲也是强化宗法制度的措施。这就使得封建统治者能够把对被统治者的外在强制性变为内在的自觉遵守的规范，并使封建统治披上仁慈的外衣。中国政治体制这一特点决定伦理和政治一体化，孔子主张德治教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则发展为“仁政”，董仲舒把道德原则与政治纲领进一步统一起来，提出以三纲治天下。政治道德化有利于封建统治，道德政治化则使人们谨小慎微，在日常行为中不敢越雷池一步，同时道德与国家、民族前途相联系，有利于形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事实上也培育了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伦理与政治就明确分开，他认为伦理学目的求得个人完善，政治学目的是求得群体完善，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甚至把政治完全从伦理学中排斥出去。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古希腊的传统，把伦理学视为求得个人幸福的科学，政治学是求得社会群体幸福的科学，最为极端的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把道德与政治完全分开，认为政治上只有失败成功之分而无道德可言。道德与政治适当分开，理论上有利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独立发展。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分别著有伦理学和政治学二本专著，近代则有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这一伦理学专著，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这政治学专著。在实践上，道德由于摆脱政治的束缚可以得到较为自由的和专门的发展。当然，西方伦理思想中也强调道德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但很少把两者一体化，基本上是双轨发展，并且把两者统一于为人的幸福服务的基础上，最终以人作为目的，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把两者统一于与人相对立的“天”的基础上，最终服务于尘世的君主。

（六）从道德价值导向上比较中西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道德价值导向是整体主义，西方伦理思想的道德价值导向是个体主义（后发展为个人主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伦理价值导向必然为整体主义,集中表现为忠、孝二个基本道德原则。封建所有制中,个体不过是作为实体的共同体附属物,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隶属共同体利益,实际隶属于共同体的代表——君主。忠要求“君为臣纲”,孝要求“父为子纲”,这里的“君”、“父”不是个体概念,实质上君代表封建统治者群体,父代表整个家族。个体本身是无价值的,其价值在封建共同体或家族身上,个体不具有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体主义的道德价值要求个体对整体的绝对服从,压制了个体的个性,然而这又是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可以转化为国家、民族至上的崇高品德,沉积为一种民族气节和高风亮节,尽管“国家”、“天下”仍是君主王朝的化身。

西方伦理思想具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古希腊早就有“认识你自己”的箴言,经苏格拉底将它变为一种哲学、伦理学的目的。普罗塔戈拉提出古代世界第一个个人主义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人”指有欲望的个体。近代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它系统化为个人主义,以个人作为衡量社会和他人的尺度,视自己为目的,把他人看作手段。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个人的私利才是真实的,而共同利益只是虚幻的。

个人主义道德价值导向根植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之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出现了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个人主义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历史形态,比起封建的整体主义来得进步,曾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资本主义世界是个异化的世界,物统治者,个人的个性、独立性服从物,在这个意义上,个性和个人的发展同样受到压制,可见它并不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真正的方式。在这种道德价值导向下,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势必造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况。因此,不管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如何发展,从本质上看,人际关系依然是对抗的,依然妨碍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任何把个人主义这种价值导向视为最完善的价值导向的观点都是非历史主义的,都是错误的。

(七)从伦理学的重大问题——义利观比较中西伦理思想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重义轻利,西方伦理思想宣扬利

即义。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是“重义轻利”,或者说是“去利怀义”。所谓“义”,主要指道德伦理,后经董仲舒、朱熹将它哲学化和神化为“道”或“天理”,归根到底义归结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是维系封建统治的一种精神支柱。所谓“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并不泛指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孟子的“去利怀仁义”(《孟子·告子下》),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均是典型的重义轻利的命题。孔子曾把对义利的态度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朱熹则走向禁欲主义,说人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语类》卷十三)因此,重义轻利的实际意义是被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利益;作为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的道德要求,要求统治者中每个成员的个人利益也应服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服从应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故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说法。

重义轻利必然会导向禁欲主义,否定、抹杀任何个人利益和个人的物质需要,要求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封建统治者整体利益,直接维护封建统治。在理论上,重义轻利把道德与个人利益完全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把个人利益完全从道德中摒弃,使封建道德成为人的异己力量扼杀人的利益,所以说封建礼教是杀人的软刀子。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外族入侵时),它可以代表民族的利益,因此这种道德观可以转化为重国家、重民族利益,为此可以献出一切的民族气节,转化为“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

西方在古希腊就有如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这样有名的伦理学家,主张道德与财富并不对立的观点,认为占有、享用中等财富对道德反而有利。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则把个人利益作为道德标准,认为本性自私的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也就增进了社会公利。因此,个人的利益满足和提高是合乎道德的,利即义。18世纪英国伦理学家孟德维尔提出私恶(个人追求私利)即公利的观点,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利即义的道德观。这里的利指的个人私利、私欲,义指的是道德或一般社会道德原则。这种义利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

小议阶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

钟立功

树立科学的执政意识，是实施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基本前提。窃以为科学的执政意识，起码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阶级意识出发，认识我们党的执政是我国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得以确立，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中处于特殊地位的无产阶级本身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正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阶段的表现。二是从社会意识出发，认识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今天所领导的不仅是无产阶级而是整个社会；如果不能直接而有效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无产阶级将不能继续发挥自己的阶级职能。这两方面意识的高度统一体现了我党科学的执政意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这是因为：

私利益的一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7页）个人私利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在道德论上表现为功利主义。利即义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表述为“合法赚钱即道德、赚钱越多越道德”，从道德上充分肯定人们狂热的求金欲的合理性，推动着生产的发展，个人的才智也有相应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伴随着个人受物统治，人的个性被物的共性所吞噬，金钱拜物教统治人的头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利即义的观点是从道德上肯定和美化资本主义的这种金钱盘剥关系。

以上的比较只是从主要的基本方法加以比较，远非全面的比较，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得到有益的启迪。

一定社会形态的伦理思想归根结底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而且受到由该经济结构决定的文化状况的重大影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由它决定的文化状

况所决定的，西方伦理思想的特点亦如此。这种特点是历史的客观的事实，是不依人的评价为转移的。我们应当分析研究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伦理思想的特点如何由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等等，只能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从事两者的比较研究则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评价，有谁优谁劣之分。本文目的并非作出这种优劣的判断，而是依据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需要，通过这种比较发扬我们优良的道德传统，摒弃不适应或妨碍当前四化建设的陈腐道德观念。对西方伦理思潮也是吸取其为我所用的精华，排除其糟粕，在比较研究中，我们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国粹主义，而是将两者的精华融汇在一起，以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级、阶层和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的少。即使我们党有时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的倾向而提出重视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时，我们有些同志甚至也认为这地位是无产阶级给的，而不是他们应有的。这正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政治上不能把阶级的意识和社会的意识统一起来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如果不能通过切实保障和维护社会上其他阶级和党派的政治地位而求得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则无产阶级的地位最终是不会稳固的。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地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并通过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发挥社会上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则我们党对“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的追求也将无法实现。

二、只有实现阶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才能有利于在经济上发挥各种经济形式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工作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中心工作，以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结构和劳动力状况分析，要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一定要发挥以公有制为主的各种经济形式的作用，同时还必须通过政策充分调动在各种经济形式下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的积极性，舍此无以繁荣我国的经济。我们党内有部分同志之所以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迷惘、不理解甚至抵触的情绪，正是因为这部分同志不能从更深刻的含义上理解无产阶级的使命，不理解无产阶级发挥自己的阶级职能在执政条件下的基本方式。或许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认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集体经济，为什么现在又把土地归还私人经营，这不是走回头路吗；为着铲除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现在又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允许承包，甚至建立经济特区采取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不是重新出现带有剥削性质的雇佣关系吗。当然，作为曾经是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本身来说，他们与使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根本上对立的。但是如果从高度统一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来看，无产阶级要推翻私有制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私有制下受到残酷的剥削，更重要的乃是私有制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

级要解放的也不仅仅是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本着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意识，中国共产党曾为着阶级、社会和民族的共同利益，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解放社会生产力，在确立党的最高纲领之后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最低纲领并使全体共产党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和国民党一起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直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3页）这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仅是从本阶级的狭隘利益出发，才正确地认识和驾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推进了中国革命。同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我国生产力状况的现实，漠视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利益，教条主义地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公有化，那么必然是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最终也是违背无产阶级的意愿。

三、只有实现阶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高度统一，才能有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充分吸取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本身是一个严密有机的整体，它的自身发展既是历史继承的结果，也是阶级继承的结果。即使作为无产阶级思想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排他的，相反地是人类一切科学和进步思想的结晶。今天我们成为了执政党，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如果我们只从本阶级的观念，本阶级的需要出发而把社会的观念、社会的需要与阶级的需要对立起来，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促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这样建筑起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会好比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我们的现实社会，虽然没有了剥削阶级，但在人民大众里面也还有各种不同的阶层。对于思想和文化的需求，也有不同的层次和需要，不能搞一刀切和简单化，这是我

珠江三角洲党的建设的特色

陈嗣伯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党的建设尤其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总结他们成功的实践经验,对于今后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特色之一,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来提高党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指导,而且要求人们,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更新观念,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带头人。为此,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的组织紧密结合近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广大党员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在教育中,他们采取请进来,送出去,在职培训与脱产培训相结合,政治理论培训与业务管理培训相结合等办法,下决心抓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台山市从1987年起,全市26个镇和市各部委办均办起了党校和培训中心,各级党委以党校(培训中心)为阵地,每年坚持把95%以上的党员轮训1—2次。顺德市近些年来,先后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527期,培训干部5.3万人次,另从外地请进来大批人才,充实和加快党的干部队伍现代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青化的进程。通过“三基”教育,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对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

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珠江三角洲各地党组织把邓小平南巡讲话作为党的建设的指导性教材,不仅举办了各种类型各层次的专题学习班,读书班,还要求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着重解决如下几个思想认识问题:一是通过总结14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正确性的认识,加深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信念;二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探讨,提高对改革开放必然走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必须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的认识,使广大党员摆脱“左”的束缚和计划经济旧体制的影响,增强对经济体制转换的适应性和自觉性;三是通过学习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全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分辨能力,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大胆闯、大胆试,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子。珠江三角洲广大党员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精神的学习、贯彻过程中,焕发出新的战斗活力。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1992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出现了第二个高速良性发展高潮,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经济繁荣、市场活跃、社会安定。

特色之二,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来提高党员的执政意识和执政本领。要使我们的党在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中立于不败之地,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组织至为关键的是要对广大党员进行了增强执政意识和提高执政本领的教育。通过教育,使他

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时所应该认识到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

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2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生

们进一步认识到，执政前党的任务主要是砸烂旧世界，而执政后的任务则是领导人民建立一个新世界。具体说，就是如何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社会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不能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实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体现，党的先进性也失去基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也无法增强。因此，执政党的执政意识与党的基本路线是统一的，执政意识与执政本领归根到底要通过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来实现。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组织的大多数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不尚空谈，提倡务实。在党的政治建设上，也十分注意清除“左”的影响，把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素质的要求紧紧与党的路线、方针、任务联系起来，以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任务、新的要求来衡量党组织和党员。不少基层班子、基层支部都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和指标，而其中，党组织和党员是否带领群众促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否取得实绩，是很重要的标准。执政意识正确与否，执政本领的高低，最终看本地区、本单位两个文明建设的实绩如何。例如，南海市242个管理区，1990年集体收入超千万元的达到168个，占2/3，文明村、户建设也普及到各村各户，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了，社会治安也大为改善。在今天的南海市，集体经济实力强，党组织、党员干部有威信，党的基层组织成了广大群众的主心骨。

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组织还十分重视在党内开展廉政教育，把廉政教育作为执政党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搞活经济的同时，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洁，是改革开放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各级党组织注意“两手抓”：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廉政和党风。在具体工作中，他们突出了三个方面：一是廉政教育以正面教育为主，同时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廉政、监督制度；三是严格划清界限，从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出发，大胆保护支持新生事物。近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多数市县，都建立了党风责任制。顺德市还围绕人、财、物、证、分配等五大环节，先后建立了18种制度，广州市白云区也先后制定了15项廉政制度和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在改革开放中既大胆放手工作，又严格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特色之三，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一）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入党手续。党员是党的细胞，党员的质量如何，关系到党的肌体是否健康和充满活力；影响着党的性质和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决定着党在社会组织中的政治作用。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的组织在发展新党员时，也曾遇到过一些难题。如有的人曾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员标准不一定要求那么高。党组织便引导大家认识党员标准是党的性质的体现，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和怎样的“特殊情况”下，党员标准的本质内容是不变的，党员标准是一种先进、特殊的社会行为与准则。

为了严格党员标准，保证党员质量，他们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新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具体做法是：首先，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考察；其次，严格按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吸收入党；再次，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最后，坚持预备党员的预备期考察制度。

（二）抓好各级党组织的班子建设，选好一、二把手。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珠江三角洲在抓好班子建设上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积极推进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把各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领导集体，从而实现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的市县在调整和配备领导班子成员中还根据自己市、县具体情况制定一系列大胆用人的措施。譬如：东莞市委在选拔一、二把手时就规定：（1）实行“有功者上，平庸者让，有过者下”的原则。（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当支部书记：多年来经济改变不了面貌者；只顾自己致富，不顾集体致富者；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者。（3）对年老体弱，政绩平平的党支部书记，则动员其主动让贤，退居二线或退休。（4）有些支部书记一时难于找到合适的人选，由镇（区）委从机关单位选派。

2.逐步地完善领导班子的整体结构，使各级领导班子具有与领导职责相适应的领导功能。珠江三角洲在配备领导班子时，非常注重从整体功能和分工的需要上来选人，特别是选好配好党委和政府班子的“一把手”。他们认为，党委

文化共识与中国近现代民族凝聚力

刘 宗 碧

一、问题的逻辑起点

探讨中国近现代民族凝聚力问题,首先必须确立一个逻辑起点。必须先弄清什么是民族凝聚力,它的内涵与特征是什么。否则,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我认为,民族凝聚力就是民族内部形成文化共识而促使民族成员相互吸引、团结、统一的作用。文化共识及其作用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涵。它主要表现为在民族主体(民族成员)文化心理的观念层次上形成认同而产生对主体本身的作用。^①由此,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共识是否形成和处于稳定状态是判断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增强与否的根本标志,同时也反映了该民族发展的状况。这样,必须在界定民族凝聚力内涵的前提下,揭示民族文化共识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表征状况(内容的构成及其变化特点),才能真正弄清近现代民族凝聚力问题。因此,我们研究近现代民族凝聚力问题,就主要是揭示近现代社会人们思想行为在近代化过程中的认同特点,即民族文化共识形成的特点。我们知道,文化共识与文化一样不仅依赖于文化本身的传播功能而具有继承性,而且依赖于文化的实践性而具有创新性。因此,一般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随文化的发展而具有不同时期的文化共识,民族文化共识

和政府班子中的“一把手”,在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政治导向、战略决策、勤政廉洁和发挥班子战斗力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选好“一把手”,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关键环节。

3. 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各级领导班子成员思想和行动。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的组织认为,干部队伍建设历来都是为党的政治路线和任务服务的,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和任务,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干部队伍,今天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就要建设一支懂经济、会管理,能够胜任繁重的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干部队伍。为此他们明确地提出,领导班子成员,不论分管什么工作,都应了解、关心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局。他们还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学习经济,熟悉经济,努力把握经济建设规律,取得领导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4. 严格坚持民主集中制,切实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组织提出,在各级领导班子内,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然后再经过集体讨论决定。

他们认为,班子中的个人能力再强,水平再高,素质再好,如果在整体上不团结,不协调,这个班子就不会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严明党的纪律,加强监督管理。党的纪律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珠江三角洲各级党的组织在加强党的纪律时,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增强广大党员的纪律观念;第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完善党的法规;第三认真查处违纪案件,把变质分子清除出党。

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党的各级组织还突出了民主监督。顺德市在抓民主监督时,不仅注意抓党内监督(即党组织、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以及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相互间的监督),而且非常注意抓党外监督(即人民代表大会、检查机关、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广大人民群众等的监督)。几年来,他们建立和健全了各项民主监督制度、协商对话制度、信访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贯彻了“教育为主、疏导为主,警钟长鸣”的方针。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 生

总是在新、旧内容的文化的交替、转换中发展。随着时代的推进,民族文化共识在文化创新与选择中不断扬弃、构建新的内容。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就受到文化共识及其内容构建的变化规律的制约。所以,从近现代民族文化共识内容的构建所反映的文化共识变化、发展的特点来分析近现代民族凝聚力的状况,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

文化共识内容的构成一般分为表层的外显性文化因素和深层的内隐性文化因素。表层的外显性文化因素主要指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各种自然观等理性思维层次。它的特点倾向于创新性,其变化、发展快,而且规模大,体现时代精神。所以,我们分析文化共识的内容的变化、发展规律,主要指的是表层的外显性文化因素。事实上,近代民族文化共识的变化也主要是表层的外显性文化因素,它是制约近现代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性方面。那么,作为表层的外显性文化因素的政治、经济等理性的文化观念,就是我们探索近代民族文化共识变化、发展的主要内容。本文将主要从这一点来论述。

二、近现代民族文化共识变化的历程

鸦片战争以后,随西方列强武力的入侵,西方文明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大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受到空前的冲击。人们在不同文化比较中,不得不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这就提出了民族文化共识的更新问题。这一更新过程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集中地从社会思潮中反映出来。社会思潮是一种具有广泛性和时代性的群体意识的体现,它反映了某一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文化共识的主要社会表现形式。近现代的文化共识从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几次大的兴替,具体分析如下:

1.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潮

经世思潮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序曲,反映了新的文化共识的萌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弊患丛生,然而,康乾以来,在学术界中一直盛行“考据”学风,面对故纸,背对现实,学术无以解答时政。张瑛贴切地评述道:“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②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重新面对现实,产生新的社会思潮成了必然。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人们把清初遗下的“学以致用”的

思想拾来重新面对现实,产生了经世思想。尤其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内外交困,社会积弊更加显露。在比较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经世思想更加深入。当时经世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1831年龚自珍写的《明良论》,开创“慷慨论天下之事”之风。魏源也撰写了《海国图志》等著作。在内患外忧之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语论。总之,“经世思潮”的兴起,虽然有其落后的一面,但它无疑标明了近代一种新的文化萌芽。

2.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思潮

洋务思潮是中国近代文化共识兴替的第二站。它产生于1860年左右,其思想渊源是经世思想,而引发的社会背景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圆明园被焚,强烈刺激了国人,直接导致以后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洋务思潮。洋务思潮的根本性思想,是企图回答中国落后在什么地方?要不要向洋人学习?以及如何通过学习洋人而自强等。洋务派的主要代表有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他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在实践上学习西方兵制,办军事工业,以及后来的民用工业等。洋务思潮代替了经世思潮,作为当时社会一种最进步的文化先导意识,对国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其存在阶级和认识层次的局限性,反映的主导思想仍然停留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之内,也是反映了新文化的构建——中西文化的结合仍停留在文化表层的物质层次上。但不管怎样,洋务思潮体现了民族文化共识的新内容比以前更前进了一步。

3. 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思潮

经过洋务思潮以后,中国人逐渐地抛弃了几千年来的“夏夷之辨”、“天朝上国”的旧观念。建立了大批的近代厂矿企业,兵工厂,以及近代的海军。可是,1893年甲午一战惨败,又一次严重打击了国人和开明的知识分子阶层。局面使得人们思考:三十年的洋务为何不能使中国富强?中国富强之道到底何在?于是出现了维新思潮。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新型的思想家。把中国的弊端瞄准了与政体有关的“制度”问题。人们走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框架,开始学习西方的政制思想。到九十年代末,发生了康有为领导的“百日维新”运动。这场运动在文化观念上的突破是

提出了“宪政”，以及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如当时推崇废科举，办西学等等。总之，维新思潮展示的国人心态，标志了人们在文化构建上深入到了制度等更深的领域。改制为主的思想是维新思潮的主题。无疑这一时期的思想比以前又前进了许多。

4. 庚子之后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

维新变法的失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在改革救国道路上已走到绝路，然而，八国联军的入侵，议和赔款，清政府把刀口转对“扶清灭洋”的下层群众。促使一种反抗精神支托的反帝反封建意识萌芽，它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形成了二十世纪的革命思潮。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了这种思想的带头人，并积极领导了武装起义，以革命求救国，如1900年的庚子起义等。另创办《国民报》宣传革命思想，指出中国出路在于革命。革命思潮的兴起，成为时代的风帆。此后，“五四”时期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种更崭新的文化思想出现，它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要求实现“民主共和”，而且在经济上要求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已不仅仅是意味着政治、经济上观念的突破，而且在道德上、思想方法上也已立足于新的逻辑起点。当时伴随着批判旧道德、旧文化，倡导新道德、新文化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更新从整个体系的表层变革推到了深层的领域。实质上，这一时期革命思潮涉及的范围是整个文化领域的，具有划时代转化的特点。这种新观念的确立比以前的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作为民族文化共识的表征反映出稳定性的趋向。

5. “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

庚子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在反封建和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上显现了进步性，所以，这段时期对于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种思潮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乃至以后。但是，它的理论和前面的一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问题，所以，在“五四”运动以后已显现了它的局限性，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便走向了反动。与此同时，中共的诞生及其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这一思想是在“五四”运动后随中

共诞生而萌芽、初步发展的，而开始走向成熟，确立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从那时起，中共走自己独立的武装斗争道路，在第二次革命时期、乃至后来，通过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而得到壮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共鸣和支持。所以，在近代新文化共识的发展中，真正建立成为稳定的文化共识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由它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为核心内容构成新的稳定的文化共识。中共吸收了以往各种优秀的文化思想，同时提出了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和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赢得了群众，成为新的稳定的民族文化共识。这也是中共为何取得她事业胜利的根本所在。

总之，从历史纵向看，近代民族文化共识的发展经历了五次大的兴替过程。既反映了新文化共识由产生、发展到稳定的历史特点；也同时反映了旧文化共识由减弱到灭亡的历程。我们窥其发展的轨迹，显现了下列特征：

其一，文化共识是在“扬弃”旧的传统文化和吸收近代西方文化逐渐形成的。新的民族文化共识的形成经历着不同派别、不同主张的斗争。而各种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是否适应社会现实，促进社会进步是它是否成为民族文化共识的先决条件。

其次，新、旧文化共识的内容的更替，首先和主要体现于文化的表层显性因素。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思想行为的近代化体现出文化共识发展规律的。

再次，近代民族文化共识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新文化不断否定旧文化的过程。就新文化共识方面而言，直到中共诞生及其主张的提出才真正使新文化共识趋于稳定。而相应的旧文化共识则是由稳定到松懈，以致消亡的发展轨迹。

三、近现代民族凝聚力变化、发展的特点

由上述可知，中国近现代民族文化共识的变化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其一，是旧文化为基础的旧文化共识的逐渐缩小、减弱和消失。其次，是新文化为基础的新文化共识的逐渐扩充、壮大和走向稳定。前者的社会表征是各种旧的行会、

旧的团体的逐渐分解、灭亡；后者的社会表征是各种新的集团、新的政党的逐步建立和强大。这样，近代民族凝聚力是受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共识及其作用的影响的。为此，我们理解、分析近代民族凝聚力就不能停留在单线性的理解上。近代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共识及其构成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必须从两种不同文化共识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确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分析路子。为此，我们可以肯定近代新、旧两种文化共识及其作用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交替、转换的特点是制约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根本机制。据此，一般说来，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共识所产生影响的社会效应度（即人们所受影响的面度和深度）相差越大时，人们的思想总是偏向新或旧文化的一方。那么这时民族凝聚力就越大，社会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当两种文化共识所产生影响的社会效应度相差越小时，反映了人们的思想的新、旧偏向处于相应的对等状态，思想涣散，不能形成绝对优势的社会群体力量。那么民族凝聚力就越小，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尤其，当两种文化共识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处于平衡时，人们的思想的倾向性十分复杂、思想意识最混乱、最缺乏统一的意思，社会的冲突就特别尖锐，民族凝聚力处于最弱的状态，社会呈现四分五裂，极不稳定。我们从社会发展的具体历程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变化、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强弱状态。我们具体分析如下：

1. 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维新变法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基本上还不能完全脱胎于旧传统文化，旧的文化共识仍处于较稳定状态；而相对的新的文化共识却又仍处于萌芽、发展之中，还不具备新文化共识的雏型。所以，其间两种文化共识所产生作用的社会效应度，是旧文化共识的大于新文化共识的，二者之间的社会效应度相距还比较大。于是，民族凝聚力基于旧文化共识仍较稳定的情况下，处于较强的状态。但已显现出由强到弱发

展的趋势。

2.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这一阶段，旧的文化共识已逐渐缩小，减退，稳定性变弱；而相对的新的文化共识却已相应得到扩充、增大、稳定性变强。二者的社会效应度接近于平衡状态，差距很小。因此，这一段时期民族凝聚力处于最弱状态。社会频繁动荡，社会各种组织的分化或诞生都特别频繁，社会矛盾处于尖锐状态。

3.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建立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共的诞生及其主张的提出，并得到广大人民的共鸣和支持。于是，以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核心内容构成的新文化共识逐渐趋于稳定；而旧的文化共识却逐渐没落和走向消亡。这样，这一时期两种民族文化共识的社会效应度相比，新文化共识较旧文化共识的大，二者之间的社会效应度的差距是逐渐扩大的。由此，民族凝聚力在新文化共识已处于稳定的情况下，又逐渐增强。其间，社会各种力量的表现是逐步走向集中，并形成大的社会集团或党派，出现占优势的社会群体力量。社会沿稳定方向靠近。

总之，从近代社会的整体看，近代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受这一时期文化共识新、旧交替变化的制约，呈现了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变化特点。这就是近代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规律。

① 刘宗碧《文化共识——民族凝聚力的内涵》，《学术研究》1992年第五期。

② 张瑛《读毛诗传》、《知退斋稿》卷一。

③ 《中日战争》（四）第14页。

作者单位：贵州黔东南师专民族研究所
责任编辑：凌 峰

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发展

章 权 才

中华民族凝聚力无疑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中华民族大群体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尽相同的时代特征。秦汉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封建生产方式的运动呈上升趋势,中华民族凝聚力迅速发展。但是,历史进入宋元明清以后,社会存在不同了,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封建统治一步一步衰败下去。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状况如何?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不前以至倒退?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史研究中需要揭示的重要课题。

我们认为,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组合,并实现了新的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租佃制的推行,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各地经济的开发,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互补性日渐加强。宋代以后,由于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壮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方式有了新的变化,租佃制普遍推行,代替了隋唐以前的部曲佃客制。部曲佃客制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租佃制是地主阶级通过契约关系和高利贷对佃农进行剥削,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农民的身分地位有所改善,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增加了可由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劳动积极性于是乎提高,社会生产力于是乎发展。

两宋以后经济的发展,既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领域,又体现在商业领域。农业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等方面都有所改善。手工业在陶瓷、造纸、印刷、矿冶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城市经济繁荣,供销规模扩大,内外贸易活跃。历史进入明清,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深化,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自然经济日渐松解,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破土而出。

宋元明清时期,区域经济和边陲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继南北朝隋唐以后,江南的经济开发

出现新高潮,并且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这在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与此同时,边远的省份也逐渐得到开发,如宋元明开发两广云贵,清代开发东北、台湾、内蒙、新疆。里所谓开发,是指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同心协力,披荆斩棘,营建土地,建立起生产生活所赖的经济基础而言。

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各地区经济的开发,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互补性有了进一步加强。一是首都跟全国各地经济联系加强了。据《宋史·食货志》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又载:“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二是中原跟边远地区的经济联系也加强了。三是内地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经济联系同样加强了。明代的大同、开原、洮州、大理等地,成了当时茶马交易的集中地。明代对女真各族的马市贸易很能说明问题。《全辽志·艺文》记载了当时马市贸易的盛况:众多的女真人“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胸。……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旅,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更欢忭。”

宋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程度上也不能估计过高。但商品经济毕竟发展了,资本主义毕竟萌芽了,这却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仅沟通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边陲和落后地区的经济起步,而且扩大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视野,使他们对“四海一家”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对于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二)在分裂与反分裂,割据与反割据,侵扰与反侵扰的斗争中,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得到维护,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异

常复杂、异常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北宋算起,下逮清初,三百年间,中国境内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和替代的局面。北宋的边陲,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金政权从东北崛起。宋金对峙,是两宋之际严酷的政治现实。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了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明代以降,北方的蒙古族,东北的满族,都跟明政权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由满族建立了清朝。

对于三百年来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政权,究竟应该怎样看?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群体,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入主中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主”,而不是什么反客为主。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由满族建立的清朝,他们都曾统一中国,达数百年。这个统一,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汉族统一业绩的继承和延续。他们维护统一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不过,在这几百年当中,民族关系的演进和民族矛盾的发展是复杂的。既有主流,也有支流。主流是维护祖国的统一;支流是闹分裂、闹割据。比如,辽宋并立时期,有澶渊之盟,有割据燕云十六州的事情。清初有三藩的叛乱。之后又有准噶尔部的造反等等。这些,都是闹分裂、闹割据的支流。但是,有分裂就有反分裂,有割据就有反割据。分裂和割据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不符合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经过历朝进步势力的斗争。分裂割据势力到头来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宋元明清时期,不仅有“内忧”,而且有“外患”。明清之际,外患表现得尤其明显。所谓“外患”,是指外国侵略势力的侵扰。举其大者,有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有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的侵略,有俄国扩张势力对我国北方领土的蚕食,还有西方海盗的东侵等等。这些外国侵略势力的侵扰,威胁着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势必遭到中国人民强有力的反击。戚继光、俞大猷、郑成功等人在反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中战果赫赫,功比日月。一些有作为的皇帝如康熙等人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分裂与反分裂,割据与反割据,侵略与反侵略的反复斗争中,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以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为核心

的爱国主义得到进一步发扬。两宋以降,《春秋》之学比较发展。宋代的刘敞、孙复、崔子方、胡安国、吕大圭;元代的赵汭、程端学;明代的湛若水;清代的刘逢禄、庄存与、孔广森、凌曙等均以《春秋》名家。因为《春秋》宣传大一统,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有着明显加强的时期。境内许多少数民族,都自认本族是“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以实现统一和维护统一为己任。据《辽史》记载,辽国统治者称本民族是“炎黄子孙”。金朝金世宗时期尚书右丞唐括安礼说:“猛安人与汉人,全是一家,皆是国人也”。清朝雍正也说过:满族住黑龙江流域,就象汉族住黄河、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国人而有不同的籍贯。清代中期,康熙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后,流亡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我国蒙古土尔扈特部,全部17万人历尽艰辛,回归祖国。宋元明清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自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是“正统”,又以实现统一、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己任。说明两宋以后,大一统观念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入人心。

(三)民族之间的和睦共处和矛盾冲突导致了深刻的文化交融,低势文化向高势文化学习的潮流随着少数民族统一政权的建立更加汹涌澎湃,民族融合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辽王朝在阿保机时期,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其统治对象,既有以农耕为主的汉人,又有以渔猎为主的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针对多元化的民族结构和经济结构,辽朝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治世方法。但是在文化路线选择上,辽朝统治者显然向高势文化靠拢,努力采纳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并沿着汉文化的轨道,改造和发展本族文化。这在《辽史》中可以得到印证。

女真族击灭辽国建立金国以后,向汉文化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也是很高的。金朝教育制度耐人寻味,金世宗大定六年规定,金的国学除学习经术外,还要学习《老子》、《荀子》等书,还要学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新唐书》以及《五代史》等等。金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吸引力,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对整体的向心力,

其结果,也就必然导致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建立了元朝的蒙古族的汉化,最初是步履维艰。这跟蒙古族在血缘、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历史地形成的特殊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入主中原后,同样摆脱不了低势文化流向高势文化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支配。忽必烈对中原汉族文化持欣然接受的态度。他广延汉族谋士,兼听他们治世之道。他接受了许衡等人的建议,断然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规定的各种细目,许多被继承下来,这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毕竟是一件大事。元朝的汉化政策,对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影响尤大。云南一带宋朝以前儒家思想影响薄弱,但到了元朝,云南兴建了文庙,推崇孔子,传播儒家思想,使边疆和内地逐渐强化了共同的心理素质。

清朝满族的汉化,道路比较曲折。最初,他们推出“首崇满洲”的国策,把满族文化置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之上。顺治初年,清廷甚至下令汉民要编发,要易衣冠,要向满族看齐。之后,又接二连三大兴文字狱,打击汉文化,打击汉族知识分子。他们还利用《四库全书》的编纂,对含有民族思想的汉典籍实施围剿。但是,诸如此类的文化围剿不仅没有实现狭隘民族主义目的,反而引起汉族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抗。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毕竟不可抗拒,满族文化仍然以无法阻挡之势,在汉化的道路上大踏步演进。

其实,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实施文化融合,是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代就开始了的。他曾下令广译汉族典籍。随着汉族典籍的翻译,汉族流行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治国方略等,都广泛渗入到满族社会,逐渐成为他们民族心理的组成部分。随着清帝国的建立,满汉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沟通。汉族儒生的入仕和满汉两族的共处,为这种沟通提供了种种有利条件。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开始实施满汉通婚政策,上谕指出:“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清实录》,世祖朝卷40)满汉通婚,既有政治意义,又有文化意义。婚姻改变血缘,这是汉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崇儒重教也是满族汉化的重要内容。康熙亲自拜谒孔庙,命人进讲《资治通鉴》,广召学者编纂图书典籍,同时制定《圣谕十六条》,把儒家历来倡导的“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明礼让以厚风俗”等作为基层教

育的指导思想。《清实录》是用汉、满、蒙三种文字缮写的;《五体清文鉴》是用满、汉、蒙、藏、维五种文字编修的。诸如此类,都是在汉化的基础上推进各族文化融合的有力佐证。

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汉化问题,是低势文化向高势文化靠拢的问题,是文化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汉化并不意味着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也不意味着汉族文化的简单转移。特定的民族文化是适应特定民族生存的特点而形成发展的,是在民族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化的精神依托和力量,所以它是不容易被彻底否定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汉化中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保留了民族语言,保留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一系列礼制。这在女真和满族的汉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汉化是两种文化碰撞和引伸的结果,在碰撞中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无论是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在碰撞中都各有吸收,各有扬弃,其优秀部分,则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

(四)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族共同体进一步发展,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共同规范意识进一步强化,亲情意识进一步积累。宗族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民聚族而居,形成一种以土地和家族为向心凝聚力的稳定结构。到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为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壤。无论城市和乡村,普遍存在宗族共同体。什么叫“宗族共同体”呢?东汉“国宪”《白虎通》作了十分明白的解释。根据有关解释,可以发现两汉以降的“宗族共同体”起码有如下几层属性:其一,“宗族”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凑合在一起的群体;其二,宗族内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作感召;其三,“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表明扩延性比较广大;其四,宗族内部有着一定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其五,宗族内部有上下尊卑之别;其六,还有一套适应宗族活动的礼仪形式。总之,所谓宗族共同体,就是由一个男姓先祖的子孙团聚而成、重视血缘关系,有着共同利益,强调伦常秩序的比较稳定的社会集合体。

两宋以后的宗族共同体在增强亲情意识,贯彻传统道德,加强宗族成员间的亲和凝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宗族共同体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

和祖先崇拜,这是把宗族成员凝聚在一起的前提。宗族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权力系统,它赋予族长以巨大权力,族长是宗规、族约的主持者,是族人共同行为规范的监督者,是全族的表率。族内发生矛盾时,由族长召开本族头面人物的会议,按宗规、族约加以裁决。这是把宗族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权力保证。宗族共同体有着共同的伦常观念和道德规范,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宗族共同体内部还提倡生产、生活上的相互帮助,诸如助耕作、立义仓、扶老弱、恤忧患等等。在力单势薄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宗族内部的相互帮助,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也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

(五)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民族的融合,中西文化的激荡,传统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主意识有了进一步加强。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内容上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哲理文化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理学的兴盛。理学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当然也涉及到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性,是指人性,物性;天道即理或天理。理学所以在此时冒出来,有儒家传统的义理之学的继承问题;前此有佛教、道教哲理思想的吸收问题;有自然科学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值当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矛盾的发展,有意识形态领域如何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问题。理学跟经学是相衔接的,理学家着重研究的是儒家经典,可以视为经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第二个特点是市井文化的发展。这是跟宋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兴起,带来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特殊要求。社会存在不同了,意识形态随之发生变化,结果导致市井文化的勃兴。从此,优秀的市井文学也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个特点是科技文化的发展。宋明时期,也就是十六世纪以前,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无论是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国都站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宋明科技所以能实现新发展,这跟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有关,跟当时思辨哲学的发展有关,跟一些统治者的提倡、鼓励和奖掖有关。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是指南针、印刷

术和火药武器的发明,这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宋明时期,中国科技人才辈出,成果很多,北宋沈括博学多才,所著《梦溪笔谈》涉猎面广,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和里程碑。宋元时期,我国出现了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四大数学家,把古代数学的发展提到新水平。陈旉、王桢是农学家,在农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天文仪器和历法制作上,成果累累。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完成了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大综合。徐光启在天文历算和农田水利方面,徐霞客在水文地理学方面,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综合发掘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必须指出,宋明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当时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和中西文化不断碰撞的背景下,实现新发展的。宋明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达到了高潮,形成了既有统一意识,又富有各民族特色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具体情况,如上所述。中西文化碰撞,则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元朝,一是在明清之际。元朝的中国对外部世界大开放,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带来了异邦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开阔了中国科学家的视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出现新高潮,中西文化激荡更加波澜壮阔。当时的西学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进来的,比较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汤若望等人。从内容上看,他们传进来的西学,既有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但主要的还是自然科学。面临西学流播,中国的政界和知识界态度并不一致,出现过盲目排外的倾向,也出现过盲目崇信西方的倾向,但主流是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学习和吸收西方有用的东西。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最初几个皇帝对西方传教士是敬重的,对西方的科技知识是虚心学习的。如顺治,他对汤若望就很敬重。康熙对西方传教士也很信任。在知识界,主流派以徐光启、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他们在西学前提出了“会通以求超胜”的主张。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明史·徐光启传》)这就是说,中国人要超胜西方,必须走会通中西即综合中西之长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把西学忠实地翻译过来,这种态度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这也

“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 学术讨论会述要

孔 庆 榕

以“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1992年12月9日—12日在中山市举行。这次会议，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系列研讨的第三次大型学术会议。兹述要如下：

中华民族精神是近年来海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次讨论会以前，大陆学者对“中华民族精神”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歧义主要在于是否应从优劣两面去审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否同时具有精华与糟粕这样的两重性？民族传统文化的局限性是否也应归入民族精神的范畴？从本次讨论会的论文和发言来看，与会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尽管表达各有不同，但都倾向于民族精神应理解为“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为多数人民所信奉”，而且“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的“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

也有学者认为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作精华糟粕之分，视野就未免不够宽广。作为人类存在方式及精神升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中性”的。它们本身并无什么优劣好坏之分。所谓精华或糟粕，都是人们在具体的实践背景下相对于一定参照系来说的。离开这具体的实践背景和价值参照系，无所谓什么优劣好坏、精华糟粕。因此，持此论者“倾向于用一定价值参照系下文化功能的‘可能性选择’去说明其实践中的优劣好坏、精华糟粕，强调现实人在特定背景下实

践中的能动性选择，用以防止人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历史”。

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看法上分歧较大。

一是认为，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没有凝聚力这个核心，就没有民族，根本谈不到什么民族精神。

二是认为，民族精神是渗透到人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各方面，从而形成民族的凝聚力。

三是认为，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是一回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功能，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

第四种意见认为，民族精神与民族的凝聚力是互为存在的条件，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没有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就解体，不可能有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产生以后，就使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变为自为的民族，民族的凝聚力就从主要依赖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血缘、地缘、亲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朴素感情和自发凝聚力上升到理性思维，变为自觉的凝聚力。

关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化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个动态概念。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定型产物，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又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中华民族

说明，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

总之，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在传统继承中，在民族融合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实现了新的发展。这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华民族自尊心、自

信心和自主意识的加强，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凌 峰

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

天 祥

清末民初,教佛在内忧外患、国运危殆的形势下勃兴。这既反映了知识界经世救亡的需要和理论思维的渴求,同时又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梁启超不仅用佛理补充儒家之说,形成了他的东方人生哲学和佛教救世主义,而且在向传统折返的同时,从学术的角度,把佛教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输入、发展盛衰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广泛地研究,成绩斐然,远在其佛教哲学研究之上。他在佛教历史的考证、义理的阐释以及典籍真伪的辨识诸方面,既有浓厚的兴趣,更有大胆的创新与实践。他对佛教义理的阐释,不再是谈空说有、幽隐玄妙,也不只是注经释相,历数公案,而是以新民、救世为目的,依靠觉悟、智慧、自力,奋身入世,藉以实现“人间净土”为终极依托的经世佛学。或者说,他是借佛学之石,击救世之钟,以“佛经注我”的精神,把佛理作为他争取自身权力和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至于他对佛教史的研究和佛教典籍的考据,也不纯是为求得史实和经典的真伪而作。他既重史料的翔实,更重视个人的意见和主张。在确信佛法是“求得最大之自由

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①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确信佛法是救世之法的前提下。进行分析和考证。他研究的目的在于昌明佛法,而佛法的宗旨在于救世,因此也可以说救世就是梁启超佛教研究的宗旨。当然,佛学研究也是他独善其身,进行文化自由创造和人格自我完善的具体表现。

梁启超研究佛教历史的目的之一是昌明佛法,即澄本清源,揭示佛法的真义。所以,历史和义理的密切结合,着意强调佛教教理在佛教发展史上的显著作用,便成了梁启超佛教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篇中强调的用客观的方法去求得历史的“真事实”,然后以“心识中所怀之哲理”,给予新的界说。这种界说一是对当时思想的分析,二是对经义的阐发,三是直抒自己的见解。

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结合史实和其它资料,对汉明永平求法之说以及四十二章经辨伪,指出佛教初输入的时间“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

凝聚力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凝聚点。我们今天,既要把握中华民族凝聚力面临的新形势,又要把握其当代的凝聚点,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有些学者认为,今天,我们要充分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年代,中国大陆社会正处于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有几点值得注意:(1)工业文明兴起,地缘、亲缘关系为业缘关系所替代,故土情怀、亲缘情感丧失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2)文化开放与文化反思导致文化多元局面,原有文化认同动摇;(3)国际交往加强、民族隔离减少、个体生存空间扩大,原有的巢覆卵亡的共生意识削弱;(4)伦理规范重建、思想观念更新使旧式的和合观念、重国伦理、报国赤诚受到冲击。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已经面临一种新的情况、新的检验。需要将传

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以朴素情感为核心的旧式民族意识和凝聚力转化为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以理性情感为核心的新型民族意识和凝聚力。

学者们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指的是涵盖了民族整体精神实质,容纳了不断更新的时代内容的民族精神本性,有助于推动整个民族在适应环境需要与创新生存条件的互助中进步的“民族灵魂”。民族精神,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于一时,僵化于某观念、定形于某种行为的东西,它始终在表面形态上显示活跃性、丰富性、具体性。有些学者还指出,民族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既有连续性,又要有创造,是传统优秀文化的升华,又是当代民族生活实践的新的概括,是上述关系的辩证统一。有些学者认为,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认识和概括民族精神,要放在世界民

准。”他说：“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潭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大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另外他还认为，“佛教二千年来，循进化之公例，常为不断的发展，其最显著之迹，则由小乘而进为大乘。”并指出“欲对佛教史为系统研究”，决不能因袭中国相传的“大乘早出”之旧说以及西欧的“大乘非佛论”，“宜破除大小乘名目，观其各派互相之影响，而察其教理蜕进之所由。”^②这里他显然把小乘、大乘教理上的不同，当作佛教发展史上的根本变化。我们姑且不论他关于佛教输入的时间、地点正确与否，但他把佛教教理的传播作为佛教植根于中国的标志是颇有见地的。这一独到的见解，同样表现了他不因循旧说、重思想内容、重义理阐发的学术特征。他肯定，“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阅争，道家捏造寓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这段话看起来客观而又公正，事实上崇佛之情不言而喻。当然更重要的是排除了“老子化胡”的无稽之谈和“明帝感梦金人”的鬼神迷信之说，他是把佛教做为“呈其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的宗教哲学来对待的。

教理的传入是佛教输入的根本标志，而教理的输入又取决于佛典的翻译。基于这一思想，梁启超特别重视西行求法和佛典翻译的研究。他以大

量的历史事实和合乎逻辑的分析，进一步强调了教理对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直接作用。我们知道，理论在一个民族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一理论对于这个民族需求的满足程度。因而，一种新的思想学说，向另一个陌生的民族渗透，必须适应这个民族的心理习惯，并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为了加速佛教的传播，传教者势必对佛教进行适当的改造和加工，以牵合附益中国流行的宗教观念乃至整个文化思想，故译文很难符合原意。加之“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③不懂就不译，阙失更在所难免。更何况还有些似是而非的翻译，遂致佛典的失真，教理的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梁启超虽然未必完全把握了这些因素，但他指出“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者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④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他依据各种史料的记载，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然后，直抒己见，阐明“对于经典求完求真之念”^⑤是西行求法的根本驱动力，是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他说：

在此种状态之下，必先有闻诵之人，然后有可译之本。所诵者完全不完全，正确不正确，皆无从得旁证反证。学者之以求真为职志者，不能以此而满意，有固然矣。于是西行求法热骤兴。^⑥

他认为，这种骤兴的求法热潮，是以求真为职志，而非以朝圣为目的。他接着说：

族之林中认识和概括民族精神，要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认识和概括民族精神。

什么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呢？不少学者不赞成把它理解为是古代优秀文化加时代精神，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以传统的民族精神为基础的自我创新。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这个课题早期的一些论文过份强调儒家思想对当今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表示不敢苟同。还有的学者认为，以往对民族精神的讨论，多注重于古代，言必称诸子，不外儒释道，是否忽略了民族精神必须包括或体现了时代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培育，不可过度偏于传统精神价值的强调。因为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往往以

简单的道德判断命题提示，在现实生活的变迁中容易形骸化、空疏化。用之号召群众，时而产生负面效果，且易使群众养成表里不一的双重精神面貌。有些学者举例说，例如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群体本位意识，就具有两重影响。从正面看，它熏陶了中国历史上大批志士仁人，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负面看，它也起了泯灭个性、扼杀个体创造精神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如果片面追求群体价值而忽略个体价值，显然是与历史发展的要求相悖的，应该提倡群体与个体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凌 峰

我国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礼麦加，纯出于迷信的参拜也。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渤。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⑦

他列举了西行数人之游学动机，以佐证这一观点。如法护、法显、昙无竭、道泰、朱士行，玄奘诸人，或“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或“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西渡流沙”，^⑧或见所译经籍，“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识穷，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⑨

梁启超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佛教同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根本上区别开来：中国佛教是在对教理的纯挚求真之念和不断的完善过程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宗教哲学；其它两教则是在对超人——耶稣和穆罕默德——的顶礼膜拜下，激发的宗教迷信。佛教作为救世的科学理论武器便在这种区别中找到了历史依据。当然，他把中国人西行求法的原因简单化，也绝对化了。他忽视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以及宗教发展的自身规律，因而影响了它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但他的结论还是有些独到之处。他的意向所起的积极作用——促使近代学人注重佛教的思辨性和经世性——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把南北朝至唐代列为佛学时代，把宋、元、明列为儒佛混合时代。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指出晚清有一股佛学的伏流，势将奔涌而起。此意在强调佛学在中国思想史的深远影响和稳固不易的地位。他把佛学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学的第二源泉，充分表现出他那深邃精粹的文化观念。他认为，佛学之所以能在儒学根深蒂固的中国国土上植根并兴盛起来，固然有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但它自身所具有的思辨性以及它的价值取向的二重性，则是儒学望尘莫及的。所以，他特别说明：

吾昔尝论六朝三唐之间，为中国学术最衰时代，虽然，此不过就儒家一方面而言……当时于儒教之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则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

汉末至唐，数百年间，佛学做为一种观念态

的文化，在思想界，曾经动摇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因而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梁启超显然抓住了历史上这一文化现象，介绍了佛教演变发展过程及大小乘十三宗传承的历史，重点阐述了中国佛教之特色，

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

他认为中国佛学独传大乘，以宗教而兼哲学之长，是其在中国兴盛的内在原因。同时他把佛教和基督教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

耶教唯以迷信为主，其哲理浅薄，不足以履中国士君子心也。佛教本有宗教与哲学之两方面，其证道之究竟也，在觉悟；其入道之法门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中国人惟不蔽于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哲学方面，而不在宗教方面。而佛教之哲学，又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也。

梁启超这一比较，加上他那常带感情的笔锋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论证，揭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民族心理因素，进一步强调了佛教“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在于唤起人的觉悟，启迪人的智慧，依靠自身的力量，故能与中国原有的哲学互为辅佐，相得益彰。同时指明，宋明儒学的复兴，实有赖于佛教理论思维的渗透和滋养。可见，他不仅把佛教做为中国文化的源泉，而且把它做为中国文明的新鲜血液。

又如其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翻译是中国佛教的“托命”之所在。此文详细考证了汉末至中唐七百年间的佛教翻译史和大量文献，把译经事业分为三期四段，启发人们了解佛教发展之大概以及经典传译之源流，并藉此大发宏论，说明译经事业经千百人相继续努力，积数百年不断进化才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告诉人们，当时西学东渐，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再度兴起，因此，我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经验，“其长短得失，亦一一可取鉴”。

至于其在佛教史的研究和佛典的考据中，对经义的阐发，举不胜举，这里不拟赘叙述。然而，也应看到，梁启超史论结合的方式，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有时纯粹是兴之所至，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如他在《说四阿含》中说，他在研究佛经成立之历史时，首先拟出四个观念为前提：1.

凡佛经皆非佛在世时所有；2.佛经追述，公开结集者可以确考，私著者无从确证；3.佛经丛书或一时代完成，或历若干年增补附益；4.佛经初无写本，惟持口诵，随教所被，各以其国土之语写就，故凡佛经皆翻译文学。其中有的是基于客观分析而作的深刻猜测，不乏学术上的价值；有的却是囿于见闻，随心所欲而作的无本之论。比如说佛经皆翻译文学则是囿于中国佛典翻译的特殊情况而得出的结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且还表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

梁启超在一次关于五千年史势的演讲中曾说：

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也，吾尝言之矣，曰：“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可言。”^⑩

“当时”是时代背景，“此地”为地理条件，治史不得离开时代和地理环境，这是梁启超研究历史的方法。因此，他在研究佛教史或佛教典籍时，总是以当时社会为整个画面，把佛教的发生和发展置于时代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潮之中，进行分析研究、综观概括的。藉此再现人类的活态，而非展览历史的僵迹。这是梁启超佛教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门阀士族和下层豪强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减，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造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状态。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统治阶级互相倾轧，朝不虑夕；劳动人民颠沛流离，拚死挣扎。整个社会都在动荡。而反映在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上也处处表现出显著的对立。两汉“碎义难逃”的经学，为社会所厌，做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因之而动摇。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随之而起，为佛教思想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梁启超在他的佛教史研究中，始终以“社会事实”为依据，把握人们社会行动的动机，了解这种社会行动所产生的意义，从而实现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首先他认为不良的社会现象是佛教产生的社会基础。他说：

社会既屡经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劣世界，生种种烦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

于佛。^⑪

他在探讨南北朝佛教发达的原因时，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季汉之乱，民瘼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休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信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重。^⑫

由于社会的大动乱，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一种危机感。整个民族心理趋势的变化便是佛教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但他的这一看法基本上符合唯物主义认识发生的规律。他说明了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这一意识参与构成了佛教产生的文化背景，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

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指两汉经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义理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学，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⑬

这就是说，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固有一种适宜佛教生长的要素，即探求宇宙大法的义理之学，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是思想发展史的重要一环。不仅如此，他在说明佛教初输入地的问题时，除了从地理条件上——“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说明南方为佛教的初输入地，而且还特别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地阐明了南方文化思潮与佛教思想的契合。他说：

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贵现世重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

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虚，其论道则慕出世。……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④

这一论述的根据和结论，正确或错误，均为一家之言，我们不必评断其是非。惟其把老庄思想做为佛教传入的文化根源，诚为后人所折服。在同一篇文章，他进一步强调了佛学和老庄学派的关系，并根据地域文化的不同特点，对南北方佛教的不同发展趋势作了比较研究。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孕育于老庄学派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褒崇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

……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但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可见，梁启超确信适合的社会思潮，不仅是佛教植根的良好土壤，而且不同的文化观念，也将决定佛教发展的不同方向。由于南方尚理解、重自由研究，因而佛教义理得以深入而呈社会思潮；北方为专制势力，人们习于盲目信仰而易于普及。在这里，他强调社会思潮对于学术思想的直接影响是值得重视的。但由此所表现的文化单向决定有忽视政治、经济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倾向，同样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

梁启超说宇宙间现象有两种，一曰循环，二曰进化。这是生物进化论在他社会史观中的折射。他肯定历史在进化，人类在进步，这是历史的乐观主义，是对于历史悲观论和封建史学循环论的反动和批判。同时他又说，中外古今一切思潮，都循着一个轨迹，即佛说一切流转相——生、住、异、灭，递相流转。这就是说，在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间每一个阶段，都要经历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期，终至破坏瓦解而进入下一阶段的启蒙。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前一阶段的反动和升华。这种分段进化，循环

（螺旋式）上升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深刻猜测，基本上符合物质和意识运动的规律，包含了历史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他首先肯定：“佛教二千年来，循进化之公例，常为不断的发展。”^⑤最显著的表现是由小乘发展为大乘。在中国则由当初的粗浅迷信之谈进化为兼有哲学之长的中国佛教；初为散漫无稽、附丽于黄老的异端邪说，渐至开放而成各具特色、有严密组织和系统理论的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之奇葩，而且给儒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还预料。在“物质文明烂熟而精神上之饥饿益不胜其苦痛”的近世，佛教“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而进行宗教改革，将进化为“新佛教”盛行于世。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四期做了如下解释。启蒙是对“极熟而致烂”的旧思潮初起之反动，为生相；全盛是破坏业已告终，新思潮思想内容日臻完善，方法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为住相；蜕分表现为对局部问题“窄而深”的研究，中派小派出焉，新派与传统派成对峙之势，为异相；衰落者，“社会中希附未光者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为灭相。佛教也不例外，它的生发兴衰，同样是在这样进退涨落的变化中实现的。

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一文中，就是把佛学的发展分为四期或三相的。

“一曰输入期，晋南北朝是也”，即他所谓的启蒙期或生相。

“二曰建设期，隋唐是也”，即他所谓的全盛期或住相。

三曰“唐以后殆无佛学”，即其所谓的蜕分、衰落二期或异相、灭相，或按佛教的另一种说法即灭相。

输入期主要是西行求法，传译经论。建设期则为诸宗之成立，“教下三宗”，“鼎立盛行”，“教外别传”，一花五叶。随着佛教的兴盛，“诸经义解，发挥略尽，然诵习愈广，渐陷贫子说金之讥。”继而“禅宗演习天下，诸宗既废，公案如麻，语录充栋，佛法于兹极盛，而佛法即于是就衰矣。”事实上就是，由于禅宗“惟密传心印，取信实难，呵佛骂祖，滋疑犹众”，佛法已经转入蜕分期并开始走向衰亡的道路，即所谓无相。他接着

论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

刘泽华 侯东阳

经过战国中后期诸子对黄帝、神农的宣扬，汉代炎黄观念趋向成熟，并与政治紧密地结合，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了以黄帝为宗的道统与帝统观念，为官方和诸子所认同。汉代黄帝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以黄老宗师的面目出现，又多与符和图讖联系在一起。这两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故推动了汉代诸子炎黄观念的发展和流变。

一、理论上的炎黄观

1. 确认黄帝为帝王之宗

由于等级社会里的贵贱之分和血缘之传，使得人们很注重世系的排列，一些人为使自己的家族显得尊贵，就从古代寻找古帝王作为自己的祖先，于是炎黄世系就在这种寻祖追宗的意识下得到不断地完善。

春秋至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追认炎黄为祖先，

如《国语》中一些诸侯国和夏周，战国陈侯因敦“高祖黄帝，迹嗣桓文”的铭文，则是第一次在实物上得到证实。随着诸侯兼并战争的发展，各民族逐渐融合，要求有一个统一的祖先，以证明天下本一家。《山海经》中把狄、犬、戎、苗等少数民族也列入黄帝的世系。炎帝的世系第一次排列为氏人和南方祝融之祖。世系的统一在《世本·帝系》中得到实现，它不仅把少数民族的祖先寻到黄帝的名下，而且把曾主中原的、相继兴废的几个大的朝代归并为一，黄帝成了夏商周的共同始祖。“所有各地各族各个时代的主要传说人物，都成了黄帝的子孙”。^①它一方面从血缘关系上论证了统一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消融了华夷之别，原来的华夏族与四夷的关系变为兄弟或甥舅（联婚）关系，从而扩大了华夏族的血缘范围，华夏族只是统一后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

说：

禅宗盛行，诸派俱绝，踞座棒喝之人，吾辈实无标准以测其深浅。其外部之原因，则儒者方剽窃佛理自立门户，国中上士，咸趋此途，而僧界益乏才。

梁启超认为，佛教因“发达太过，末流滋弊，故清代学者，对于彼而生剧烈之反动”，佛教衰落之势在所难免。然而“及清学发达太过，末流亦弊，则还元的反动又起。”佛教复活，又属自然。因此，“我国今后之新机运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是也。”^②如此佛教又进入第二阶段的启蒙或生相。

他还认为佛教的发展如川逝水，如茧抽丝，绵延不绝。输入期中有建设，建设期中孕育着蜕分和衰落。他这种法海波澜起伏前进的思想，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但他那基于唯心史观的预言——新佛教的复兴——从根本上忽视了作为观念态的文化或理论对于民族心理和社会政治的满

足程度。他不能预料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将要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不能想像民族心理和社会对于佛教的拒斥和改造，所以他的预言仅给后人留作笑谈而已。

①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理纲要》。

②⑤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③ 《法句经序》、《出三藏记》卷七。

④⑤⑥⑦ 《翻译文学与佛典》。

⑧ 《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

⑨ 《慈恩法师传》卷一。

⑩ 《地理及年代》。

⑪⑫ 《清代学术概论》。

⑬⑭ 《中国佛法之兴衰沿革说略》。

⑮ 《佛教之初输入》。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②

先秦人摒弃了那些远古传说的人物，逐渐选用了后起的、与现实有联系的炎黄二帝，并把黄帝作为帝王之始，反映了其强烈的追祖意识和祖先崇拜的深化。

司马迁作《史记》时，深感难以确认上古传说的真伪，“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故亲自到传说中的地方进行民风考察，并参诸古文，“择其言尤雅者”著《五帝本纪》，把上古至秦汉帝王世系贯穿排列，首列黄帝为帝王第一人，“自黄帝至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直至夏、商、周三代和汉代诸侯、名臣，均附为黄帝后世。但是由于司马迁兼取各家，在追溯帝王祖宗和血缘时，一方面认为夏商周三代始祖是黄帝的后裔，另一方面又为了神化帝王，说他们是禀精气而生的真命天子。当时曾有人对这种矛盾发出疑问，褚先生解释这些感生帝是“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明确地宣称感生说是为了神化他们的祖先，以示他们是天命之子。并且，承认三代始祖为黄帝后裔，是为了表明他们有帝统渊源，因为帝王的资格是由血统论决定的，“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王充在《论衡·案书》中对感生说进行了批判，从贞节观的立场上批评了禀气于天说，同时也承认黄帝血统论，“五帝三王，皆祖黄帝”。

这样古代中国各大朝代和集团的帝王都出自黄帝，黄帝成了帝统之始，这个帝系得到了后代帝王和学者的认同，成为正宗的生产帝王将相的系统。

2. 五德终始与符应中的黄帝

随着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兴起，它逐渐为帝王所接受，秦始皇据邹子五德相胜说，而按水德改服定历，以后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沿袭这种作法。五德相胜之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其历史系统首自黄帝，并且以祥瑞来昭显天命所归。但是五德相胜相克之说显得过分激烈和决绝，而大一统帝国对前代制度的继承性又特别明显，为维护帝统道统的一贯性，也为了把朝代更替说得更合理、温和，帝王们需要新的五德终始说，于是刘歆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五德相生说。本来，汉初刘邦托称赤帝子，眼色上赤。其后曾有一场关于汉为水德或土德的争

辩，武帝最后按土德改制，则汉亦为黄帝之德。而按相生之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刘歆在《世经》中编排的帝王系统为：

五德	帝	王
木	太昊帝炮牺氏	帝喾高辛氏 周武王
火	炎帝神农氏	帝尧陶唐氏 汉高祖
土	黄帝轩辕氏	帝舜有虞氏
金	少昊帝金天氏	伯禹夏后氏
水	颛顼帝高阳氏	成汤

其中有两个牵强之处最为明显，一是把汉按相胜说定的土德又改为火德，二是按相生之说，汉火德与秦水德毫不相连，于是就说秦“非其序”，而把秦排挤出正序之列。至于在黄帝之上又寻出两位更古的帝王炎帝，太昊，则更是为了体系的需要。这个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证明王莽为黄帝、帝舜之后，是土德，则按尧禅位给舜的古史传说，汉禅位给王莽也正是天理之序。正是由于五德相生说把朝代的更换装扮成心甘情愿的禅让，使更天命的场面变得温情脉脉，掩盖了篡权者的阴谋和斗争的激烈，故此学说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并得到学者们的认可。

同时，与五德相伴而生的是受命帝王均有符命、祥瑞之类，因汉武帝喜欢神仙事，故符命之风兴起。王莽更是大加宣扬，“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之子孙，永享无穷之祚”。^③于是最受尊崇的黄帝一会儿出现在符中，一会儿出现在图讖中，很是繁忙。王莽竟按所献黄帝策书来封官改制，以示顺天命，当时人“争为符命封侯”。^④及光武、显宗、肃宗等都善讖，“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附以妖言”。^⑤因此汉代黄帝热是与汉、新争当其子孙和符命祥瑞的兴盛有密切关系。五德终始中的每个帝王都有相应的符命，强调天命的绝对权威。但是这种朝代的排列序数和帝王是为政治需要而制造的，除了炎帝、黄帝之德不可更改外，其它的均可随意编排。

3. 炎黄与三皇五帝

关于炎帝与黄帝的关系，先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炎黄为兄弟说，同出于少典（《国语·晋语》）；一种是先后相继的两个帝王，炎帝在黄

帝前。但因为炎黄曾发生过阪泉之战，炎帝成了战败者，且与黄帝相比，他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德才，人格不是十分鲜明。而对黄帝无论从形象到治术论述得都比较详细，聪慧、仁义，行教化、抚万民，“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⑥因此黄帝的影响历三百年而不衰（在当时）。而先秦人对炎帝较淡薄。他们对黄帝之前的神农倒是非常推崇，*《庄子》*赞神农为至德之人，*《列子·黄帝》*说神农蛇身人面是“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商君书·画策》*描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认为神农之世比黄帝治理得好，但“神农非高于黄帝，然其名尊，以适于时也”，神农与黄帝只不过各据其时而行政治。神农尊于黄帝，这是先秦人公认的。神农又教民耕作，创制了原始农业，因而被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人所尊奉。因为神农的时代与炎帝相似，而五德终始说中的炎帝又需要一个氏姓，于是后代人就吧炎帝、神农合二为一，称炎帝为神农氏，黄帝则与古老的轩辕氏合并，借此抬高他们的尊贵身份。不过，先秦很少把炎帝与神农连在一起的，*《管子》*中还明确地把他们分为两个人，*《世本》*最早称炎帝为神农氏。

先秦诸子已广泛称引三皇五帝三王等，把他们称为理想的帝王象征。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排列其系统。

汉代学者总结先秦思想，又加以自己的主张，列出了不同的三皇、五帝说：

三皇说有：

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白虎通》*正说）

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或说）

伏羲、女媧、神农（*《运斗枢》*、*《元命苞》*）

伏羲、神农、黄帝（*《尚书伪孔传序》*）

五帝说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吕览》*、*《史记》*等）

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易》*、*《庄子》*、*《淮南子》*等）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阴阳五行说》*、*《淮南子》*等）

帝喾、尧、舜、禹、汤（王莽时）

由此可见神农（汉代已明确地称炎帝神农氏）在三皇中是大家公认的，并且他有时也入五帝说，而黄帝为五帝之一也是多数人认可的，只有王莽为尊崇黄帝，把他提升为三皇之一，因为三皇是比五帝更古老的帝王序列，地位独特。

炎黄本比太皞、颛顼、尧、舜、禹等帝王晚出，然而宣传使得他们在诸传说古帝王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赫，成为三皇五帝的主角。

4. 炎黄的圣化与神化

随着帝统的建立和托古改制的兴盛，三皇五帝的政治人格和品性也被神化、圣化。经过先秦诸子对圣人的划分和赞颂，汉代三皇五帝皆为圣人的观念得到了强化，这主要是汉儒的功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皋陶、孔子这十二圣是世所共闻的，他们是“皆上圣也”。而黄帝以前的帝王也补增圣人之号，“义曰：‘伏羲氏没，神农作；神农没，黄帝尧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圣人也。”^⑦对帝王圣化的目的，是把他们说成天生异于凡人的帝王将相之种，“圣人自有种世族”，并以此来推论因黄帝是圣人，所以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是帝王种，“黄帝圣人，本禀贵命，故其子孙皆为帝王”。^⑧黄帝成了圣人和帝王的渊数。

为了把圣人与凡人分开，又对圣人进行神化。“圣人皆有表异”，故十二圣皆有异相，黄帝龙颜、颛顼戴舞、帝喾骈齿、神农蛇身人面等等，这些都是“世所共闻、儒所共说、在经传者”，^⑨而那些飞短流长的俗论更是纷纷纭纭，表明圣人“与神通精”、皆天所生”，^⑩因此圣人同时又有“神”性，“称圣则神矣”。

在对古圣帝王的神化中，尤以对黄帝的神化最为突出。先秦时黄帝所有的品性都被大力渲染，且赋以更多的神性，不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⑪而且有驱使熊虎等动物的特异功能。汉武帝喜欢求神问仙，学者和方士为制造封禅礼，多伪托黄帝，在封禅的七十二王（具体人名则有十二）中，独突出黄帝之事，并附加许多细节，“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⑫黄帝常游五大名山，学仙问道，接万灵于明廷，最后骑龙仙去，空留衣冠冢在人间。武帝听了公孙卿及方士之言，无限羡慕“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⑬结果被方士们哄得团团转。王莽时对黄帝的神化更为突出，甚至达到荒唐的地步。面对天下大乱

的局面，王莽却借黄帝显灵等虚象来“炫耀百姓，销解盗贼”，④遭到天下人嗤笑。

当时，不仅疾虚妄的王充反对黄帝骑龙升天说，而且还有许多学者如桓谭、应劭、扬雄、张衡等人都批评对黄帝荒诞不经的神化，认为神农、黄帝都是血肉之躯，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他们有不同寻常的符命和异相，禀性比较聪慧，却还是有所本，有所学的，“黄帝帝喾。虽有神灵之验，亦皆早成之才也”，⑤因此他们是“殂落而死”，而不是升仙。

反对过分地神化黄帝等人，并不是否定帝王天命观，而是竭力把黄帝论证为实实在在的帝王祖先，因为黄帝升仙说使得他本身的存在变得扑朔迷离，削弱了帝王之宗的真实性。并且通过圣王犹待学问、十一圣人皆有所师，来提示帝王注重自我修养，重视学问之道。

5. 黄帝创制的流变

古人在解释器物的起源时，常把它们归为少数圣人或圣王的创作。传说中的上古人物大多都有制器故事，然而随着神农、黄帝地位和声誉的提高，许多制器故事纷纷归其名下。神农创制虽少，却关系国计民生，故仍为人们所重视，主要是制耒耜，教民耕作，发明琴瑟。而黄帝所创制的器物却多得多，齐思和先生有专文论述，可参考《齐思和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黄帝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是精神文明的创制者。他判天地，分阴阳、四时，数日、历月、计岁，并创制了一套礼乐制度和纲常名教，“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⑥是帝王制度的创始者，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故黄帝“为天下宗”。⑦

由于五德终始说的一套理论的流行，使“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⑧历书和从日月星辰变化来推验人事的星官之书等被帝王们所重视，于是黄帝创历之事又被详细地加以证实，“牺皇之有天下也，未有书计。历载弥久，暨于黄帝，班示文章，……乃立历数”，⑨并传有黄帝历。黄帝创制还有“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⑩“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⑪表现了人们对事物起源的探索和思考，而更主要是托古改制，为当时的各项新制度寻找一个权威靠山。黄帝创制的制度和器物，后代帝王加以继承和发展，自然是正当而合

理的。

二、帝王形象的塑造模式与帝统、道统

1. 帝王形象的塑造模式

为了突出表现帝王们受命于天、异于凡人的资质，从帝王出生、相貌、才能到登极都有许多天命的征兆，形成了一套神化圣化帝王的格式：

(1) 感生说：帝王出生不是禀精气，就是有非常之象，“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见于物，则效于梦矣”。⑫

(2) 异相：帝王有特异之相貌。

(3) 异性：圣王生下来就有超常的智能，“性与人异”，因此“命当为帝”。⑬

(4) 符瑞：天子登帝位前有显德之兆，在位时更有祥瑞“应德而至”，⑭昭示太平。有了上天的保佑，迷信于符瑞的帝王就不太在乎臣民对政治的批判。

(5) 封禅：报天地之功曰封禅。“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⑮封禅不仅是盛世的标志，是对群神的回报，也是刻石立碑、称颂帝王功德的好机会，故为帝王所重视。但因其太过盛大，多数帝王并没有封禅，只派地方官祭祠名山。

这一套模式成了后代帝王登极时所必造的神化、圣化自己的舆论格式（封禅不是必有的），只有按此模式所塑造出的帝王形象，才能得到大家的信服。王充反对虚妄只是反对厚古薄今，为宣扬汉代君主，他所引用的符瑞甚至超过周代，以说明“此则汉德丰茂，故瑞祐多也”。⑯

2. 帝统观的实践

帝统指君主权力的传延，它虽然体现为世代相袭的血统论，然而又超越氏姓，适应于各个朝代的帝王。

血统论主要是针对帝国内部来说的，同姓而王的世袭制自夏代确定下来，周代的宗法制又将君民按金字塔形排列，天子既是君又是全国最大的宗，祭祀先帝成为帝王的一种资格。帝统自此表现为嫡长子继承制。秦始皇欲帝位一至万世地传下去，然二世而亡。汉高祖为确保帝位相传，与群臣相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说明帝王们无不想维持帝王的血缘传延。这种帝统观念是如此强烈，以致于起义者们总是立同姓王，或借其名义而树大旗。它扼杀了民主和新生的力量，使得政治多呈现下滑的趋势。维护帝统的人多认定，自黄帝而下，皆同姓而王；覬覦帝位者

却竭力反对君统说,为自己夺权制造理论,然一旦登上王位,又为帝系问题而大伤脑筋。可见权力是观念的变压器,君统是每个帝王所必定要维持的。

帝统体现在不同朝代则是后代帝王必定尊崇前面的君主,立其后代,使奉祀之,“是故周人之王,尚(上)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称公。”^②“武王追思先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③因为这些帝王有德于民,有功于帝王事业,故“盛德之祚,百世享祀”,^④为他们立祠祀之。对炎黄二帝的祭祀,在重祀与尊祖的上古时已存在,《鲁语》中说有虞氏、夏后氏均禘黄帝。后来则主要把它们放在五帝的范模中祭祀。

3. 道统的总结与认同

道统指的是政治原则的一脉相承,是帝王和诸子百家在对兴衰治乱的政治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道统观到汉代发展成熟,因为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在理论上也需要统一的帝王之道,于是贯穿古今、万殊归流的道统观就应运而生。

在总结历史时,战国以来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三皇五帝的治术各不相同,但伏羲始定人道,神农教民耕作,黄帝始定王道,尧为百王之高峰,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其中“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之和,万世常存”,“后世虽圣,莫能与同也。后世得与天同,亦得称帝,不能立制作之时,故不得复称黄也”。^⑤《淮南子》虽称道术而批评黄帝,却不得不承认黄帝“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的功绩,因此黄帝又成了帝王之道的鼻祖。

但是历史事实是三王之道各有所尚,夏尚忠,殷尚质,周上文。汉武帝为此而问文学贤良,董仲舒以正三统理论,说明帝王之道顺而相复,“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而汉武帝又对道的存在发出疑问:“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则圆说帝王顺时世之变而改制,“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不过他尚能强调道统的主体因素的主观能动性,“孔子曰:人能弘道,顺道弘人”。^⑥盐铁会议上的诸儒进一步把道说成是不变常数,“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

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并且他们完全抹杀了帝王在道统中的能动作用,“《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没而存之,举而贯之,贯而行之,何更为哉?”^⑦帝王只能按道的指示去行事。^⑧这种僵化的道统观对于那些想有所变通的帝王和政治家是个障碍,因此刘向借变法者公孙鞅之口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制礼”,^⑨因事制宜的改制观又成了道统的补充理论。“帝王之道,相因而通”,^⑩“因”即指有所损益而成一代之规。

道统对于学者来说就是百家共同尊奉的理论准则。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的理论各有不同的崇尚,儒家崇尧舜之道,道家尊奉贵老。秦因为“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⑪二世而亡,故汉初统治者适应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一些统治者的倡导和推行,如文帝、景帝及掌朝政的窦太后,大臣曹参、陈平、汲黯等人,使得学习黄老之术蔚然成风,黄帝成为道家祖师。而本不言黄帝的儒家,在黄帝日渐成为帝王之宗以后也开始称引黄帝,它又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等学说,确立了它的独尊地位,使以黄帝为核心的道统理论更加成熟、完备。因为黄帝的形象本是行仁义的,这与儒家的主张正相符合,故黄帝进了儒家之门,更是如鱼得水,汉诸儒多引黄帝为其壮威。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托名黄帝的书有阴阳、道家、小说、天文、杂占、房中、历谱、医经、经方、神仙等诸类,黄帝成了学术权威,“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⑫这也反映了黄帝观从先秦的“杨朱哭于歧路、墨翟悲于练素者”^⑬的纷乱,发展到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统一,这正是学术和政治互相推助的结果。

① 刘起舒《续古史辨》P3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③④⑬⑭⑮⑯ 《汉书·王莽传》。

⑤ 《后汉书·张衡传》。

⑥ 《大戴礼·五帝德》。

⑦⑧ 《白虎通·圣人》。

⑨⑩ 《论衡·奇怪》。

⑪ 《论衡·骨相》。

文学与市场经济

(会议文摘)

党的十四大为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重新认识自身价值和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重大问题。为此,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中国文学会、汕头大学和《汕头特区报》社年初在汕头大学召开了“文学与市场经济”研讨会。由于讨论涉及的问题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刊特此摘要编发会议的部分论文,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杨 嘉:市场经济与文化

提出市场经济,有没有市场文化呢?虽然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苗头(或雏型),例如文化经纪,作品按质论价争取版权权益,以商养文,从事第二职业,等等,但至少还没有明文规定。理由比较明显,经济基础是国力强弱的标志,发展经济,搞活市场,改善生活,都是利害攸关,百无一害。而代表文化的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创作更是个人的精神劳动,如开放市场机制,将会各抒己见,各写所需,各表心臆,各行各素,这就难以控制或规限,容易混淆视听,扰乱思想,对安定团结关系至大。邓小平同志曾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

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对社会科学来说,改革是大势所趋,开放则有待时机。在党的历史上,右可以亡党丧国,“左”的危害最大,教训惨重。所以他又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英明之见,卓越之识,经验之谈。而偏偏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左”的流毒仍远未肃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如稍越雷池,便有“触雷”之险,谁无余悸!数年前在桂林开会时,丁玲同志曾在大会上说过一句话:“任何优秀的球队都会打球出界,为什么对文艺工作

①① 《史记·五帝本纪》。

①②③④ 《史记·封禅书》。

①⑤ 《论衡·实知》。

①⑥ 《商君书·画策》。

①⑦ 《十六经法·立命》。

①⑧②③ 《史记·历书》。

①⑨ 《后汉书·律历志》。

②① 《后汉书·天文志》。

②② 《论衡·吉验》。

②③ 《白虎通·封禅》。

②④ 《论衡·恢国》。

②⑦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②⑧ 《史记·周本纪》。

③⑩ 《白虎通·谥》。

③①③⑤ 《汉书·董仲舒传》。

③② 《盐铁论·遵道》。

③③ 《新序·善谋》。

③④ 《淮南子·修务训》。

③⑦ 《风俗通义·皇霸》。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 峰

稍有差池，便不能宽容呢？”意味深长值得三思。

重理轻文，由来已久，于今亦然。自然科学可以提高科技，发展经济，国富民安。文化艺术往往被视为“雕虫小技”，无关大局，兴不外锦上添花，衰则山回路转，不至于亡。解放前国弱民贫，有人提倡工业救国，但无成效。康梁维新，三民主义，也都未能挽国运于既倾。唯独鲁迅振臂高呼：“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之后，郭沫若、夏衍等前辈，亦弃科从文，以文艺作为武器。这当然是远大的胸怀抱负。但如今弃文从商（经济）的，比比皆是；弃商从文的，则绝无仅有。

空言无补，求人不如责己。为今之计，我窃以为：

首先，处境维艰，而不可丧志。不管条件如何困顿，但必须把各个部门的文学科研工作坚持下去，开阔视野，拓展学科。一位外国名作家曾说：人类有三大进步，即认识文字，认识音符，认识数字。后来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论述了文学、音乐、数学等领域之间存在内在的共同规律，有人誉之为“金三角”。亦即说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姻缘关系，而又落实到文学工作上。历史无情，也最公正。今日寒窗苦读，他日智慧长留。而金钱又安在哉？当一名精神上的富翁，亦足自慰。

其次，是重视立言。作学术研究，切忌停留在就事论事，按文诠释浮言溢美，必须具有个人的创见卓识。敢于碰权威，闯禁区，树新意，超前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诗品》、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以及严羽、王国维、李渔等人的论著，都是着眼于文学创作的研究，各具慧识，文采斐然，至今犹奉为经典。“古人珍视三立”，其中就有“立言”。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立论传世，其名久远，至关宏旨。

再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大潮汹涌，研究评论，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引起波动。我想，其出路仍在于深化改革开放。要求政府额外照顾，恐怕不大可能。但争取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发表和专著的稿酬，放宽出版与发行的限制，贯彻创作自由，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谭志图：文艺面向市场 ——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文艺作品是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与物质产品有显著区别；它是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感染人、教育人、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所以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原则是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当然，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大胆改革文艺体制，更新文艺观念，在内容、形式、风格、手法等方面锐意创新，用艺术精品去赢得读者的喜爱，做到既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他们建设“四化”的热情，满足他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和审美要求，同时又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文艺面向市场，就要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认真研究他们的审美心理。读者、观众有不同的思想文化素质，他们的审美情趣、精神需求有高低、雅俗、文野之分。我们不能一味迎合、俯就部分读者、观众消极、落后的欣赏趣味和欣赏习惯，而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去认真分析研究广大文艺消费者的心理，创作出读者、观众喜闻乐见，又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好作品。我们的作家负有不断引导，提高人们审美水平的责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特别强调“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大众审美水平提高了，反过来就会对艺术生产提出更高的要求，促进文艺创作的发展。

文艺面向市场，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文艺创作就要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我们既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又要充分肯定文艺多方面、多层次的价值功能；既要强调文艺作品“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又不能要求一切文艺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切爱国主义的，有利于促进人们积极向上，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满足人们多方面精神需求，“有益无害”的作品，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充分肯定其价值。在对这些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任何简单、片面的做法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杨鼎川：商品经济大潮中 文学的出路

王朔及王朔现象的意义，首先不在于他的作

品畅销及作家本人由此致富成为作家中的“大款”，而在于他和“海马影视创作集体”那班朋友作为大陆文学创作市场化的先行者，敢于提出对自己的作品实行“优质优价、优质议价”，并开了聘请经纪人管理稿费版权事务之先例，从而证明了文学作品也是商品，是人们精神消费的对象。

通俗文学比严肃文学销路畅，容易出版且能赚钱，这是它的优势。但为了赚更多的钱，通俗文学的“俗”也容易变成媚俗、庸俗乃至恶俗。这并非现时才有的问题。沈从文40年代便一再批评过文学的堕落，说如果作品成为商品，“投资者当然即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同时“作家努力用心都不免用在作品以外，长于此者拙于彼，因此一来，作者的文字技巧与人事知识，当然都成为问题了”，“这种人的成功，一部文学作品便重新回到‘礼拜六’派的作用上去，成为杂耍，成为消遣品”。^①

如果文学完全沦为“杂耍”，那的确是文学的耻辱与悲哀。但通俗文学也不一定品位低下，俗不可耐。《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曾是地地道道的通俗文学，后来却成了古典文学的经典；克利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阿瑟·黑利的系列社会小说，金庸和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都是畅销通俗小说，但都自有它们的价值（包括文学价值）。当代大陆作家刘绍棠、冯骥才等人也作过以通俗形式表现严肃内容的成功尝试。可见，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使之多具有一点真善美的内涵，并不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总是先有了文学作品而后才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文学高雅时，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方能高雅。现在文学在经济面前显得如此寒酸，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还能飘浮于半空而不想脚踏一点实地么？上海到底是上海，那里不仅有了若干专写新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通俗作家，还有不少通俗文学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出版了《武侠小说的怪才》等研究专著。在海外，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与研究《金瓶梅》之“金学”同名。通俗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做得好，对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和层次是大有好处的。

^① 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

魏中林：市场中的文学与文学的市场

下列原因决定了文学的商品性。

1. 从劳动价值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同其它物质产品相同，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和使用价值的统一；2. 从消费角度看，大多数作家创作作品都不是供自己消费，而是满足别人的需要。即使是“自我实现”，也是在消费的对象化中得到确证；3. 作品无论创作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是被用来交换其它物质产品，文学是大多数作家的谋生手段；4. 从流通角度看，作品价值的实现，必须经过商品交换的形式。以上几方面决定了文学的商品属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学的商品性被长期淡化了。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格局中，文学商品性的强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文学创作者具有自己的艺术使命和艺术追求，而市场选择往往以生存危机来使文学创作者放弃其使命和追求，从而造成创作主体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

因此，扩展和强化文学的市场，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1. 文学的市场首先表现在文学的消费结构。如果以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作为两极标志的话，其受众依次递减。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并存的创作格局，以适应不同层面的需要。2. 扩展文学的市场，应当重新调整以往以教为首的文学功能观，建立以审美娱乐为首，认识、教育寓于审美娱乐的功能结构观。不同层次的文学消费者对审美娱乐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俗媚众；3. 在市场经济中强调文学艺术家的艺术信念，对巩固文学的市场至关重要。因为，与商品的价值实现不同的是，文学艺术价值的实现往往不是表现为一次性消费，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刘伟林：如何看待作为商品的文学

商品价值规律在物质领域里发挥作用，表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物质交换。艺术价值规律发生在精神领域里，表现为作家、艺术家与读者、观众的心灵的交会与共鸣。文学作品是精神领域中的高层次产品，有其特殊属性，不应完全以商品流通的价值规律来看待和要求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的文学。文艺作品，作为艺术品，它具有审美价值或称艺术价值；作为商品，则具有商业价值，或称交换价值。艺术消费是一个长过程，文学的商品价值和审美价值应该是统一的。

人们往往认为,只有“纯文学”才有较高审美价值,才能流传于世,而“俗文学”是普及的,没有什么审美价值,或称审美价值不高,不能存之久远。这种观点,是没有看到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客体性,没有看到在艺术市场中艺术消费者(接受者)的地位,而只凭少数人的喜恶妄断。其实所谓“纯文学”是否有真正的审美价值,还很值得推究。正如列宁所说:“对于人口以百万计的广大居民来说,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或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坚持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商品价值统一的观点,使作家的眼光投向广大消费者,将有利于促使作家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思维的改变和更新。把文学作品推向市场,使他们在市场调节中进行公平竞争,也将有利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贯彻,有利于作品为广大消费者所掌握,从而在提高其商品价值的同时,也能真正实现和提高其审美价值。

当然,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的投入、产出、流通、消费的全过程,都具有与物质产品不同的特点。它应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它的消费是一种精神消费;它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人的思想、道德、情操,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等等。所以,艺术消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艺术消费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用消费者预想不到的强烈情感摄服他们的心。这种艺术价值就不是用一般的商品流通价格所能衡量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研究作为商品的文学艺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但是,现在首先要承认和研究它作为商品的普遍性,研究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消费和流通,而不能只强调其特殊性,将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学创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变革和繁荣。

黄泽才:文艺如何进入市场经济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市场经济的确立,文艺社会功能也会发生位移,强化作品的认识教育功能逐渐让位于在作品中自然显现其蕴含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人为地推行某一类作品让位于消费者对作品的自我选择,文艺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和情感的渲泄功能日益引人注意。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需求和文艺创作的现实结合

起来观照,我们认为,要使文艺走出低谷,就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意向,在市场供需的调节下,使文艺的特性得到充分发挥。

文艺作为第三产业进入市场,就必须把立足点建立在社会的需求上,根据不同的消费对象提供多品种、多样式和多档次的文艺产品,繁荣文艺创作,搞活文艺市场。市场的需求必然会要求在创作思想和题材内容上更进一步开放,用文艺的独特视角透视人生,不断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市场的需求也将会促使人们在现有文艺团体和文艺人才的基础上,组建艺术生产集团,以灵活的管理与文学家、艺术家以及演出人员联系,以市场需求为杠杆,协调各门类艺术的发展。在致力于艺术自身生产的同时,文艺还要与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合作,调动社会力量办文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文艺进入市场经济不是文艺的终极目标,而是文艺适应现代中国的改革需要,为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所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在历史选择面前,文艺既要投入到市场经济中,又要在理性上超越市场经济。投入是为了用经济手段和法的权威性使文艺充满发展的活力,在满足人们文艺需求的基础上,引导文艺消费向更高更美的方向发展。超越是把文艺在全面介入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社会需求的走向,与文艺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作冷静的理性思考,积极主动地把握文艺的发展。因为优秀文艺的价值和文艺自身的发展并非完全取决于市场,所以我们要清醒地把握好文艺的投入与文艺的超越两者的关系。

黄树红:诗人应有文学的市场意识

从接受美学的理论看,诗歌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就是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只有在被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和完成。因此,诗人必须争取更多的读者。读者越多,其诗作价值的表现机会就越大。要争取读者,就要了解读者的需求。近几年,为什么会接连出现“席慕蓉热”、“汪国真热”、“洛湃热”呢?就是因为诗人们掌握了读者的需求。正当一部分青少年由于外部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淡化

和内部自我意识的强化,由于商品经济浪潮对社会心理的巨大冲击所带来的迷惘,使他们在爱情、理想、求学、就业等问题上陷入种种矛盾、痛苦、压力和精神空虚时,席慕容以纯情、柔美、温馨而略带感伤的诗句,满足了他们对理想化爱情的梦幻和追求;汪国真以清新、甜美、真诚而具有哲理的小诗,解答了他们在刚踏上人生道路时所常碰到的各种问题和疑难;洛湃则以敢于扔下铁饭碗的“浪子”形象,为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感到迷惘、忧虑而又挣扎奋斗的青少年,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和生活模式。不仅如此,这些诗人还从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和审美心理的需求上考虑,把诗写得大众化,既明朗畅达,通俗易懂,意象单纯,结构清晰,句子简短;又注重一定的内涵,以及意境和音韵之美。这三股诗热的原因,是很值得我们诗人深思的。如何及时把握读者的心理特点、精神需求、社会心态,以及文化水准、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审美习惯,是我们争取读者,实现作品价值的必要前提。尤其是面对商品大潮已将诗歌推向市场的现实,我们的诗人更应该关注文学市场,把握文学市场的审美信息,有文学的市场意识。

作品虽然是商品,诗人的创作思维却不会“商品化”。诗人要努力从市场中观照自身。要在把握住文学最富于个性特征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特点去开辟自己的市场。象这三位诗人,他们都面向青少年,但他们都各有各的特色和风格。他们的诗作并不雷同,也不模式化。(我当然不是肯定他们诗歌的一切)。

何楚雄:文学的永久价值 离不开时代精神

在我国,明确表示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白居易之《秦中吟》、《乐府诗》等名篇已流传千古,至今仍有其魅力而显现了“永久的价值”;杜甫的“三吏”“三别”,关汉卿之《窦娥冤》、《风月救风尘》、《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绝对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人间喜剧》就是巴尔扎克那个时代杰出的法国史诗。别林斯基则说:“普希金所以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俄国来说真正是时代的儿子,他同他的祖国齐头并进,他是祖国时代精神生活发展的代表”。列夫·托尔斯泰的“永久价值”也恰恰在于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是他作品之所以具有“永

久价值”的说明。美国诗人奥登(W·H·Auden 1907—1973)认为,“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他的困惑,亦即现代人的困惑”。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也正因为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条件和由此而产生的特定的时代精神。

如果承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承认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就应看到文学表现其时代越深刻越广泛,才愈有可能具有“永久的价值”。其实,历史流程中的现实与其历史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现实不断地转换为历史,而历史又必然渗透到现实当中。任何现在,都是过去的现在,完全不包涵历史的现在是不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都必然以前人创造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文化为前提。要求作品要有历史的深度是一种巨著意识。但应看到,作家唯有在现实生活之中,在同时代人们的生活之中去获得丰富的感性材料,才能对历史有自己时代的独特感受。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具有历史性的厚度,达到现实性与历史性统一的高度。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时代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健康和丰富;在我国当代则是否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的进行,是否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是否有利于人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利于人们现代审美意识的建构,而不是相反。作品的“永久价值”不是当代人封的,而是要经历史淘洗的。正如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的,“真正的文学和菩提花一样。常常需要一个时间和距离,来检验和评价文学的力量和它的完美的度程,来领会它的气息和永不凋零的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深刻认识深切体验,表现了时代精神的作品,就很有可能具有“永久的价值”。

柯汉林:文学的精神生产 方式

精神生产作为“生产的特殊方式”,有自己的特征:

第一,精神生产是在观念领域中观念地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精神生产是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念性活动、不改变自然的存在形式的生产,它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始终是在观念领域中进行的。无论是科学著作所描述的宇宙图景或是文学

作品所描绘的人生境遇，都不过是一种观念的“构型”。

第二，精神生产是一种符号活动。物质生产凭借的手段是工具，精神生产凭借的手段却是符号。从原始人创造的图腾、洞穴绘画、纹身装饰到十字架、卍字饰和各种艺术语言，其功能始终只是表象征征。物质世界的改造必须借助于物质的力量，而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符号活动，创造意象世界（意象实际上就是借助符号表象征征）。

第三，精神生产是一种富于个性的自由生产。精神生产始终保持着“精神的自律”，主要表现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因而它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一种“真正自由的劳动”。精神生产的自由尽管始终受到物质的纠缠，“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同时也受到历史和现实的限制。但精神生产特别是艺术也仍然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域，精神生产的成果特别是艺术生产的成果总富于个性特征和个体风格。文学生产是精神生产的“特殊方式”，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

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掌握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的方式，即主要通过情感体验和感性直观去把握世界的美。文学艺术主要诉之于情感以及想象、幻想，其中情感是核心；科学活动中也有情感、想象和幻想，但绝对服从于理性；文学艺术活动中包含着认识，但认识溶化于情感之中。从掌握现实的思维材料看，科学主要运用概念、范畴，文学艺术主要借助于表象知识，因此，科学的思维形式主要是概念思维，文学艺术的思维形式主要是形象（表象）思维，科学是推理的，文学艺术是直观的。从追求目的看，科学总是力图穿越表面现象而追寻事物的内在规律，让人获得某种真理知识；文学艺术总是专注于现象的直接外观，让人欣赏它的全部丰富性，给人以美的享受；科学虽然也追求美与善，但真是根本；文学艺术也追求真与善，但它要求真善通过美来体现。从活动成果来看，科学是智力的物化形态，文学艺术是审美情感的结晶，是美的形态；科学是概念体系，文学艺术是形象体系。

罗可群：文学与广告不可联姻

文学走进广告，使广告变得更为多姿多采。它艺术地传递商品信息，在推销商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

不看到，有些广告颠倒了主次，广告的文学性使人欣赏了文学而忘记了商品，而厂家毫无得益。而有些庸俗的广告，则玷污了文学作品，损害了文学形象，使人大倒胃口。

目前，由于不少企业不惜重金制作广告，也特别看重文人的笔。因此，有好些人也就开始热衷于广告词的写作。然而，成功的却不多。这是因为广告就是广告，广告并不等于文学。有资料证明，获得诺贝尔奖的海明威、著名的英国文豪肖伯纳都曾试写过广告，但他们都失败了。大手笔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作家呢？

认真研究广告词的写作，提高广告文案的品味，看来应该是广告人的责任，这责任是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

隗芾：广场戏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戏剧形式

中国戏曲形成有上千年历史了。它的生命力是从广场、野台戏锻炼出来的。宫廷、富家也养戏班，但那是把社会上已经成熟之果攫取进宫罢了。慈禧就曾把伶俐的太监召在一起，训练他们演戏，结果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请野台班进宫。所以，从戏曲本身的发展要求来看，广场戏正是让戏曲恢复青春的再生之地，农民观众是戏曲的衣食父母，而不是“送戏下乡”的慰问对象。

广场戏的剧场，多设在农村中最重要的社交地带。很多人是要利用看戏的机会，与亲戚、朋友、邻里见面，既免去往来的寒暄和手信（礼物），又可交流信息，商谈业务，还可以满足人们自我展示的欲望以及恋爱约会，品尝食品等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广场戏实为农村经贸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忠诚的伴侣。

广场戏常常是民俗活动的重要载体和项目。它能满足人们希望和平、安定、繁华、富强的愿望。潮汕农村的广场戏往往以家族为单位集体观赏，在长辈的带领下，是一次带有礼仪性的活动。在热闹中到处充满着礼仪、祥和。不仅打架斗殴、赌博流氓活动没有市场，连台上的内容也都是正儿八经的忠孝节义，容不得一点淫荡黄色的内容。

在广场戏演出中，更多碰到的是民众希图吉利而希望剧团协助的一些活动。比如潮剧中的“送太子”，就是要求剧团把演戏中的道具人偶，恭敬地护送到某族祠堂或家中，戏演完后还给剧

团。这是源于人们对戏剧活动的尊崇，他们希望借某个“载体”将戏中大富大贵的灵气，带给自己的家族。这种情况下，所送的“太子”与奥运会的吉祥物其实作用是一样的。

中国的传统戏曲是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在传统戏曲演出中，群众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戏曲进入城市剧场后，割断了这种联系。恢复广场戏后，我们要更加珍视这种联系，只要能满足群众善良愿望的就应该给以支持。这样群众才能把戏曲看成是自己的艺术，戏曲也才能永葆青春，避免枯死的厄运。

当然，广场戏艺术质量的提高，和如何提高观众趣味和审美能力，是广场戏急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各地在实践中更多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广场戏能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繁荣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的新文艺。

陈新伟：要注意研究戏剧消长与经济的关系

在全国范围内，每年都有几个剧种从舞台消失。对此，似乎尚未觅到救治的良方。

前几年，在票房价值大幅度滑坡之际，理论界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乐观者认为这是处于两大高潮之间的低潮，戏剧界应当处变不惊，努力搞好自身建设，以迎接第二个高潮的到来。另一种看法是，面对诸如塑料等新兴工业的挑战，西方的钢铁工业日渐萎缩，被称为“夕阳工业”。论者以为，传统戏曲在遭受新兴艺术样式的冲击，也落于“夕阳艺术”的境地，但绚丽多姿的晚霞却仍是百看不厌的，戏剧圈内的智勇者，还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艺术样式的消长，在发展极缓慢的中国封建社会就已存在。参军戏起于汉之俳优，盛于唐宋，后来终于销声匿迹。可是它居然在千年之后以相声的方式竟放异彩。起于宋金对峙时期的诸宫调，盛于南宋、元、明初，可是到了明末清初，许多人已不识其为何物。元代的杂剧叱咤风云，可是只有百余年的时光，就不得不让位于原先没有一个书会才人去培植、浇灌的南戏。明后期有好奇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排演杂剧，却由于知音极稀而成绝响。清代前期，若要把原本《西厢记》搬

上舞台，就得求助于昆腔了。自魏良辅创昆腔之后，弋阳、余姚、海盐诸腔，有的融入其他，有的慢慢消歇。如此种种，古今学者从文学、戏剧、音乐的角度论析者多矣，可是从经济的角度加以描述的，尚付阙如。

当今世界，不管是什么主义、流派的戏剧，无不遭到其它艺术形式的冲击而命运维艰。如何夺回市场、培养观众，尚需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笔者希望，文学史家、戏剧史家、音乐史家治史时也能够撷拾某剧种的生长消亡与经济有关的零星资料，并进行综合研究。通过研究中外戏剧发展与经济的关系，拿出对策，让更多的剧种得以保存下来。

罗斯宁：当代流行歌曲可从宋词中借鉴些什么

宋词产生于城市经济繁荣的宋代，多为娱宾遣兴、“析醒解愠”而作；而当代流行歌曲中占优势的通俗歌曲，也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音乐茶座，也是为娱乐身心。宋之歌女唱曲可得“蜀锦缠头无数”，今之歌星出场动辄千元万元，都带有强烈的商业性。柳永词为歌女“旋叠香笺，要索新词”，当代观众的好恶也决定着“金曲大碟”的发行数量。这几个特点使宋词专以贴近平民百姓的爱情、离情为主要题材，以委婉细腻地抒情为主要手法；当代流行歌曲也多写平凡人的感情生活，以爱情为主题，歌词多采取细语般的宣叙体，演唱多用自然嗓音，和观众距离十分贴近。

中国文学向来有雅、俗之分，更有将雅与俗取长补短，加以融和，而达到雅俗共赏的。晏殊词被称为“闲雅有情思”，晏几道词被称为“狎邪之大雅”，走的是语词文雅一路。柳永既有通俗明快的佳作，也有格调低下之作。然而，柳词虽然受到晏殊、李清照等人讥评，当时依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后期词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雅俗融和，李清照的词便如柳词一样喜用市井俗语，但又抛弃了“词语尘下”庸俗的格调，而取晏殊词“闲雅有情思”的长处，为文士所激赏，又为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而当南宋吴文英等人追求雅正，写出非查典故不知所云的词句来的时候，百姓就敬而远之，词也就逐渐走向衰落了。流行歌曲要能流行，当然要以俗词为主，

但口语也应是艺术的语言，或给人以美感，或蕴含着深意。

词是在接受以西北少数民族音乐为主、包括天竺等外国音乐的“燕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词并没有因此变成少数民族诗歌，宋词还吸取民歌而加以创作，又根植在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土壤上。当今的流行歌曲也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近年来，一批大陆词曲家陆续崛起，有些将古典文学和现代意识相结合，所作歌词大受欣赏，这是新诗发展的一个方向；还有些把爵士乐、摇滚乐与中国的民族音乐相结合，写出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风格的新作，使流行歌曲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宋词的发展中，词人的创作始终起主导作用，演员的作用还在其次。《全宋词》载有词人1300多人，多为文士。有位居高官的晏殊、欧阳修，也有柳永、姜夔等专职词人。这样一支数量多、素质高的词人队伍，是使宋词鼎盛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流行歌坛，盛行“歌星效应”，本为二度创作的歌星表演压倒了一度创作的词曲家。什么时候人们给名歌名句赋予“张三影”、“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那样的美称，什么时候人们谈论词曲家象谈论红歌星那样津津乐道，那就是流行歌曲的真正鼎盛之时。

吴锦润：近代报刊市场与小说创作的关系

我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不断加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报刊市场也逐步发展起来。报刊是文化商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发生联系。小说创作仅仅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是报刊必备的内容，所以，近代小说并没有伴同着近代报刊市场的产生而产生，而是到了小说专刊出现时，小说创作才空前繁荣起来。

近代我国报刊市场的发展可分为预备期、早期、中期和晚期。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新加坡出版了中文期刊《世俗每月统纪传》，此后四十年，我国的中文报纸，大体上都是外国传教士由帝国主义商人资助出版的。在这段预备期，报刊内容和我国社会生活并未发生直接联系。早期从1858年国人伍廷芳于香港创办《中外新报》至19世纪末，报刊逐渐增多，从1860年的七十多家，

到1890年增加了一倍。这一时期的报刊，主要介绍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并刊登商业活动信息和政论等。其中偶尔刊登一些翻译小说和传记。近代66种文艺报纸，上世纪末的四年出版仅十种；近代132种文艺杂志，上世纪出版仅五种（见于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争鸣》）。此十五种报刊中，《瀛寰琐记》最早，1872年创刊，并连载第一部翻译的长篇小说《听夕闲谈》，其余诸种文艺杂志均以诗词曲赋散文入编，与创作小说无缘。在上一世纪的报刊上，并未出现具有近代色彩和有影响力的创作小说。清末最后十年为中期，古典通俗小说创作出现了最后的也是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实起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第二期移回上海广智书局）。仅于此期创办的带有“小说”二字的文艺杂志就达二十多种。此期创作的数量，约占现存古典小说1100余种的一半。最后十年产生的古典小说超过了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后期由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小说完全走向通俗化、市民化，写情的鸳鸯蝴蝶小说，叙史的历史小说和侠义小说等，风起云涌地走向社会各个角落。刊载这些小说和其他通俗文艺的文艺报刊又超过了中期。

由此看来，小说创作一旦实现商品化，并通过报刊市场走向流通领域，小说创作就可繁荣起来。而另一方面，由于近代报刊市场发展不完全，作者大多是失意文人中翻然思改的“有识者”，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却未能贴近和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因此，近代小说创作亦受到报刊市场的制约，未能产生经典式的小说名著。

王剑丛：市场经济下的香港文学

70年代开始，港英当局实行以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为主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使香港迅速成为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工商业城市。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香港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使之一切都商品化。香港文学的商品化，主要表现为通俗化倾向，一是严肃文学通俗化，二是通俗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

目前香港的通俗文学主要有四大品种：

一是新武侠小说，主要作者有金庸、梁羽

生、温瑞安等。

二是科幻小说，代表作家是倪匡。

三是言情小说，作者较多，著名的女作家有亦舒、严沁、林燕妮、西茜凤、岑凯伦等。言情小说从不同层面和视点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人生百态。

四是框框杂文，形式上有点象鲁迅的“花边文学”。框框杂文是香港文坛的一大奇观，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它最繁荣。香港五六十家报纸，都在不同版面上有四五十个专栏，这类文字每天的总字数相当于一部《三国演义》。它栏目千奇百怪，其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每篇杂文六七百字，超短型的只有二百来字。在车站、码头、酒楼、餐厅用点滴时间便可阅读，即看即弃。有人称它为“快餐文学”。

香港通俗文学发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在紧张工作与劳动之余需要松弛、消遣、娱乐、嬉戏。通俗文学以它的轻松、有趣、刺激适应了这种需要。因竞争激烈，人们需要大量信息性、服务性的东西，框框杂文正好提供了这种方便。严肃文学在香港的生存与发展却十分困难，发表园地不多，出版商也不重视。大部分严肃文学作家，为了生活而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有的作家一手写严肃文学，一手写通俗文学（如刘以鬯）；有部份作家在作品中注入通俗性的审美特征，使严肃文学通俗化。这里包含着两种认识，一是鄙弃通俗性的，但为了提高销售量，不得不如此；一是认为雅俗结合吻合大众的欣赏习惯，是艺术追求的高境界。这两类作家较为引人瞩目的有舒巷城、海辛、陈浩泉、东瑞、梁凤仪等等。

香港文坛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多元化文学局面，作品的品种和流派繁多。但是这种多元化局面还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作品的“质”还不高。显然的事例是，香港的工商业经济十分发达，财经战线上的斗争异常激烈，内地文艺界前辈曾殷切期望香港的《子夜》出现，然而，香港的《子夜》始终没有出现。

李以庄：香港畅销小说家 梁凤仪的卖点

梁凤仪自称她写小说是从她的博士论文《晚清小说的思想传播功能》得到提示的。她认为，从文学角度看，晚清小说多因文字粗陋、结构松散而不获好评；但从历史角度看，却有保存与参考的价值。由此，她想到要“用文字把香港九七以前的种种情状都写进一个现代都会的小说内”，希望除提供“有可读性的书本外”，更“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另一方面，她的小说与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与优秀通俗小说有同样的宗旨，即劝善惩恶。她的小说男女主人公都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还有就是励志的特点。她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强人，在绝境、逆境中挣扎、拼搏；从最低层直登成功顶峰。他（她）们的顽强、勤奋、拼搏，对读者有激励作用。

正因为有这样的优点，她的小说在市场定位于“高档通俗文学”。

在战术上，她的小说自有吸引读者的卖点。首先，最具有魅力的是传奇性。其男女主人公的经历坎坷曲折，惊险离奇；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多巧合而出人意表。但奇怪的是，人们却都觉得她的小说真实，因为她的作品大的框架虽然戏剧化，但其间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其次，她的小说文字简洁，不尚描绘，却极善于通过造型细节，表现人物强烈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使读者如见如闻。现代人耳濡目染的均是视听文化，小说的这一特点很对现代读者的胃口。其三，她的小说均取材于当代香港人的生活，举凡香港社会的热门话题，都与人物命运及小说情节紧密联系，令读者有代入感。其四，她的小说名为“财经小说”，写的是现代国际大都会里商场的故事。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神州的今天，梁凤仪的小说具有揭示商场众生相及传播财经知识的功能。其五，她的小说节奏明快，信息量大，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好的卖家，处处体贴买家的需要，这是她的作品在商业上成功之要。此外，她的市场推广术，亦应记一大功。

（本专栏责任编辑：陶原珂）

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

钦 鸿

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有着悠久而密切的联系。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在20至40年代,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休戚相关的。一方面,中国有大批作家曾先后赴马来亚半岛,投身马华文学运动,特别是有许多知名作家,如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杨骚、许杰、陈残云、秦牧、高云览等,为马华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作过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马华文坛也有众多作家后来回到中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和文学运动,象杜运燮、萧村、韩萌、米军、王啸平、马阳等,都是著名的马华归侨作家;另据方修先生《马华新文学史稿》记载,当时在马华文坛活跃一时的黄征夫、张楚云、李梅子、殷枝阳等人,以后也都返回中国。这两方面因素,构成了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奠定了中马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厚实基础。

一、“五四”以后中国大陆对马华社会以及马华文学的关注与研究

中国文坛对马华社会以及马华文学,历来是非常关注的。随着大批中国人背井离乡,赴南洋开辟新的生路,文人们也把注意力投向南洋社会。

首先是介绍南洋的山水名胜、自然风貌。这方面的作品早在20、30年代,就发表过不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艺周刊《小说世界》曾发表过张屏翰写的《南游杂记》,与此相配合,该刊还登载了《槟榔屿升旗山风景》、《槟榔屿极乐寺前之新路》、《槟榔屿蛇庙前风景》、《南洋槟榔屿之山顶铁道》等多幅照片。可见当时就有一些文人把自己游历南洋的见闻形诸文字介绍给中国读者了。

其次是反映南洋社会的生活和斗争。作家们置身于南洋社会的具体环境,不仅亲眼目睹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还参与了实际斗争,所以很自然地将这些内容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林万菁先生在《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中,例举过一些作家的作品。例如老舍《小坡的生日》、艾芜《海》、洪灵菲《流亡》、吴进(杜运燮)《热带风光》等作品,都对马来亚社会有所描写。林万菁先生上述书中介绍了杨骚1941年到新加坡参加抗战的一些活动,其实早在1925年,他就到过新加坡。两年多后,他返回上海,便在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发表了诗歌和剧本,大多以马来亚社会的人民生活为内容。其中独幕剧《Yellow》和《新街》便分别揭示了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反映了作家对他曾经生活其间的马来亚社会的体察和认识。

第三是发表马华作家写的作品。“五四”以后，中国作家赴南洋，在马华报刊发表作品的为数不少，而马华作家在中国发表或出版作品的却不多见。唯有1936年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在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个突出的事件。这部小说被纳入“文学丛书”，与茅盾的短篇小说集《泡沫》、胡风的评论集《文艺笔谈》等书同列，足见其非同寻常。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中指出：“马华文艺向来是遭人歧视、看轻，一些正人君子之流一直咬定马华只有在报屁股投稿资格的‘作者’，没有什么‘作家’，《浓烟》的出版，是对这些人的一个有力的答复，同时给马华文艺争回一口气，让马华文艺写作人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浓烟》在上海出版，正反映出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的肯定与重视。另外，林参天还在1936年6月上海出版的《鲁迅风》月刊第十六期上，发表过一篇《希腊人》，这篇作品后来收入他的小说集《余哀》中。

第四是评论马华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由于海天遥隔，交流不多，中国文坛较少看到马华作家的作品，因此，当时对马华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颇为罕见。但是一些前赴南洋的中国作家，由于直接置身于马华文学界，有较多感性认识，所以对马华文学作品还是有所评论的。最突出的一例是郁达夫对诗人冯蕉衣的评论。冯因贫病辞世后，郁达夫在《悼诗人冯蕉衣》一文中评论道：“他的诗，富于热情，不过修辞似乎太过于堆砌。”并且指出，他的英年早逝“是直接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地承受了敌人的侵略而致有此结果的死”。郁达夫在为《冯蕉衣遗诗》作序时又进一步指出：“冯蕉衣是一位生来的抒情诗人，因为他的才气，他的倾向，他的性情，都是适宜于写抒情小诗的。但他并不是一位大诗人，……并不是一位革命诗人。”

第五是对马华文学运动进行评论。抗战时期在南洋的中国作家，大多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象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杨骚等，都是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领导人员。当时他们对马华文学的关注，主要还是在如何开展马华文学运动，更密切地为抗日救亡斗争服务上。他们所写的文章，大多是鼓吹性的、动员性的宣传文章，例如杨骚《以纸弹配合子弹——对反侵略文学口号提出一点意见》、王任叔《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郁达夫《略谈抗战八股》等文，都称不上研究文章。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运动真正具有探讨性、研究性的文章，大致见于1947年开始的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以及“侨民文艺”的大论争中。这场论争，实际上是对马华文学的性质、任务以及与中国文学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它是马华文学运动中不同文学思想的碰撞，具有相当的理论学术的价值。当时在南洋的许多中国作家，例如沙平（胡愈之）、李玄（杨嘉）、洪丝丝等都撰文参加了论争。在香港的郭沫若和夏衍，也分别写文章发表了意见。郭沫若写了《关于马华化问题》、《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两文，夏衍的文章是《马华文艺试论》。这些文章，可以看作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的一次比较集中、比较全面的评论。

二、近年来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意识的迥异，中国大陆文坛与马华文学基本上处于互相

隔绝的状态，大陆读者无从接触马华作家及其作品，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研究。唯有台湾和香港文坛与马华文坛仍有颇多联系，许多马华文学作品或见载于台港的报刊杂志，或获得出版，并得到评论界的评论。我熟悉的不少新马作家，如秦林、梦平、张逸萍、朵拉、潘雨桐等，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都曾受到港台文学界的奖掖和评论。

大陆文坛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与马华文学取得联系与沟通。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文学逐渐打破了多年来的封闭状态，开始广泛地与世界各国的文学界进行交流。过去一直在中国文学研究界视野以外的马华文学，这时才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大陆文坛最先注意马华文学问题，可能是1980年唐弢先生和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该书在论及1947年香港文学界的活动时，指出“当时还开展了‘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虽然仅有这一句话，并且只是提到香港报刊上的有关讨论，但在该书以前，从来没有一本文学史或研究专著论及马华文学，因此，可以说，它是解放后中国大陆文坛关注马华文学研究的先声，它为日后马华文学研究普遍开展与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到今天，已有十余年。马华文学研究在目前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星星之火，而是红光映天，并且还有燎原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研究队伍从小到大，逐步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研究界开始拓宽视野，注意到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先是台湾、香港文学，很快扩展到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目前更是将美华、日华、加华、澳华乃至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其中，除了台港文学外，大陆文坛比较重视的还是马华文学（与独立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

考察大陆学术界从事马华文学研究的队伍，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展。由于地理上的优势，以及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起初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广州、汕头、海口一带，以后，又逐步延伸到厦门、福州、上海、南京、南通、北京等地；现在又进一步扩展到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内蒙古、新疆等省区。这说明了马华文学的价值已越来越被中国学术界所认识，中马文化交流日趋深化。

二是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不断涌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涉及马华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是散兵游勇，有的虽然执教于大学中文系，或者在研究单位任职，但是往往是在其他内容的教学或研究之余才涉猎这一领域，凭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然也谈不上系统的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外华文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相继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例如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设立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暨南大学和汕头大学分别建有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则成立了华夏文化交流中心；上海复旦大学有台港文化研究所（兼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江苏省社科院有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最近，武汉中南

财经大学也宣布成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学术团体方面，广东、福建、安徽、南京等省市先后成立了专门性的研究学会，1990年，在北京还成立了以著名诗人艾青为会长的中华全国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此外，一些大学还将包括马华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引入课堂讲授的范围。

三是出现了一大批老中青研究者，显示出一派生机。在中国文坛从事海外华文文学（包括马华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经直接参加过马华文学运动的归侨作家，如秦牧、杨越、萧村、米军、韩萌、丁家瑞、杜运燮等老一辈作家。他们对马华文学既有浓厚的感情，又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很高，或为之热烈呼吁、鸣锣开道，或不遗余力地支持中青年学者的工作，有的还亲自动手，写了许多研究文章，他们的活动，对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开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年学者如李元洛、潘亚暾、陈贤茂、赖伯疆、陈实、吴中杰、胡凌芝、翁光宇、王振科等，都是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他们大都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湛的学术素养，并且长期从事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们的研究无论在理论的探索上，或是在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分析上，都有一定的建树。青年一代的研究者邵德怀、吴奕琦等人，虽然阅历不深，但思维敏捷，出手不凡，他们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其次，马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发表园地正由少到多，全面铺开。研究马华文学，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是要读到马华文学作品。考察马华文学研究情况，自然不能忽略马华文学作品及其评论、研究文章的发表园地。中国大陆自80年代初起，开始有个别刊物发表马华文学作品，如福建文联主办的《台港文学选刊》、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但其中发表的马华文学作品只占很小的比重。以后，随着形势发展，不仅是这两个刊物的比重逐渐增大，而且许多报刊纷纷为马华文学提供了发表园地。刊物主要有《诗刊》、《小说界》、《四海——海外华文文学》、《海峡》、《特区文学》、《萌芽》、《华夏》、《回音壁》、《评论与研究》、《台港文讯》、《小说评论》，以及暨南大学、汕头大学、上海师大、海南大学、辽宁教育学院、绥化师专等大学学报；报纸如中国作协办的《文艺报》、山东作协办的《作家报》、海南省的《特区时报》都辟有“海外华文文学专页”。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报刊都发表过马华文学的作品或评论。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各地报刊发表过作品、或被评论的马华作家有：方北方、云里风、彼岸、戴小华、田思、吴岸、慧适、商晚筠、吴天才、雅波、甄供、伍良之、马仑、年红、陶焰、潘雨桐、孟沙、曾沛等多人；在中国出版了作品单行本的马华作家有：萧遥天、李忆君、黄崖、彼岸等。至于被选入各种选本的马华作家、诗人，则难以尽述。

再次，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产生了众多成果。一方面，中国文坛从开始就重视资料的收集与介绍。除上述各报刊、出版社相继推出马华文学作品以外，研究界还狠抓了文学辞典和文学选集这两项工程。大陆上最早问世的是江苏省陈辽先生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该书收集了马华作家近百人的生平资料，

并介绍了马华文坛的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作品。最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王景山主编的《台港与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即将问世的还有张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潘亚曦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关于选集,除了上海学林出版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选》等以外,最重要的是北京文联出版公司和广东花城出版社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将分别出版的两大套《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以上各书,都收集了马华文学的大量资料,其出版必将大大推进中国大陆的马华文学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学者们也非常重视作家作品的研究,对马华文坛众多主要作家及其作品,分别写有评论文章。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还试图从宏观上考察马华文学的发展状况,如陈贤茂先生正在写一部题为《海外华文文学概观》的论著,还有其他学者也在撰写类似的专著。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正计划出一套东南亚各国文学发展史的丛书,现在已纳入出版计划的是《新加坡文学发展史》,马华文学发展史的编著和出版则在酝酿、筹划之中。另外,新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辞书《中国文学大辞典》,收入了马来西亚独立以前华文文学运动的若干辞条,如“马华反侵略文学运动”、“马华诗歌大众化运动”、“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等。这部辞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迄今最大规模的文学辞典,它收入上述辞条,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学研究界对马华文学研究的关注与重视。

三、中国大陆重视马华文学研究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学者关注马华文学研究?为什么马华文学研究,会成为中国学术界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点呢?我以为,除了众多马华归侨作家的热情鼓吹和努力推动之外,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经济的封闭状态,沟通了海外的华侨、外籍华人与祖国的联系。广大华侨、海外华人纷纷回到中国探亲、观光,踊跃为中国的建设出资出力、献谋献策。这就自然促进了中国文坛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交流。另一方面,这场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也大大解放了中国作家、评论家的文学意识,拓宽了他们的文学视野。中国文学必须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已成为广大中国作家、评论家的共识,因而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世界华文文学运动,势必受到他们密切的关注。而在世界华文文学中,马华文学(与独立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历史最悠久、队伍最壮大、成果最丰硕的一支,这便决定了马华文学比其他国家的文学更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

第二,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据马仑先生《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和林万善先生《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二书统计,曾到过马来亚并参加过马华文学运动的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马华归侨作家)为数相当可观,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以外,还有吴天、马宁、张楚琨、王纪元、岳野、汪金丁、沈兹九、杨嘉、白寒、陈北平、丘士珍、杜边、流水、张紫薇、史汀等多人。这些作家在马华文坛的活动,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侧面。因此,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渐次深化,研究者们已不满足于过去狭隘的认识,而企图从更广阔的领域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的意义和影响,于是马华文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是势之必然的。事实正是如此,我们试看中年一代的马华文学研究者,过去大多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如汕头大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几位成员,陈贤茂先生曾写过一本《洪灵菲传》,吴中杰先生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胡凌芝女士则在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再如上海第二工大的王振科先生,最初也写过一批中国现代作家在南洋的研究文章。可以说,是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血脉相通、密不可分的联系,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而且也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投身到马华文学研究这片广阔的天地中来。

第三,得益于近年来中、马文化交流的推动力。7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中马两国政府在政治观念上的分歧和矛盾有所缓解,马华文学界与中国文学界的联系逐渐得以恢复。1988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学者们与马华作家们握手相逢,欢聚一堂,这大概是两国作家首次较大规模的聚会。1991年6月,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开放政策,马华作协组团来华访问,参加者有作协主席云里风先生和部分理事、会员共20余人。他们先后到了广州、桂林、西安、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地,与各地文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这次活动揭开了中马华文文学交流史上的新篇章,其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在此前后,许多马华作家纷纷踏上中国的大地,或探亲访问,或观光旅游,所到之处,多与中国作家、学者互相交流。他们的活动,更加强了中马华文文学的联系。另外,在中国举行的一些学术研讨会,如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等,马华作家都踊跃参加。马华作协还经常邀请中国作家前往马来西亚参加笔会活动、举行文学讲座等等。总之,文学的交流促进着互相间的了解,推动了中国大陆文坛马华文学研究的进展。

当然,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从总体上看,研究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中国学者在评论和研究马华作家及其作品时眼界还不够开阔,而且大多还停留在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论作品的层面上,尚未能在整个马华文学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确定他们的位置,从而更准确、深刻地揭示他们的价值和影响。至于全面的、宏观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我以为主要还是由于互相交流还远远不够。广大的学者、评论家能读到马华文学作品的机会还不是很多,即便倾力于马华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往往苦于资料的缺乏。资料的不足,既限制了马华文学在中国的广泛流传,同时也势必影响中国学者的正确评断。

作者单位:《南通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美学特征

王 本 朝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和谐、统一文化秩序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二人关系上,而“二人关系的追求与失落主要集中在夫妇和君臣上,这恰与人生的两个最敏感的问题——性和权力(爱情和政治)——相重合。”^①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意识则主要建构在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转换关系上,个体的独立、自由与社会必然性之间,理想的诱惑与现实的给定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困境是形成悲剧意识的内在原因。并且,现代作家的悲剧性感受和存在方式也融进了悲剧创作中,传统的“悲天怜人”在他们那里生长为“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韧性、抗争精神。这两个方面是规范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美学内涵的两个支点,由此形成丰富多彩的美学特征。

一、历史转换期的启蒙主义悲剧意识

中国现代社会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转换时期,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生成和转变。处在历史转换期的文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过渡性或中间性,文学必须以促使社会历史的转换和进步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悲剧意识常常发生在历史转换时期,形成一个悲剧地带,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当新方式逐渐显露,旧方式还依然存在着。面对尚未消亡的旧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内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进最初注定要失败。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②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意识就呈现、踟缩在中国现代历史过渡时期悲剧地带的背景里,它以悲剧审美方式参预、推动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表现为改造国民性,批判封建制度的启蒙主义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视角始终关注着现实、社会和人生,探讨、询问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什么是人的理想生活、或者说爱情和婚姻是什么等问题,常把人的生活境遇和命运与现实、社会的变革和改造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悲剧仅仅是概括人生、反思传统、批判现实的手段,置悲剧于“社会历史与悲剧”的模式中去理解和把握。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茅盾的《子夜》和《腐蚀》,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日出》和《雷雨》等中国现代文学优秀的悲剧作品都关注人的现实和民族命运问题,把改造国民性和个性解放以及批判现实黑暗作为悲剧思维的重心。改造国民性是对传统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批判,倡导个性解放表现

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理想也含有一种启蒙主义性质，它的主题也是批判封建专制的扼杀人性和揭示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两种启蒙都是现实性、社会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不同的精神特质。鲁迅与郁达夫，茅盾与巴金，赵树理与路翎，老舍与曹禺都沿着不同方向伸展着启蒙主义悲剧的丰富内涵。启蒙主义始终以启蒙为其目的和特点，既是对他人命运的关注和启蒙，也是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和自我启蒙。

历史的转换与过渡使悲剧作家强烈地感受到生存的悲剧性情境，鲁迅深刻而丰富的悲剧意识不仅仅表现在改造国民性的峻急与深情，更潜存于他对自身命运的悲剧感悟和超越，他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就是对历史过渡中生存的悲剧性的理性概括，他认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③把自己的命运放置在新与旧，未来与过去的中间位置上，既增强了责任感和义务感，也否决了自己作为范本、目标的虚幻性，理性认知与情感承诺在这里扭结为复杂的悲剧感，既呈现在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哀和愤激中，同时也表现为“过客”似的绝望与抗争。巴金也有历史转换时期的悲剧自我意识，他说：“我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不能够免掉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态度。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混乱时代里面，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④郭沫若也始终摆脱不掉历史过渡中的悲剧性感受的苦闷与觉醒，他说：“象我们这样五六十岁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中国想从封建社会中过渡到现代社会。”^⑤中国社会的蜕变是过了时的，这使我们这些出水的蜻蜓，要脱皮真是艰难。象我自己脱了五十多年，一直都还没有脱干净。难保不会僵绝在芦梗上？”^⑥茅盾在现代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面前也经历过人生的孤寂与悲哀，他表述为“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⑦中国现代作家对自身命运的强烈悲剧感受使启蒙主义悲剧意识显得具体而复杂，如郁达夫在他表面上的放达与游戏里掩盖着爱与死的焦渴与挣扎；巴金的史诗性悲剧建构，纠缠着他内心里火样的激情和云似的忧郁。

二、悲剧眼光的忧愤和正义观念

中国现代悲剧作家以一种忧愤的心态和正义观念的悲剧眼光去创作悲剧作品。鲁迅担心中国人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危险，郁达夫的“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的呼喊，^⑧都是忧愤的表现。现代作家在忧愤的心态基础上又以正义观念去观照现实，表现历史。在他们笔下，悲剧制造者与承受者之间善恶分明，悲剧结局并非一定要受难或死亡，只要是善的力量被毁灭或消失，那也形成悲剧，如《祝福》中的祥林嫂，《骆驼祥子》里的样子，《寒夜》里的汪文宣等，他们被逼到生活的边缘，直至失去生存的权力和可能，最后显现出他们身上善的力量而表现出感人的悲剧性。他们缺乏对绝对者叩问和反抗的勇气，常常是默默地忍受、挣扎，让自己善的价值和力量焕发出光彩。

善恶冲突是中国现代悲剧的基本冲突模式,善恶观念也是一种正义观念,带着鲜明的伦理意识,表现在爱情、婚姻悲剧中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对一种现代伦理关系的向往和肯定;表现在农民悲剧中是对那些封建伦理意识的否定和对新型人格的强调;表现在知识分子悲剧中是对知识分子的伪善的否定,对传统的反叛与对自强、独立人格的向往。在作品中隐藏的作者主观倾向是邪恶力量终究会被打败,伴随着它的社会制度的灭亡而消失,表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意识具有鲜明的乐观主义特点:希望总存在着,善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乌云即将散去,结局尽管不如中国传统悲剧“大团圆”那样圆满,但也显现出一片明朗,光明的天空。鲁迅的《药》结尾出现了花环,曹禺《日出》在剧终时 also 让人看见那天边露着笑脸的太阳,老舍把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送上绝路后分明看见民族的希望。

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意识的忧愤与正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感时忧国,关心国计民生的忧患传统的承传和对传统文化、伦理意识的扬弃。《诗经》、《楚辞》、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都表现了鲜明的忧国忧民文学传统。“作易者,其有忧患乎。”^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⑩“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⑪“士之有志于为善,而数奇不偶,终不能略展素蕴者,其胸中愤怒不平之气,无所舒吐,未尝不形于篇咏而见于著述者也。”^⑫从诗文创作到理论主张都存在一条“忧愤为诗”的美学传统,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悲剧意识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家族伦理型文化,拥有鲜明的善恶伦理意识,它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学的悲剧成为泪剧的代名词。清代毛声山在评元末高明在《琵琶记》开场词中所提出的“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观点时认为:“文章之妙,不难于令人笑,而难于令人泣。盖令人笑者,不过能乐人,而令人泣者,实有以动人也。”(第一出题词)悲剧要动人、感人,必须充分表现悲剧主角身上善的成分,并使其毁灭。所以,中国传统悲剧中出现的是窦娥的冤屈,岳飞的忠烈……。中国现代悲剧意识与这种传统伦理意识有密切的联系,但在现代悲剧那里所理解的善,所追求的正义已经带有现代意义,在本质上区别于传统伦理观念。

西方悲剧意识也带有忧患意识,但他们所忧患的是人被逐出伊甸园后的原罪和沉沦。没有上帝,人该怎么办?什么是通向上帝之路?从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福克纳、艾略特等西方悲剧作家,都表现了对人与上帝关系的联接和断裂后的忧虑,表现了一种原罪意识。在这种忧患和追求的前提下,西方悲剧眼光不是正义观念的善恶意识,而是命运观念的本体意识,它贯穿到整个西方悲剧意识长河中,“显露了它与人性未经探查的背景之间的纠葛。”^⑬命运与正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说:“这两种观念是互相矛盾、不可调和的,因为命运观念意味着人的意志不起作用,而正义观念则强调人的意志自由和责任。”^⑭中国现代的启蒙主义和实践性的强烈欲望决定了中国现代悲剧不可能选择命运的盲目与偶然,而是以悲剧方式高扬人的意志和责任。

三、艺术理想的日常性和写实性

如果与西方悲剧意识中艺术理想的非常性和神秘性比较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艺术理想则是日常性和写实性。西方悲剧的非常性主要表现为悲剧人物的贵族化和英雄化以及悲剧情节的非常性。西方悲剧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贵族、国王和英雄占据着悲剧主角,他们或者是地位高,出身贵;或者是力量非凡,人格崇高;甚至是恶的化身因其非常的人格也拥有悲剧性。悲剧情节的非常性,如杀父娶母,杀子复仇,常表现为一种暴力和残酷的凶杀。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表现的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死亡。”^⑤叔本华认为悲剧“表现出人生可怕的一面”、“表现巨大的不幸。”^⑥西方悲剧的神秘性主要表现为与宗教的关联、自然环境的阴森可怕以及人生命运的偶然性。奥尼尔坦率地表白说:“我是一个坚定的神秘论者。……我总是尖锐地感到某种潜在的力量(命运、上帝、创造人类今我的那个作为生物的旧我等)”^⑦别林斯基认为:“与悲剧的观念结合着的是阴森可怕的事件和不幸结局的观念。”^⑧西方悲剧中常出现鬼魂和恐怖的大自然景象,如奥尼尔《毛猿》中的大海,《琼斯皇》中的丛林;莎士比亚《哈姆莱特》里的鬼魂,它们或者作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或者作为一种背景和氛围,召唤我们从现象表层进入到深层,体悟到大自然和人类那不可知领域的神秘。

中国现代悲剧的日常性和写实性主要表现为题材的日常性,人物的平常性,故事的生活化以及叙述、表现的现实化和真实性。中国现代悲剧的选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的人和事,很少去关注神秘领域,自然环境的神秘与恐怖只在几部悲剧中出现过,如曹禺的《原野》和许地山的《缀满劳蛛》等,这种自然的神秘都是为衬托人物的性格而设置的,很少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如果从人物精神意识,行动方式去看中国现代悲剧,可看到两种悲剧类型:一是自在型的悲剧,二是自为型悲剧。前者主要表现为潜在、自然的生命形式,悲剧者缺乏对世界和自身把握的自主能力和强烈欲望。这在中国现代悲剧中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鲁迅所说“近乎无事的悲剧”,悲剧主角同时又不自觉地制造出他人的悲剧,显示出双重悲剧角色,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巴金《憩园》,鲁迅的《祝福》中的“看客”等等。二是争取基本生存权利的悲剧,悲剧主角没有超出自己基本的生活要求以外的更高的要求 and 奢望,但悲剧依然降临在他们头上,如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月牙儿》,茅盾的《春蚕》等。这两种情形的悲剧表现出典型的日常性、平凡性特点,作者几乎照生活本身的自然逻辑真实地表现出生活本身所掩盖和存在的巨大悲剧性。

自为型悲剧主要表现为悲剧主角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具有强烈的把握、征服世界和现实的自我意识和超越欲望。如黑格尔所说:“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这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自我意识就是欲望。”^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为型悲剧主要也有两种情形,一是现实中的先觉者、革命者、创业者和追求者,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疯子”形象,他们向封建礼教制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显示出历史转折时期一批先知先觉者的悲剧力量。茅盾笔下的民族资本家创业者的悲剧也展现了作为悲剧主体的人的辉煌与光彩,吴荪甫虽倒在实业化、工业化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但他的胆识与才干、希望与设想仍动人心魄!曹禺笔下的仇虎、繁漪也

向人们显示了悲剧者的热烈与残酷,巴金笔下的“复仇者”,叶紫笔下的“革命者”都是现实中的自为型悲剧家族。他们常是作者理想的寄托,时代精神的化身,标志着悲剧以审美方式对时代、现实精神的高度概括和象征。二是历史和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鲁迅《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色人,郭沫若笔下的屈原、高渐离、段功、聂政和如姬,施蛰存笔下的花惊定,郑振铎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等等。它们都表现了历史神话人物的悲剧性,并且,这些历史人物往往被现实化,被揉进作者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世界里。

自为型悲剧人物也主要以平常性,现实性为其特征,作者并没有着力表现他们的神秘性与非常性,现实中的自为型悲剧自不必多说,就是仇虎的“矛盾”与“痛苦”也是在良心、道德层面上去展开的,他也没有神秘的上帝存在。历史中的自为型悲剧颇有英雄的特性。但也没有被作者推到神秘的境地。施蛰存《将军的头》中的花惊定死后头仍挂在马背奔向爱情之地,这有一定的传奇、神秘色彩,但这样的作品毕竟太少。可以说,中国现代悲剧的艺术理想是从日常性和写实性为主要特征的。这种写实性和日常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民族个性。中国文化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就开启了民族的重实际轻玄想,崇现实贬抽象的传统。朱光潜先生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费力去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⑨李泽厚也用“实用理性”去概括中华民族的智慧^⑩,他们都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另外,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日常性、写实性也与中国现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有紧密联系,^⑪因为现代人相信科学可以解释万物,认识一切,那么,神秘和非常的事物也就无处藏身。

四、审美感受:笑与悲

笑本来是喜剧性的审美反应和特征,但是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审美感受在悲的内涵里却融进了笑。我们在读现代悲剧作品时分明感受到喜剧性因素的存在,这表明中国现代悲剧意识有相当的复杂性。

西方的悲剧与喜剧自亚里斯多德开始就有严格的界限,从人物,题材和表现手法到美学效果都拥有鲜明的分界线。相对于悲剧而言,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⑫这样,与悲剧相关的是英雄、受难、崇高和悲壮,与喜剧相连的是丑角、矛盾、滑稽和笑。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却打破了这种界限,常常是悲喜融合在一起,悲中有喜,喜里含悲。鲁迅的悲剧里常常包含着一种喜剧性因素,如《孔乙己》、《阿Q正传》,在他们深刻的悲剧性里又有许多滑稽、可笑的东西,孔乙己的“酸气”与“自尊”,阿Q在自卑里披上了“自傲”的面皮,虚弱如稻草,但又假装强壮得象纸糊的英雄。老舍的《二马》、《四世同堂》在表现人物悲剧性的同时也刻划了他们的喜剧性。钱钟书的《围城》可以说是融合悲剧与喜剧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方鸿渐在爱情、婚姻、家庭和职业上的步步追求与疏离,希望与绝望的喜剧性进程中,得出一个真实得可怕的悲剧结论:人生如围城。

中国现代作家在表现悲剧性的现实和历史时又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喜剧性因素的存在,因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转型特点本身就具有众多可笑的因素。马克思对历史的喜剧性作了经典性的论述:“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①他还更简明地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②如果说中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古代和近代曾起到过相当的历史作用,扮演过悲剧角色,那么,在中国现代社会,随着无产阶级“真正主角”的出现,他们就以喜剧性的丑角出现。中国现代作家在创作悲剧时就把这些“丑角”及其各种精神意识形式置于历史的“坟墓”,表现出它们众多的喜剧性因素。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笑与悲融合的社会、历史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创作主体担负着以悲剧审美方式进行文化思想启蒙的现代作家,必然会以喜剧性方式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语),从而结束一个旧时代,完成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喜剧性终结。

①《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张法著,第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③《悲剧的超越》第35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

④《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页。

⑤《爱情三部曲·总序》,《巴金论创作》第9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⑥⑦《郭沫若论创作》第152页,第56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⑧《矛盾选集》第五卷第108—109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

⑨《沉沦》,《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⑩《易经·系辞下》。

⑪《史记·卷八十四》。

⑫《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十五《澹斋居士诗序》。

⑬(宋)黄彻《碧溪诗话·自序》。

⑭⑮《悲剧心理学》第105—106页。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⑯《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第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⑱《尤金·奥尼尔评论集》第353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⑲《西方论文选》(下)第382页,伍蠡甫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⑳《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㉑参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03—30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㉒参阅《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美)郭颖颐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㉓《诗学·诗艺》第8页,第16页,1962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㉔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第603页。

作者单位:重庆西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

张惠民

一

诗学之影响于宋代词学，最突出表现在以诗言志歌咏言的古老观念说明词的起源和产生。张侃说：“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题谭该乐府云：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而也。唐元稹则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齐牧按《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虞载歌，薰兮解慍，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二公之言尽矣。然乐府之坏，始于玉台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歌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李太白、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调》、《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渔家傲》、《御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东莱吕伯恭编入《文鉴》，为后人矜式。”①张氏论“乐府”词之起源，忽略了古虞歌与今曲子的区别，谓其源远流长，萌芽于虞舜之时，其尊体探本之意与矫正玉台杂体以来淫侈的用心可以理解，但于解决词体起源问题则显然无济于事。陆游的《长短句序》也论及词体起源的问题：“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乃变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陆游虽指出“倚声制词”之独特体式起于唐季，但总的看法仍然以为词乃风雅颂之衍变，而“其变愈薄”的慨叹当然立足于儒家诗教的“温柔敦厚”的伦理原则上。所以，尽管他敏锐地看出这“倚声制词”的体式产生于晚唐，但由于其诗词同本观念的影响，词体起源的命题就被忽略和淡化了，结论也就含糊不清了。

但沿着相同的观点，宋人也有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赵德麟《侯鯖录》卷七载：“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而后有音，故曰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这是从音乐形式及其与歌词结合关系上指出古歌诗与今曲子的不同。王灼《碧鸡漫志》谈到词之缘起及发展过程时说：“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把词的起源定于隋代，兴盛于唐而繁荣于宋代。张炎《词源》也主是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据近人考证，很多词牌名如《泛龙舟》、《安公子》、《穆护砂》等，隋代已有。而《斗百草》、《水调》等在隋代已经传唱，这些词调都是隋代民间音乐或乐工创制的新乐曲。所以，词起源于隋的说法，目前为较多的学人所接受。

那么，从歌诗到倚声填词，又是如何演变而成的呢？宋代词学也有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和和和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胡仔也有近似的说法：“唐代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阙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②朱熹也有相似之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填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③以和声、虚声、泛声填实字，逐渐使齐言诗成长短句之词，其演变之内在依据就是词对音乐的适应。此中无疑有“律和声”的诗学影子。

二

传统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莫过于以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伦理原则与中和平正的美学原则对缘情绮靡之词的批评，论者虽旨在矫枉，但客观上却有过正之偏。南渡之初，胡寅为向子諲作

《酒边词序》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流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追、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胡氏儒者，以诗三百之风雅衡词，而谓词乃诗之衍变。词与诗之所同者，皆“发乎情”，所异者则在“曲”之“曲尽人情”而不能在伦理原则上“止乎礼义”。胡氏之论颇有道学味而所见却不差。

以儒家诗教原则论词者，其着眼处往往在诗词的社会功用上。诗教以为诗的功用一在感化人之善心，一在自持诗人之情性。曾丰的《知稼翁词序》说：“夫颂，类选有道德者为之，发乎情性，归夫礼义，故商、周之乐感人深。歌则杂出于无赖不羁之士，率情性而发也，礼义之归欤否邪不计也，故汉之乐感人浅。本朝太平二百年，乐章名家纷如也。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绪餘耳，犹有与道德合者。……考功（黄公度）所立不在文字，余于乐章窥之，文字之中所立寓焉。……凡感发而输写，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性情则适，揆之礼义而安。非能为词也，道德之美，映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也。”以为诗词之道，在于发乎真情性而在文字之中寓以道德之美，始能感发人之善心。而安于礼义适于性情之作在审美风范上必合“清而不激，和而不流”的原则。黄裳《演山居士新词序》则把歌词主要当作自持情性、写志立言之工具。他说：“风、雅、颂诗之体，赋、比、兴诗之用，古之诗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则有赋，触类则有比，对景则有兴，以言乎德则有风，以言乎政则有雅，以言乎功则有颂。……故予之词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黄氏以儒家诗教六义为立说之本根，而以词写闲居之逸兴，“舒其情、致其乐”，诗词乃自适之工具而与世之歌词专务“悦人”者异。这正是娱人之词与自娱之词的区别，是代言体与立言体的区别。黄氏之词，自谓是“志趣所向、情理所感”的产物而合于儒家“义之所在”，所以清新而雅正，具平淡自然之美。而“平淡”则是宋代诗歌美学中的最高境界。林正大的《风雅遗音序》更表现了其词学观念对传统诗教原则的趋同：“古者燕飨则歌诗章。今之歌曲于宾主酬献之际，盖其遗意。……余暇日阅古诗文，撷其华粹，律以乐府，时得一二，哀

而录之，冠以本文，目曰《风雅遗音》。是作也，婉而成章，乐而不淫，视世俗之乐，固无间矣。”说得很清楚，把“今之歌曲”比诸古之“歌诗章”，而以上继风雅为己任。与“世俗之乐”的绮靡不同，“风雅”之作“婉而成章，乐而不淫”，既合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原则，又合于温柔敦厚婉转含蓄的美学原则。

用古音雅乐以衡今曲，用正人心、善风俗的儒家诗教原则批评艳词，其激烈与痛快莫过于铜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诗》三百五篇，商、周之歌也，其言止乎礼义，圣人删取以为经。周衰，郑卫之音作，诗之声律废矣。……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淫乐，而明宗尤溺于夷音，天下薰然成俗。于是，才士始依乐工拍但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褻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尊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温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序言以儒家诗教衡词，唐宋以来的婉约派艳词几乎都成了它的批评对象，其用意注目于淫艳猥褻不可闻之词之伤风教、坏人心，而提倡“骚雅”之词。事实上，士大夫之词抒写“情致”而温骚雅之趣者不少，铜阳居士矫枉过正的偏激是明显的。但平心而论，其偏见之中，却包含着灼见。比如其论唐代开元、天宝间，玄宗好夷音胡乐，天下成俗，词体正是产生在这样一个音乐环境之中。虽其目的在说明不合古之“声依永”之理，却也不期然说明了词之起源的几个重大问题。铜阳居士对艳词的批评，在南宋词学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杨万里也有相似之论，《诚斋诗话》云：“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近世词人，闲情之靡，如伯有所赋，赵武所不得闻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即以儒家中和节制的原则作为衡词的标准，承认词写闲情的合理性，而不能流于“靡”，好色而不能流于“淫”。

宋代词学以《诗》三百为旨归，还有一点是与时高下、与政相通的传统的诗学功能论。刘禹锡说过：“五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李清照《词论》从社会的政治文明礼乐以论词，故有南唐

“亡国之音哀以思”之说，正是这种词学观念的反映。黄裳《书乐章集后》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对柳词的评价，历来未有如黄氏之高者，其着眼点在柳词能写出北宋太平盛世气象，成为盛世的赞歌，立论的基点正是儒家礼乐文明与政相通的思想，柳词之铺叙展衍及其描写的客观性使其词具有反映现实的作用，使后人读之“如丁斯时”，这一评价也是中肯的。李之仪也曾有相似的见解，他说：“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④南宋蔡戡为张元干的《芦川词》作序时，对其抨击时政之作，以为“深得三百篇讽刺之义”，“不为无补于世”。这都是诗学功能论在词学中的运用。

三

在创作方法上，诗主比兴而词主寄托。其实词学中之寄托说本质上正是诗学中比兴创作方法的深化和发展。朱熹《诗集传》论“比兴”的创作方法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宋代词学中多有以诗家比兴之法说词者，罗大经说：“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洵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半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深长。”⑤这是诗法直接用于词法的显例。黄大舆《梅苑序》云：“若夫呈妍月夕，夺霜雪之鲜；吐嗅风晨，聚椒兰之酷。情涯殆绝，鉴赏斯在，莫不抽毫遣滞，劈彩舒聚，召楚云以兴歌，命燕玉以按节。己酉之冬，予抱疾山阳，三径扫迹，所居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于是录唐以来词人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黄氏之序，卒章显其意，《梅苑》之辑，正取诗骚比兴、美人芳草之义，梅为芳物，托物可以寄意，以表清洁之情怀，可喻超妙之意趣。

儒家诗学的比兴之法，通于诗教的美刺讽喻之义而具政治性的色彩，所以苏轼之词，其咏雁

之作，宋人以为其有怨刺之意，中秋之词，神宗谓其终是爱君，稼轩“烟柳斜阳”、“玉环飞燕”之句，寿皇谓有怨意，这都是宋代词学中以诗比兴讽喻说词的例证。《古今词话》载《复雅歌词》论七夕故事云：“诗人谓‘晓彼牵牛，不以服箱，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者，以比为臣而不职也。夫为臣不职，用人者之责也，此诗所以为刺也。词章家者流，务以文力相高，徒欲飞英妙之声于尊俎间，诗人之细也夫。”正以为词应担负起比兴美刺讽喻的任务，而不能作唯美主义“徒欲飞英妙之声”，而词章家者流，却往往只属于“诗人之细”，这正是词之所以为“小道”的原因。

宋代诗学对词学的影响，还表现于词论家以诗学审美标准表述词作的风格特征。这一方面说明宋代诗词作为共时性的文艺体式所共有的时代审美风格，一方面也说明词学审美取向对诗学的趋同。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是人们所公认的大判断。宋诗多思理，富有诗意地表现宋人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情景交融，理在其中，趣生言外，是宋代诗人的美学理想。宋人多推崇富于理趣的诗句，如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以及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宋代诗话笔记中每每津津乐道。至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朱子“为有源头活水来”之句，更是人们熟知的富于理致的作品。作为一种时代性的审美趋尚，不可避免地影响于歌词的鉴赏和品评，并反过来影响于词人的创作。杨缵《古今词话》谓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这首词“极有理趣”，自然是指其中写惜春怨春而寄寓屈骚忠而见疑、去国怀乡之思，理既极妙，趣又极佳。其评“太学士人”〔临江仙〕咏芭蕉船送穷词也谓“极有理致”。可见这长于“理致”之美，已是其衡词的重要标准。《茗溪渔隐词话》（《词话丛编》修订本）卷一引《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为余言，张志和《渔父词》雅有远韵。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图画者，而世莫之传也。尝以其词增损为〔浣溪沙〕，而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烟波图见归，其思致深处，不减昔人。”可见宋人对张志和《渔父词》及改写之〔浣溪沙〕词还有以其人其诗入画之烟波图，其共同的审美情趣是“雅有远韵”、“思致深处”。当然，这是基于宋人对

张志和避开宦海风波自隐于斜风细雨之烟波的生存方式的认同与向往,从而表现出宋人的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中兴词话》(《词话丛编》修订本)载:“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龙吟〕……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苏轼所倡导的以诗笔为词的创作实践,词论家以诗衡词的批评实践,必然促使同一作家诗词艺术风格的趋近,故“敷腴俊逸思致精妙”的诗美亦可成为词的美学风貌。不过,纵观两宋,尚未有一个作家的诗词创作真正形成同一的艺术风格,包括苏轼、陆游和姜夔,他们的诗作和词作仍具不同体式之美。这也见出词论本身在风格论上的不成熟。曾季狸《艇斋诗话》论诗最推崇“有思致”之作,称晏殊诗“亦有思致,不减唐人”。其论词则说:“晏叔原小词‘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吕东莱极喜诵此词,以为有思致。”又说:“舒信道亦工小词……亦甚有思致。”尚思致是宋诗最主要的特色,长于深思妙于达理,诗中多奇趣,言外有远韵,以此诗人之笔作词,以此诗人之眼评词,也就必然要求词体具有诗体之美。

四

宋诗苏黄并称,而苏轼如太白之飘逸豪宕,才华横溢,出神入天,行云流水,有法归于无法,殆不可学。而山谷师承老杜,以法教人而形成后来的江西诗派,影响甚巨。而山谷所倡作诗诸法也自然成为后人学步的规矩。山谷论诗极重学养,一是道德境界的提高,一是学问书卷的渊博。他的《答洪驹父书》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所以他主张作诗“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论作诗文》)。山谷作诗极重句法和诗眼,《赠高子勉》云:“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答王子飞书》云:“陈履常……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这等作诗之法正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基本方法。

黄山谷之影响于江西诗派及南宋诗坛最巨者,也最引起后世非议者,是其“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说。这种方法是其所提倡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具体应用,他在《再次韵杨明叔小序》中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钺,如甘蝇卫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他的《答洪驹父书》又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

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山谷点铁成金之说的前提是诗人之主体情性能“陶冶万物”,胸中锤炉,再加锻造,才能使原来低品级的“陈言”成为高贵的“金”。这一方法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惠洪《冷斋夜话》引山谷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对此法的引述,是否为山谷的完整准确的原意,尚有疑问。但奉之者目为度人之金针,贬之者以为乃“剽窃之黠者”(王若虚),现代的学者又从“陌生化”的美学原理为之辩解。笔者只想指出,这一诗法对宋代特别是南宋诗学有严重而广泛的影响,并进而波及于词学。曾季狸《艇斋诗话》说:“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其实皆一关键,要知非悟入不可。”说的正是江西社里人所操诗法与山谷同一关键,而后山也主换骨之法。

由于自北宋以来,苏轼以诗笔作词,黄庭坚又主张“寓以诗人句法”(《小山词序》),所以南宋词坛自有一种诗词合流的倾向,而以诗法作词评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强焕《北玉词序》以为清真词可比古之“以弦歌为政”,其词精警而“句中有眼”。刘肃《片玉词序》说:“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微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李清照《词论》有“尚故实”之一端,是清真之所长。所谓故实者,即如刘肃所言,融古今于一炉,“微词引类,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如山谷所推崇的杜诗韩文。从而使词具有轻云笼月的朦胧浑融之美,并形成其“缜密典丽”的艺术风格。善于运用、点化前人诗句入词,是清真之所长,实即山谷“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的诗性。周密说:“周美成长短句,纯用唐人诗句,如‘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贺方回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则亦谓能事矣。”⑥可见以前人诗句变化入词乃词人长技,而评词者则誉之为“能事”。张炎也说:“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⑦都见出宋代词学并不反对以诗入词,不反对取诗之精神、字词、句法、材料为词。张炎论词深受杨守斋影响,守斋的《作词五要》即谓“或翻前人意,便觉出奇”,这正是山

谷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沈义父《乐府指迷》论词亦以清真为依归，他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从中，不难看出与山谷及江西诗派诗学主张的直接关系。他又说：“要求字面，当看温飞卿、李长吉、李商隐及唐人诸家诗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即如《花间集》小词，亦多好句。”按沈氏此论，采摘范围已由唐宋诗而扩大到《花间》词了。取晚唐温李诗入词，当然使他们的诗与词境词体之凄艳轻婉相近。以前人诗词融化点染而表达自己的情思，一是有故实见学问，二是字面雅而不俗，三是能含蓄有韵味。但其流弊则变为陈陈相因，甚至成为“剽窃之黠者”而走向末路。

然而，以前人诗句融化入词，在宋代是普遍现象，并不限于清真等少数词家，词论家也多取褒扬的态度。陆游说：“唐韩翃诗云：‘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近世晏叔原乐府词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气格乃过本句，不谓之剽可也。”①春潭洗马，尚见风尘仆仆远道而来况味，而绿杨系马，则人已登楼入室，一派温柔乡的情调溢于言外。韩诗第二句，楼前迎人，则人尚未进入境界，而晏词则已是“床前”照红烛，款洽多时矣。故放翁许其不算剽窃。曾季狸《艇斋诗话》说：“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皆夺胎换骨手。”周紫芝《竹坡诗话》说：“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东坡作送人个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乐天语为简单直接的比喻，梨花春带雨只见其美艳，故其气韵近俗，比起东坡之推崇风流标格，自然少一些韵致与逸趣。与佳人惜别之际不出悲伤之语，沉重而反调以轻松，不是词人眼中的梨花带雨，而是让佳人自己想象以泪相送，当如梨花带雨。内涵无疑丰富得多，而又包含着几多人生况味与对知己的眷恋。此正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正是点铁成金的成功之例。这些，都可看到宋代诗学对词学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宋人“以诗为词”的观念的复杂与丰富的内涵。

- ① 张侃《拙轩词话》，《词话丛编》修订本。
- ② 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二，《词话丛编》修订本。
- ③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 ④ 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
- ⑤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
- ⑥ 周密《浩然斋词话》，《词话丛编》修订本。
- ⑦ 张炎《词源》卷下。
- ⑧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司空图的审美图式论

孙 汉 生

一、《二十四诗品》是审美图式

艺术风格和对作品的审美感受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未加严格界定，造成运用的混乱。实际上，它们栖身于主客体两极之上，存在很大的距离，这两极就是接受主体和文本。“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被表现内容和意图所决定。”^①它是文本的潜在结构的外在表现，是文本中两种客观倾向的统一体：创作主体的倾向（包括创作主体个人气质和表现意图，它们虽然看似主观的，可是在文本中已成客观的存在）和为表现内容、意图所需的形式的倾向（包括文体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词汇的运用、句法的构造）。相当于接受美学所谓文本的审美特性。而美感是接受主体对文本审美功能的实现，尽管审美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文本的审美特性为前提，但其主体毕竟在于读者，它与风格迥然不同。由于风格取决于上述两种倾向，风格分类理论常常着眼于创作主体和文本特性。中国古典美学正是如此，其表述风格的概念习惯于用“气”、“体”、“势”等，较早的如曹丕《典论·论文》，论主体风格则曰：“徐干时有齐气。”“应扬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论文体风格则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集大成者刘勰，其《文心雕龙·体性》论主体风格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生所铄，陶染所凝。……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杜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定势》论文体风格则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而《二十四诗品》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以上两点，它并不是说诗本身的客观属性如何如何，而是说，这种客观属性作用于接受主体的心灵所呈现的心灵状态与所重构的心理图式。这种图式比风格具体得多，

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也模糊得多，无法用精确而简单的概念语言表述，所以要用形象的语言去捕捉、追摹那若隐若现的心理图式。它描述的是审美动态的过程，即“诗品”的“品”的过程。

“诗品”的“品”向来不作风格概念。钟嵘《诗品》的“品”，是等级和座次，司空图的“诗品”，则是对诗的品味。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司空图晚年隐居中条山，唯以作诗品为务，其《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诗自云：“第一功名只赏诗”。《二十四诗品》即其赏诗所得之味。

辨味，实际上就是对诗歌的艺术接受过程。钟嵘的“滋味说”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他从创作主体出发，强调兴、比、赋的运用；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序》）而司空图的理论则迈进了一步，站在接受主体的角度，道出味之无极，得自“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②这“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又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③的审美效果。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接受主体对诗歌文本在艺术接受过程中的再创造，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得置于眉睫之前。^④因为它已不再是客观实体，前一个“象”与“景”，是诗歌文本创作主体的创造，而后一个“景”与“象”，是接受主体的创造，经过两次心灵化的过滤，发生两度虚化，然后才有“韵外之致”和“味外之味”。创作主体所创造的审美意象“景”、“象”，对于接受主体来说，要保持着“近而不浮，远而不尽”^⑤这样不即不离的审美关系，“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因为，不离，方可构成审美关系，发生审美效应；不即，方有审美再创造的空间和余地，才能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二十四诗品》所构成的审美图式，扑朔迷离，如水月镜花，就是这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二、审美图式的中介作用

《二十四诗品》是具有创造性独立意义的审美直觉的图式化境界。它所展示的首先是力的图式。按照力的强度和倾向,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成外向型和内向两种类型。⑥

内向型图式大体上是由王、孟等人的诗歌文本唤起的心理图式,如《冲淡》、《自然》、《含蓄》等等。这类图式的力的形态往往表现为相互间的婉曲回旋,对切近事物的渗透与亲昵,从而达到和谐交融的状态。这种力的运动比较合规则,顺应自然的运动法则,与恬适轻松的心理结构相对应。“水流花开,清露未晞。”“犹春于绿,明月雪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这种力的运动表现在人物身上,是一种悠雅的行为方式和高洁的生活情趣,让人想到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嵇康,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陶潜。“筑屋松下,脱帽看诗。”“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倒酒既尽,杖藜行歌。”这些审美图式的构成,无疑是王、孟一派诗歌审美功能的实现,其力的图式与王、孟等人诗歌文本的潜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同构现象。

外向型图式,如《雄浑》、《高古》、《劲健》、《豪放》、《悲慨》、《飘逸》等,这种图式的力是一种强烈的张力,它以迅疾勇猛的运动方式向着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伸展、扩张,似要追求永恒和超越,它的图式结构是开放式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大鳌,濯足扶桑。”“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这种力量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伟大的精神力量,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共工怒触天柱,屈子愤而上天入地,尽可拿来与之相匹。它有强烈的占有欲和支配欲,占有日月,占有永恒,与万物混同为一。它有巨大的摧毁力,破坏力,雄风到处,摧枯拉朽,剑光拂动,所向披靡。在接受主体心理上能够唤起这种力量图式的,在唐诗中,首当推李、杜诗,次则韩愈、高适、岑参和李贺等人的诗。

《二十四诗品》中外向型图式,是唐诗中具有沉雄博大,宏丽奔放特性的诗歌结构在作为接受主体的司空图心灵上的重构。司空图具有丰富的审美经验,他的审美视野比较开阔,他虽然偏爱

“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⑦却能体认李、杜在诗歌史上的终极地位。《与王贺评诗书》云:“宏肆于李杜,极矣!”其《题柳州集后序》言:“尝观韩吏部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这种感受与《二十四诗品》中某些图式相当一致。

《二十四诗品》的两类图式充分表明了司空图对唐诗的审美接受及审美选择的倾向。诗歌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结构,“接受过程是有所选择的,接受过程是有删节、价值变换的过程,简单化,同时也复杂化”。⑧它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接受主体通过对诗歌文本潜在结构的再翻译,再创造,重新回到诗歌文本的经验过程,完成审美对象的最后生成。但这个过程已经融进了接受主体的审美经验,也掺杂了一些非审美的观念的东西,司空图对唐诗的接受即是如此,价值变换非常明显。被司空图视为“都市豪估”⑨的元、白等人的诗,显然不在其接受对象之列。对李、杜诗的接受,也是更多地着眼于形式的结构,把诗中所蕴含的伟大的精神力量,都归结为“道”的力量,把诗的社会功能也转换为审美功能。这一切都是由《司空表圣文集》、《司空表圣诗集》中时时流露的佛老思想和人生经验所决定的。(关于价值转换,非本文主旨,无暇详论)。司空图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诗歌文本潜在结构的直观感悟,《二十四诗品》的价值在于对审美图式的探索。

上述两种力的图式,不论是强烈的,还是轻柔的,它们都是力的动态的存在,唤起两种力的图式的诗歌文本的潜在结构也是两种形式的运动状态。王、孟诸人的诗,看起来恬淡宁静,但实际上,“艺术作品的静谧乃是动态的静谧而非静态的静谧”。⑩它是创作主体生命力动态过程的静态形式化,因为没有静态就无以成形。“美感就是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而这种生命力只有靠我们自身中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把握”。⑪《二十四诗品》正是司空图作为接受主体以自身的生命力节奏,以审美直觉的方式,对诗歌文本及其潜在的创作主体的动态生命力结构的形式化把握。但接受主体与客体双方都并非以消极的姿态出现,它们以各自对对方的作用而呈现双向运动的状态。接受主体积极参与本文对审美功能的建构,而“诗歌文本作为审美对象使得一种更为复杂、更有意义的感觉方式成为可能,

这种感觉方式作为审美愉悦能够复活认识的想象力或想象地认识”。①《二十四诗品》构成的审美图式正是这种感觉方式的可能性的实现，它本身就是诗歌审美功能之一。但它通过“复活认识的想象力，又能实现诗歌诸多方面的审美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诗品》又是司空图艺术接受活动的审美中介，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艺术接受的中介模式。

《二十四诗品》作为审美图式，是“一个由色彩、声音、触觉特质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由形状、结构旋律和节奏构成的世界”。它是全由形式构成的直觉世界，这个世界作为符号形式，是“一种直觉的语言”。②“感觉方式成为可能”，首先是直觉世界的形成，“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正是这直觉世界的中介作用，因为接受主体所感知的，是“一种直觉的语言”，所重构的不是概念而是图式化形式。这个图式化形式，本身就是意义的实体，亦即“风流”的载体。这里，仅以《形容》一例来分析《二十四诗品》审美直觉的图式及其中介作用。“绝伫灵素，少回清真”。这是审美活动之前的心理准备，扫去心灵的尘埃，让心灵境界一片透明，然后把心灵投入诗歌文本的形式世界。诗歌文本潜在的形状、色彩、声音、结构的旋律和节奏，在接受主体的心灵引起共鸣与同构，于是新的图式在接受主体的心灵中形成：“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通过这个图式，接受主体体悟着宇宙（时空）和生命的力量、节奏及旋律，最后又遗形落貌，心灵进入一个神秘的境界，与“大道”“妙契同尘”，混同为一，直接感受着道的力量。这是司空图审美接受活动的最后旨归，也是“风流”的所在。这“不著一字”的审美图式只是中介，在审美接受过程的价值转换就是由这中介实现的。

《二十四诗品》的基本结构模式是：先让心灵虚静明澈，进入审美感悟的直觉世界，然后投入诗歌文本，重构新的审美图式，最后遗形悟道。《形容》一品是其典型代表。这种结构模式基本上展示了司空图诗歌审美活动的思维结构和程序，也显示了审美图式的中介实质。

三、审美图式的哲学归宿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诗歌艺术通过接受主体的审美图式的中介作用实现审美功能的独特方式，为什么这种图式化的形式能够使接受主体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呢？这就要为形式一辨了。

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的这一美学假说已被广为接受。这种意味来自全民族乃至全人类一代审美经验的积淀，使艺术形式成为全人类审美经验的宝库。《二十四诗品》的图式化形式，由一系列审美意象组合而成。这些意象有某种一致性的统一，存在于同一个力的场之中。油云、华顶之云、白云、长风、惠风、清风、天风、海风；独鹤、缙山之鹤、流莺、幽鸟、鸂鶒、凤凰；修篁、修竹；碧桃、绿杉、红杏、芙蓉、落花、松、菊；野屋、茅屋、楼台；高人、真人、畸人、幽人；人淡如菊、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杖藜行歌、时闻清钟……这是一个纯形式的感觉世界，有声有色，有动有静，但它们又是那样遥远，象在月宫或在梦中，“可睹而不可取，可闻而不可见”。因为它们只是作为经验的存在，审美的存在。孙奎联《诗品臆说·自序》云：“得其意象，可与窥天地、可与论古今。”可见每个意象沉重的负荷量。统摄如此纷繁的意象于一个力场之中的内在力量，是一个更遥远更虚幻的主导意象“真”或“真人”。在诸多可感的意象中，它是含有较抽象意味的特殊意象，但最有力量的正是它。“高人”、“幽人”、“畸人”，实际上是一回事。

“真”或“真人”，作为有特殊意味的意象而非现代语言中“真实”或一般美学意义上的“真”，在《二十四诗品》中出现十几次之多。《说文解字》云：“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原来古代的“真”字，包含着一个民族神话，我们很容易想到许多升天的传说，如黄帝在黄山骑龙升天，嫦娥奔月，王子乔、赤松子羽化成仙，等等。真人，如果借用荣格的概念，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原初意象或原型。道教盛行，炼丹修道以期成仙成为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风气，大约就是受这原型意象的支配和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这种原初意象在中国历代的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中频频出现。《易经》已有“时乘六龙以御天”的卦象，升天的原初意象在周朝就已存在。《老子》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真，在这里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在《庄子》里，得“真”之德的人就被称为“真人”或“畸人”。《大宗师》：“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为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谄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能登假于道者

也若此。……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其一与天为徒，其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德充符》更具体地描绘了畸人形象，这种畸人即得道真人，是一种超人，与天地为一，具有神奇的力量，虽肢残体缺却能“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⑩与“变形而登天”的仙人同出一辙。在阮籍、嵇康、陶潜等人诗中，“真”虽然作为一种人格修养和道德力量出现，更接近老子的“真”，实际上也是那种原始经验的具体实现和演化。如阮籍《咏怀四十七》：“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嵇康《幽愤诗》：“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诗歌就是在我们语言的纱幔后面原始词语的遥远回声”。⑪

“原初意象或曰原型是一种形象，……凡是创造性想象得以自由显现之处，它就会频频出现”。⑫《二十四诗品》作为审美接受的产物，也是创造性想象的产物。二十四种审美图式作为直觉世界，正是接受主体对原初意象所蕴含的集体无意识的直观感悟的中介，对道或真的直观感悟以及感悟之后所得到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完善，是司空图对诗歌审美功能的进一步揭示。与其如尧斯所说：“复活认识的想象力”，毋宁说对集体无意识的直观感悟。

庄子对世界和道的体悟方式是虚静、心斋、坐忘。司空图对道真的感悟方式借鉴于庄子的认识论，“素处以默，妙机其微”。“虚伫神索，脱然畦封”。“体素储洁，乘月返真”。但是，司空图没有庄子那么直接，他得意忘言而并不忘象，因为司空图的感悟是审美感悟，审美离不开形式之筌蹄。司空图的感悟通过意象组合构成审美图式

中介，从而得“真”。

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云：“首以《雄浑》起，统摄诸品，是以无极而太极也。”以《流动》作结，“盖至此而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流动之妙，与天地同悠久，太极本无极也。”老庄之“真”即道，实际上是《易经》太极这一原始经验的演化。杨氏对《二十四诗品》顺序的解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对统摄二十四品的内在力量的认识确为卓见。“真”，作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人类无法了解的经验，因而人也常有受它驱使的危险，它的价值和力量于他的广大无边。”⑬因为“真体内充”，才“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进而“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因为“饮真茹强，蓄素守中”，才能“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因为“是有真迹”，所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

在晚唐令人痛苦的社会现实中，司空图曾抱济世之志却无力回天，只好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乞灵于道的力量，通过审美活动特别是诗歌鉴赏，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审美生活的空间，求得审美超越。作为接受主体，他达到了对道的领悟，吸取了道的力量，获得精神自由和人格完善。在他自己审美创造的世界里，“俱道适往，著手成春”，道附于身，出神入化，与物为春；“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参天立地，贯古通今；“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可以打破类的隔阂，与万物混而为一；“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适，妙不自寻”，可以摆脱礼法的约束，唯性所适。他的身体虽未“变形而登天”，也未长生不老，但他却变成了“精神神仙”。

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是虚幻的，美却是真实的。

注释（引自《二十四诗品》者不注）

- ① 威克纳格《诗学、修辞学、风格论》，译文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文学风格论》第18页，王元化译。②⑤⑥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司空表圣文集》卷二。③④ 司空图《与极浦书》，《司空表圣文集》卷三。⑦⑪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页、179页。⑧ 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司空表圣文集》卷一。⑨⑩ 卡西尔《人论》第189页、19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⑫ 参考卡西尔《语言与艺术》，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第126页。⑬ 《庄子·逍遥游》。⑭ 荣格《分析心理学与诗的艺术》引格哈特·豪普特曼语。译文见《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5期。⑮ 荣格《分析心理学与诗的艺术》。⑯ 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第1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轩

记中山大学馆藏海内孤本《韵玉函书》

陈 定 方

《韵玉函书》是清初的一部韵书，未刊，今存稿本残卷两种，藏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第一种稿本题光山胡煦沧晓氏纂集，男季堂校字；第二种残卷第一至五册封面则题“西溪初校，月泉再校，星桥三校，星桥补校”。显然，第二种为第一种的补改本。

胡煦（1633—1736）为清初著名的学者，河南光山人，字沧晓，号紫弦，初以举人任安阳教谕。康熙31年（1712年）举进士，散馆，授检讨，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曾任《明史》总裁，累官至礼部侍郎，后因事罢归。乾隆元年（1736年），诏复原官，不久去世。胡氏一生苦心读书，对于《易经》用功尤深，著有《周易函书》30卷、《释经文》49卷，为正集；有《韵图》3卷、《孔朱辨异》3卷、《易学须知》8卷、《卜法评考》4卷，为别集。另著《韵玉函书》5卷。前数种均已刊行，唯《韵玉函书》未见刊本。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述及胡氏的事迹时说：“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学名臣，治《易》究图书之蕴，著函书数十万言。圣祖屡召见，问爻象疑义，命画图讲说，叹曰：‘真苦心读书人也’。雍正九年，奏河南水灾，忤总督田文镜，文镜奏侍郎子胡基孟本异姓，不当冒官卷中试。诏斥基孟，侍郎亦落职。乾隆元年，事白入覲，复原官，并复基孟举人，然亦被诬六年矣。”可见，胡氏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较为正直的官吏。

校者星桥，是顾宗泰的号，顾氏字景岳，元和人，乾隆进士。西溪是罗为庚的号，罗氏为南充人，康熙年间为乌程知县。梦楼是王文治的号，王氏字禹卿，丹徒人。乾隆进士。

《韵玉函书》以胡氏为主要撰作人，同时也包含了星桥、西溪、梦楼等人的心血，可以说是集体研究的结晶。

一、《韵玉函书》的稿本

《韵玉函书》共有两种残卷。第一种残卷可能为初稿本，存6册，卷数不明。页11行，行24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墨印栏格纸。书中浮签甚多，墨笔补注，注文当出自顾宗泰（星桥）之手。朱笔校正文本，当是西溪、月泉手笔。此本存上去声，共有52个韵部（上声29个韵保存完整，去声还存23个韵部）。

第二种稿本为增改本，存9册（与初稿本6册加起来，全书共存15册。因此，增改本在对册数编码时，是承初稿本而来的，即增改本残存的第一册被编为第七册，其余照此类推）。页11行，行24字，小字双行，白口无栏格。第十五册（去声下）题“西溪校，梦楼校过”。书中间有浮签墨笔校注（只有第七册即增改本第一册用朱笔校注），全是顾宗泰手笔。增改本平上去入四声共残存90个韵部（其中有4个韵的韵目字已损）。

将两种稿本总括起来，可以看出，《韵玉函书》全书共分平声30个韵，上声29个韵，去声30个韵，入声17个韵，共106个韵，与平水韵的韵数一样。可见，此书是在平水韵以至清初的《佩文诗韵》的影响下写作的。

据我们的考察，在初稿本之前还应该有一个“原稿本”。因为十一震韵的“涎”字，初稿本内有浮签曰：“注中韵略，原本有‘或作涎误’四字，或照写”；又如十三问韵“近”字，初稿本注为“附也，新也”，有浮签曰：“小注中附也、新也，新字误，应改亲字，查原本也写错”。这两处“原本”字样都是写在初稿本内浮签上的，所以可以肯定在初稿本之前还有一个稿本，而且这个稿本也是《韵玉函书》的校者们见到过，并在校注时以之作参考的。至于初稿本四寔韵的最末处有一浮签，末句有“俟有原本再核”，可能这时校者手边一时没有“原本”，要等有了原本再核实。据我们的估计，这个所谓“原本”，也可能就是胡煦的第一稿稿本。可惜，这个“原稿本”没有保留下来。

二、《韵玉函书》的内容及体例

《韵玉函书》全书分为韵图和韵书两大部分。

韵书是主体，韵图是韵书列字的纲领。这两部分的体例及内容如下。

1. 韵图部分

在初稿本书前，有一个韵图，实际上是一个音节表，书中称为“诗韵”。这个韵图以刚、柔来统领各字母（声母），刚、柔被分为少、太两种，它们所管辖的字母分别是：

少刚：见溪群端透定帮滂并明来

太刚：精清从心邪

少柔：疑知彻澄娘照穿审禅

太柔：非敷奉微晓匣影喻日

再按声母的清浊分为阴阳两类，清属阴，浊（及次浊）属阳，即：

阴少刚：见溪端透帮滂

阴太刚：精清

阴少柔：知彻照穿

阴太柔：非敷晓影

阳少刚：群定并来

阳太刚：从邪

阳少柔：疑澄娘泥禅

阳太柔：奉微匣日喻

阴阳刚柔的说法，显然是受了宋人邵雍、祝泌等人阴阳数理和《易》学的理论影响的。邵氏把语言中声音调配说成是“天地之变化交”，而把音节的拼合（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说成是“阴阳之感应合”，祝泌更从“数”方面来阐发邵氏的理论。明代的吕坤、乔中和等人受影响，也从阴阳术数的观念来论述音韵。乔中和在韵图中就用语音来牵合律吕、阴阳、刚柔等说法。

胡氏在韵图中以声调来统韵部，按韵统声母，以“阴少刚”、“阳少刚”等来统领各个小韵。每个小韵首字前注明刚或柔、字母、等第。小韵前注明字母、等第的作法是沿用《五音集韵》而来的。首字下面注明反切。如“公”这个小韵首字前就注明“阴少刚，见一”，“公”字下面注明“姑翁切”。每个小韵之下列同音字，如“公”这个小韵首字下就列出同音字“功工攻缸缸工蚣”等。韵图对所列韵字一般都不释义。有的韵字注明又读，如“攻”下又注“去送”（即又读为去声、送韵）。所注的反切不是完全沿用《切韵》、《广韵》而来，很多是采用清初李光地、王兰生编撰的《音韵阐微》的切

语，还有些是作者自造的。如“东”韵用“都翁切”而不用“德红切”。这应该是按当时的实际语音重新修订的反切，因为当时的语音平声已分阴阳，所以这个韵图中的平声清音声母字都用阴平字为反切下字；又如“通”用“秃翁切”。浊音声母用阳平字为反切下字，如“同”用“徒红切”，“笼”用“卢红切”，“蒙”用“模红切”等，从而使阴平与阳平界线分明（“翁”字用为“公”、“东”、“通”等韵字的反切下字，可知清初“翁”字仍读oŋ，还没有变为现代普通话所念的uŋ）。

这个韵图分为五个部分：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上、下平各辖15韵，上声辖29韵，去声辖30韵，入声辖17韵，与后面的韵书部分相同。

韵图部份对韵字除注明反切外，有一些字还注明“协用”、“借用”。所谓“协用”是指用相邻的韵的字为反切下字，如“追”注为“猪龟切，协用猪威切”，“追、龟”皆在支韵，而“协用猪威切”之“威”则在相邻的微韵。所谓“借用”主要出现在平声里，指同韵的字而有阴、阳平之间的相互借用。如“资”字注“疾资切，借用层时切”，两个反切下字“资、时”就是阴、阳平的关系；同时，借用之音与“慈，层时切”相同，说明“资、慈”二字有时又读为同音。另外还有“支”这个阴平字与“时”这个阳平字相互作为反切下字的借用情况等。

在韵图部分，除了注音之外，有时也引用《广韵》、《集韵》、《音韵阐微》、《同文铎》、《说文》等书的解释作一些简要的说明。如“袜”字注：“《广韵》袜肚，《集韵》所束衣也”；“邨”字注：“《说文》忧也，一曰鲜少也，《广韵》分赈”。象这样释义的词不多，而且主要对象又是一些难僻字。从总体来看，韵图部分是不释义的。

2. 韵书部分

《韵玉函书》现存的两种稿本的体例一样，都是按照韵图这个纲领来逐一释字的。韵书也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个部分。一韵之内分列小韵，每小韵前冠以刚或柔、字母、等第，小韵首字下注反切，然后释义，如“七虞”韵阴少刚见三下收“拘”字，注文曰：“菊紆切，执也，一作𢵿”。“拘”是该小韵的首字，下面列同音字并释义，如：“痼，～倮，音居吕，曲脊也，《庄子》～倮承蜩。又音偃倮，或作倮。跨，跳跃也。《史记》虎賁之士跽～，科头又偏举，一足曰跽～，又手足塞也。俱，偕也，具也。……”

初稿本内所贴浮签甚多，签上说明某处该修改、该增补等内容。增改本内，很多都按照初稿本内浮签上的意思进行了改订。初稿本上所贴浮签没有采用的，往往用朱笔写上“存考”字样。同时，增改本内仍贴有不少浮签，注明“存考”、“待考”或“当补××”，说明有些地方尚待修改、考订。因此，所谓增改本仍是未定本。

三、两种稿本的比较

增改本与初稿本比较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差异：

第一，改变切语。初稿本中的反切到了增改本中许多作了修改。如上声“十一轸”韵的“泯”小韵，初稿本作“弥尽切”，增改本改作“弥引切”；“轸”小韵初稿本作“止忍切”，增改本作“止引切”（这些都是将反切下字换为影喻母字，与《音韵阐微》改良反切的基本原则相合）。又如“二十一马”韵的“假”小韵，初稿本作“简雅切”，增改本作“皆雅切”；“夏”小韵初稿本为“胡雅切”，增改本为“谐雅切”；又如上声“十四旱”韵透母一等“坦”小韵，初稿本为“他但切”，增改本为“妥罕切”；定母一等“袒”小韵初稿本为“徒早切”，增改本为“惰嬾切”。总之，在改变切语方面，有些是改变反切下字，有些是改变反切上字，有些却是反切上、下字都改变了。

同时，增改本还对初稿本的个别反切进行了删除，如“二十一马”韵的“者”小韵，初稿本注“止也切，又章也切”，增改本删去了“又章也切”字样。

另外，增改本还改变了一些声纽的归类。如初稿本上声“十八巧”韵没有“明二”这个声纽，将“卯”小韵归入“并二”纽下，增改本从《音韵阐微》增加了“明二”纽，将“卯”小韵归于“明二”纽下。

第二，改正字形或增注异体字。首先，增改本对初稿本在个别字形上作了修订，如初稿本“鼓”字条下有浮签曰：“鍾鼓，鍾字宜写鐘，从立”，增改本据此改“鍾”为“鐘”。其次，增改本在初稿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异体字，如初稿本在上声“七麌”韵少刚见一“鼓”字处贴有浮签曰：“应如《韵会》另收一鼓字”，又曰：“一从支，一从攴，照《阐微》两收”；又贴有浮签曰：“鼓一字，鼓又一字，两字异义”；“又鼓字从攴，引《说文》云击鼓（笔者案：即鼓）也，今似宜两收为备”；“《同文铎》鼓字从攴，鼓字从攴”。增改本便据这

些浮签所云将“鼓、鼓”二字俱收。

第三，增补释义。增改本对初稿本在释义方面作了增订，使之更为详尽。如增改本在“七麌”韵的“壘”字条下，又添加了“卦名”二字。“十三问”韵的“训”字，初稿本的解释中有“又女曰训”句，有浮签曰：“小注女曰训。按男曰教，女曰训，应补‘男曰教’三字义更足”，增改本据此增加了“男曰教”三字。有些字的解释，校者认为不合适的，也进行了修改，如“十五愿”韵的“褻”字，初稿本注为“卸衣，又花谢……”，有浮签曰：“按注中卸衣花谢二语重复，应酌节”，增改本内便改成“卸甲衣，又花谢……”。总之，与初稿本比较起来，增改本在释义方面确实是更加详备、准确了。

第四，详订引文出处。初稿本中有些引文没有注明出处，增改本则尽量将引文出处补足，使解释更加清楚。如“四寘”韵的“燧”字，初稿本注曰：“塞上亭，守烽火者”。有浮签说：“二句未知所本，宜考”，增改本内便加进了考订的结果，说：“《广韵》注引《说文》曰，塞上亭守烽火者”。又如“十卦”韵的“喝”字，初稿本中引用有“榜人歌，声流~”句，但没有出处，增改本上补明其出处为“相如赋”（案：在《子虚赋》中，李善音一介切）增改本对初稿本中的引文出处有一些仍不能考订清楚的，便在增改本里又贴上浮签注明“存考”、“待考”等字样。这些都反映了校订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五，增加韵字，改变韵字的归类，变动小韵的位置。与初稿本比较，增改本在有的地方增加了韵字，如上声“七麌”透母一等之下增加了一个“稌”字。又如“十五翰”韵内，初稿本内没有收“轸”字，但贴有浮签曰：“轸，《广韵》赤色也，《集韵》大赤也，一曰浊也。按此字可收”，增改本中便收进了“轸”字。增改本在有的地方还增加了小韵，如上声“十一轸”韵见母，初稿本只有见四组一个小韵，增改本据《集韵》增加了一个见三纽的“𪔐”小韵。

增改本还对初稿本中一些小韵的次序作了变动。如上声“七麌”韵下，初稿本将少刚见一的“古”小韵排在第一，见三的“矩”小韵排在第二，增改本将这两个小韵的位置作了调换。这种情况只出现在见一、见三两类声纽中。

以上五点是两种稿本的主要不同之点。此外，增改本还对初稿本的许多错字（主要是笔误所致）

加以改正。如“十三问”韵有“郡”字，初稿本对“郡”的注释中有“又所群聚也”句，有浮签认为“又字误，应改人所聚也”，增改本照改。又如初稿本内对“十四愿”韵之“缙”字的解释写作“缙缙原意，不分离貌”，增改本改正为“厚”字。

四、《韵玉函书》的价值

《韵玉函书》稿本在学术上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韵玉函书》是清代前期的一部韵书，音、形、义各方面收罗及训释甚为详备，它的作者是清代著名学者，其著述对于音韵学有相当重要的贡献。但因该书尚未最后写定，来不及刊行，未能在海内广为传播。因此，本书的初稿本及增改本成了研究此书的主要依据，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本书作于清代前期，是继李光地《音韵阐微》之后出现的一部规模宏大的韵书。它虽然以前代韵书及《音韵阐微》为其仿效对象，但在反映明清以来流行于知识界的书面语读书音方面，有其重要的贡献。它在分韵列字及考定各字的音韵地位、辨识异音又读等方面，有其详备之处，在反切的运用上也有其反映实际读音的准确性。而且，透过这部韵书，我们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清代前期流行于读书界的语音系统的特点和面貌，如平声分阴阳、保存入声等。当然，此书的撰作不无保守之处，不能彻底地跳出旧韵书（如《平水韵》）的樊篱。不过，它以本身的音韵格局，进一步证明了传统读书音系统在清初这一历史时期，还有其存在和流行的实际价值，证明了这个保守的语音系统还不那么轻易遭人抛弃。

此书参考前代的音韵学著作颇多，如《广韵》、

《集韵》、《五音集韵》、《音韵阐微》、《同文韵》等，吸取各书的精华，厘定各书读音的是非。并且，此书以一韵图冠首，使韵书中所蕴藏的音韵系统一目了然，做法与《音韵阐微》及《五方元音》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它与明代章黼的《韵学集成》一样，也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是一部值得珍视的音韵学著作。

第三，本书不单在字音上加以分类排比，按音归类，使各字音读一目了然，而且在释义方面，甚为详赡。对于各字的本义、引申义以至特殊用法，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如此书对“的”字解释说：“按《史记·五宗世家》‘程姬’注，的（案：此字又写作酌），以丹注面，妇人有月事，妨于进御，难于自言，故点以自见。潘岳《芙蓉赋》‘丹辉拂红，飞须垂的，斐披赫赫，散焕熠燿。今王注谓妇人面饰，一作酌。此字原丁历切也。王粲《神女赋》：‘施华的兮结羽仪，原系本音，应入锡韵。王注盖未详审耳’。可见，此书编撰者或校定者对某些字的音义多采用审校辨析的态度，这些训释对于训诂学的研究有颇大的参考价值。另外，此书对字形之间的通同违异，也多有辨正，如对“阁”字，明张自烈《正字通》注“亦作阁”，此书对这种说法加以辨正，说：“《康熙字典》亦引《正字通》‘阁阁相通之文，然细加考订，究属沿袭舛论，非确有此据也。且阁阁既为一字，不必两收。”作者并指出阁字入药韵，阁字入合韵，分属两处，不宜视为异文。这些都是编者及校者深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我国训诂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陶原珂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提高我国国民素质

王 蕙 余洁薇

“人的素质是以个体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稳固的性质”。^①国民素质则是指一国公民整体素质的状况或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素质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可变性，体现着稳定性与可变性的辩证统一。构成素质的基本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然而，作为素质的具体内容却是可变的，这种可变性表现为：不同的个体，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思想品德、文化技能、身体与心理等方面的素质会有高低优劣的差别；时代不同，素质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越高，对社会成员素质要求的面愈广，具体要求愈细，层次愈高。对人的素质要求还会因国家而异，各个国家受各自的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状况的制约，对公民素质的要求必然有所不同。因而，素质具有时空性。

素质的时空性，决定了素质教育必然要根据一定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对新一代施行基本素质的教育。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里，生产力具有机械化、自动化、集体协作等特点，除了对人的素质如知识、能力、体力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外，对人在现代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掌握，对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心理适应和心理承受方面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现代社会的这些要求，决定了在今天的社会里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必须进行公民意识教育。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向来是人们回避的问题，这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今天，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改革，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必然也越来越高，进行公民意识教育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培养人才素质的模式尚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那么，今天仍然固守这一模式，必然带来以下一些弊端：

1. 无法培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合格公民。

由于公民意识教育一直以来得不到重视，我国国民素质出现了缺口。例如，我国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毕业生不懂法的现象比较普遍，爱护公共财物和维护公共秩序的意识较差，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等。同时，心理适应能力与社会要求也有一定的差距。据一份关于中学生心理适应能力的心理学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心理适应不良的中学

生占学生调查总数的42.9%，其中重点中学学生心理适应水平低于非重点中学学生。这里的心理适应包括学习态度、精神健康水平、人际适应能力、对自己的态度、性心理水平。②

2. 忽视公民意识教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使教育不能更好地为经济中心服务。

如果说德育具有经济功能的话，③属于德育范畴的公民意识教育更体现着德育的经济功能。从我国企业整体水平来看（包括珠江三角洲大中型企业），现在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工人文化素质的要求都停留在有一定专业技术知识和一定操作能力这一水平上，而对思想品德的要求却比较迫切。我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大中型企业进行的人员素质方面的调查表明，就1985年以后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的素质情况而言，企业普遍认为目前在大中型企业中的初、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技术水平尚能适应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但是，工人的思想品德方面的表现与企业的要求则有一定差距。企业对初、高中毕业生最不满意的方面是：工作不安心，是非辨别能力差，缺乏责任感，对社会运行机制不熟悉。在多份问卷中可以看到，企业认为在品德方面的重要程度依次是：责任感、团结协作、进取心、遵纪守法、文明礼貌、谦虚谨慎。在调查中，有些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宁愿要思想品德好一些，文化知识差一些的工人。他们认为，具有责任感、进取心、遵纪守法等品质的工人在工作中更具主动性、灵活性和协作性，同时，在工作中会加倍努力学习，从而弥补了知识技术上的缺陷，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众多企业正努力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发达城市逐步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社会必然对全体公民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公民意识教育会具有更深远、更现实的意义，也必然会成为提高国民素质至关重要的方面。

3. 忽视公民意识教育，还会使德育工作无法落到实处。

一直以来，我们的德育内容着重观念、意识的灌输，强调政治思想的指导作用，忽视公民意识教育。而学生对事物、观念的理解，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经验获得的。生活中的经验与比较理想的观念有着一定的差距，何况在学生的现实生活中，政治并不在他们理解的经验的范围之内。因此，学生必然感到社会现实与学校所宣传的相差太远。德育内容强调政治的影响本无可非议，但如果认为德育全部地、直接地为政治服务，则失之偏颇。事实上，德育部分内容是调节社会的一般关系，并不直接从属于政治，但如果我们都从政治角度去解释，就会使学生感到不可理喻。公民意识教育着眼点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有理想文化的成份，但它对理想文化的解释又建立在社会的真实性上，这样就比较容易令人信服。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才可真正全面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才可使教育较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

（一）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

公民意识教育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青少年身心施以一定的影响，使之理解和掌握现代社会所有成员所应共同遵守的准则规范和共同享有的基本权利，养成与现

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

我们强调公民意识教育是基于要使受教育者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一社会基础的。现代社会具有如下特点：(1) 现代社会是法治的社会，这与古代社会也谈论法律是绝不相同的，在这里法律的先决条件是人人平等。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所必须遵守的社会秩序在大工业生产之前是不存在的。(2) 现代社会还是共同协作的社会。大工业生产的兴起，使劳动者从个体劳动转向集体协作的劳动，这决定了劳动者之间必须团结协作才能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3) 现代社会还是快节奏的社会，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处在较为紧张的状态。(4)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要求每一个公民既具有国家意识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又必须具有与其它民族交往的常识、礼仪、心理包容性以及具有全球观念。现代社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社会公民必须认识和适应了这些特点才可较自如地生存，才可促进社会发展。

遵守一定社会的行为准则规范，承担社会义务与享受应有的权利这两者是相通的，只重视任何一方或忽视任何一方，都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我们强调“具备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这是因为：第一，从观念的理解到行为的把握，是一个心理过程，这需要动员心理各要素的配合。无论认识、情感、兴趣、意志以及能力、气质等，只有处在平衡稳定的状态下，人们才可能实现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第二，紧张的社会生活本身需要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能力进行调节，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突出、重要。

因此，凡是以培养现代人具有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意识、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为目的的教育内容，都应该归属于公民意识教育的范围，具体包括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法制教育、公民心理品质教育、公民社会责任感教育、公民行为规范训练以及人文精神教育等。

(二) 公民意识教育与德育的关系

德育的基本功能就是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还是道德品质教育都在执行着这一功能。从这个意义出发，公民意识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

一直以来，教育界尤其是理论界忽视了公民意识教育在德育的地位，人们谈的德育只停留在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这三方面。但实际上，这三方面无法代替公民意识教育。可以说，公民意识教育的部分内容与符合现代社会那部分道德品质教育内容是一致的，重叠的；公民意识教育的哲学基础、政治和社会观念，与政治、思想教育中部分内容是一致的。但是，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的相加并不等于公民意识教育。这是因为：

1. 公民意识教育与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的着重点不同。公民意识教育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素质为目的，强调的是以现代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也谈

时代特征,但其体系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的衍化,有着更广泛更深层的伦理、哲学、政治以及民俗基础;公民意识教育不仅仅是意识、观念灌输,而且强调心理品质与行为、技能的养成,比较注重意识、观念的外显。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尤其前两者,虽然也注意行为的培养,但更强调观念上的获得。

2. 公民意识教育与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发挥的功能也不同。公民意识教育能够使智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但这与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对智力的导向作用不同:政治思想教育导向的是政治,是为某一集团政治服务的,以政治统帅一切;而公民意识教育导向的是社会生产力,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公民意识教育能够进一步激发人的智慧才能,如协作精神、责任心、义务感等,比较着重人的内在力量的激发,从而使人的智慧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也以协作精神、责任心、义务感为内容,但强调的是服从。

3. 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与由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构成的德育内容有所不同。公民意识教育所包括的内容要比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所指向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公民意识教育除了包括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中与现代社会相符的那部分内容外,凡是以培养现代人具有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意识、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为目的的内容,都纳入公民意识教育的体系。因此,人文精神的教育、环境教育乃至世界史、世界地理等方面的教育都可能成为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

公民意识教育强调德育内容的现代性、社会性,并不排斥本国的民族性,相反,总是吸纳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为现代社会所用。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意识教育都是从本国文化传统自然延伸出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德育内容,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例如,新加坡在公民意识教育中注入儒家伦理思想和新加坡各民族信奉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的宗教内容。台湾除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外,还针对中华民族的弱点,提出群育。

如果我们把过去一直强调的以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所构成的德育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德育的话,传统意义上的德育是适合三十多年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国情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传统意义上的德育已经没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仍然僵化地把传统意义上的德育内容用于变化发展了的社会,必然使教育无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从而束缚、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因此,要使教育真正适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改革德育内容,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强调公民意识教育,并不是完全否认政治思想教育的现实意义。如前所述,公民意识教育实际上包含着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中与现代社会相一致部分的内容。当然,公民意识教育可能更强调这些内容的操作性成份。强调公民意识教育并不排斥政治思想教育的另一原因是:公民意识教育是面向每一个社会公民的教育,任何一个人只有在成为一个良好公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正确的思想觉悟;才可能更

好地发挥他的政治作用。连公民都当不好的人，怎么可能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觉悟呢？

（三）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现状

公民意识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已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是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和企业，越能认识其重要性。上海、广东等地因此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阶段设置了《公民》课程，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建国四十多年间，公民意识教育未受到应有重视的现实。就以代表最新的课程改革思想的《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来看，它的教育总目标强调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未充分体现公民意识教育的精神。在小学、初中的培养目标中虽然也提到了公民意识教育的一些内容，如“五爱”、“集体主义”、“讲文明、懂礼貌、守纪律”，但仍然从德育的政治功能去理解，仍未放到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社会基本观念、意识、行为这一层面上。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实际上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趋势。例如美国开设的公民课、日本的社会科、法国的公民教育课等，无一不体现着对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视，强调公民意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不少国家都强调国家意识、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认为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关键，是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与我们处于同一传统文化背景的台湾、香港，在教育的目标上也十分强调培养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民。

香港“中一至中五课程指引”中提出：“教育的宗旨是把学生的潜在能力尽量发挥，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帮助学生为接受正规教育后的成人生活作好准备，使他们可以继续学习新事物，懂得如何应付转变、享受充实生活、做个身心健康、知识广博、乐于承担责任和乐于贡献社会的香港公民”。④

台湾国民中学课程标准提出：“以培养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的健全国民教育为目的”，为此，要辅导学生达到九个目标：（1）陶冶民族意识、爱国情操以及互相合作、服务社会的精神；（2）养成修己善群、守法负责、明礼尚义的优良品质；（3）锻炼强健体魄、增进身心健康；（4）增进运用语文、数学的能力，充实生活所需的知能；（5）培养善用公民权利、克尽公民义务的观念与能力；（6）增进认识自我，了解自然环境与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7）养成勤劳习惯、陶冶职业兴趣；（8）发展思考、创造及解决问题的能力；（9）培养审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养成乐观进取的精神。”⑤

比较三个教育目标，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强调的是培养服从社会的人才，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香港、台湾却强调培养人才要适应和发展社会，从而也发展自己，所以在教育目标中，香港、台湾都强调适应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的培养。在台湾的九个辅导目标中，有五个目标〔（1）、（2）、（5）、（6）、（7）〕直接指向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而其余目标也无不渗透着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

怎样开展公民意识教育呢？公民意识教育要真正加强，首先必须从人们的思想上彻底清除“左”倾思想的束缚、正确认识公民意识教育在德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具体实施中，要注意显性教育方式与隐性教育方式，专门课程与课程渗透，说理与导行等方面相互结合。

显性教育方式可包括系统的理论教育、班团队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显性教育方式尤其是理论教育，对学生形成公民意识，起着奠基和导向的作用。同时，学生自觉参与各种富有教育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班团队活动，不但有助于他们深化知识、丰富情感，而且为知与情的结合，为学生的认识转化为信念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此外，社会实践有利于学生的心理换位，促使他们摆脱个人狭隘利益的束缚，摆脱对社会的旁观态度，具有“参与”意识，形成主人翁精神，养成以主人身份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习惯，提高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

隐性教育方式是指把公民意识教育贯穿和渗透于各科教学及课外活动之中。它侧重于通过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方式、巩固并完善学生所必需具备的最基本的公民素质。这种方式因教育者角色的淡化而较容易被学生所接受。这种方式还能使学生在交往和活动中吸纳的社会文化特质，经过个体的过滤，在身心结构中积淀而成相对稳固的个性心理品质。隐性教育方式是使个体获得的思想品德、文化科学知识、劳动技能等最终转化为个体稳固的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它能使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各种素质，深深地扎下根来，成为学生心理上稳固的基本品质。

公民意识教育的专门课程是公民课。按国家教委1988年颁布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教学大纲(草案)，初一级开设《公民》课。80年代末上海市制订的中小学课程改革方案，则规定整个初中阶段设置《公民》课程。公民课担负着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公民理论知识教育和行为规范训练的任务，对形成学生的公民意识及社会行为规范，使他们熟悉并适应社会生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无疑具有奠基和导向的意义。在公民课教学中，应把说理与导行结合起来。要把知识转化为观点、信念、能力，实践活动是个重要环节。教师可以设计某种情境，或安排课内外训练的项目，让学生具体练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并不仅仅是开设某一门课程的问题，而应贯穿学生成长的整体环境，学校、家庭、社会应该自觉担负起教育的责任。成人既要当好青少年学生行为实践的指导者、监督者，更要成为年轻一代的示范者。这种良好风气必将大大提高公民课行为训练的效果和效率。

①《广州教育》1992年第六期，郭巧智《向素质教育全面推进 深化教育整体改革》。

②《社会心理研究》1992年第二期，杜玉庆等《中学生心理适应情况的调查报告》。

③《教育研究》1992年第八期，鲁洁《试论德育的经济功能》。

④⑤《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教学大纲（初审稿）与香港、台湾初中教学大纲比较》中的《总纲的比较》，苏式冬著。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可贵探索

——评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

陈 跃 飞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令人困扰的现实问题。在内忧外患的强烈挤压之下，怀抱经国济世之志的思想界，急切地提出了种种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全盘西化、变器卫道、西体中用、民主共和、回归传统、复兴儒学、“彻底重建”、中魂西体、综合创新，等等。可谓百家争鸣，殊途而不同归。这刚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要实现现代化，面临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诸多难题。李宗桂的新著《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李著），正是对这个难题的富有理论勇气和时代使命感的正面回答，也是对近代以来文化批判文化重构工作的理论总结，更是对10年来文化讨论的总结性研究和批判性超越。

关注文化研究的人都意识到，1989年下半年以前的文化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否定性思潮占据主导地位；1989年下半年开始，大唱赞歌、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成为主流。质言之，前段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西化”倾向，后段显现出较为浓厚的“崇古”色彩。如果从科学理性的严格立场考察，“西化”和“崇古”都是单线思维，都是应该破除的文化现代化的思想障碍。因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这是至为明白的道理，而“崇古”则是往后看，与“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价值取向迥异其趣，也是不言而喻的。李著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力求突破上述二者的弊端，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高度，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紧紧抓住“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高屋建瓴地审视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出了重构中国文化的一系列

崭新观点，全书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气息。李著开宗明义：“鉴往为了知来，批判为了创造，重构为了复兴；超越情绪，以理性态度对待中西古今文化冲撞，破除偏执，用开放心态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书中指出，文化批判“是对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是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点上，对民族文化遗产作客观清理和现代转化的前瞻式的创造性工作，而非简单的政治否定”（第4页），而“价值重构是立足现实，用现代文化意识鉴别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予以现代意识的批判，并结合本民族的条件和时代条件，创造出现代新型文化价值系统，作为新时代人们的精神皈依”（第4页）。从全书框架结构、理论阐释和内容分析看来，李著始终着眼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特别是当代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创建，细致探讨现代新型文化的精神方向，落脚于“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模式和特征”的探究，从而把中国文化的出路真正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点上，这实现了李著的科学态度。

文化问题包罗万象，文化研究各显所长。李著的显著特点，就是富有创意。它从繁茂芜杂的文化现象中，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繁杂背景中，选取了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这个关涉民族文化命运的重大课题，以思想文化为研讨对象，探讨中国文化出路，这就显示出李著在选题上的匠心。更为重要的是，李著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未发的论点。它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在告别古典主义，增强现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的逐渐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中国文化的变迁，在近代走的是由器而道的渐进变革路径。

在现代,走的是道器并举,重道轻器的激进的革命道路。出现了守旧、改良、革命鼎足为三的文化态势,存在着西化、马列、新儒家三大学术思潮,采用的是“以反求正”的激进方式达到渐进的改良(第20页)。书中还指出,迄今为止,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其重要原因,在于“唯政治化思维”的泛滥。用政治代替一切,把政治第一歪曲成“政治唯一”,这种“唯政治化思维”,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危害至深(第153—162页)。反思建国以来文化建设遭受的诸多磨难,我们不得不由衷地认同李著这个论断的深刻、精辟和创新。李著还指出,由于唯政治化思维的干扰,思想文化的建设问题,直到中共十二大,才真正从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并且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第149页)。细读李著的阐述,我们感到,它对建国以后文化建设得失的史实描述,是客观准确的,分析也是中肯的。李著还指出,建国以后直到今天的关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有着明显的缺陷。按照流行的解释,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文化建设有意无意地被包罗在‘思想道德’建设的范畴之内”,而所谓思想道德的建设,基本上被分解为政治理论和伦理规范的建设,思想文化的建设没有一席之地,“被遗弃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之外,……令人感到遗憾之至!”正因为如此,李著大声疾呼,“加强思想文化的建设。”(第167—169页)这些,充分反映了李著的创见,同时也体现了李著的时代使命感和理论勇气。此外,李著对于在学术界流行并且自己认同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肯定其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它认为,综合创新论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选择模式,只是提出了初步的思想原则、价值观念和理论框架,“但还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内在构成和模式特征作出具体的说明”(第231页),也就是说,综合创新论只是一种文化发展模式的方式选择,而不是文化模式本身。大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著花了相当篇幅(整整两章)细致探讨了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它指出,现代新型文化的精神方向,在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结合,要坚持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更新文化传统,依靠拓展价值领域而提高国民素质,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不可偏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体(社会主义价值系统)三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维文化观,立足现实依托传统而融合古今,以我为主兼取众长而含摄中外,以此铸造出充满活力的开放的文化价值系统。李著这些观点,人们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们透过近年纷然杂陈的文化论著,确实可以看到,李著是一部创见甚多的力作。

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子:史料的清理或理论的建构。沉迷于前者,容易导致冗杂琐碎;偏执于后者,则容易流于空疏。李著超越了这两者的偏颇,把历史与现实、材料和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且牢牢地系于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这个主题上。全书从“传统论题的时代转换”入手,直接切入主题,转而回溯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历史,用活生生的材料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艰难曲折。进而,李著辨析了建国以后的文化建设得失,展望了现代精神文明的终极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李著详尽地解析了文化讨论中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种种主张。同时,又将眼光投向港台和海外,剖析了自由主义者、全盘西化者、复兴儒学者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构想。为了寻找现代新型文化的活水源头,李著在审度古今、辨析中外、综观全局以后,提纲挈领地勾勒了当代中国文化现状,进而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的问题,提出了一家之言。可见,李著无论在体系结构上,还是理论阐释上,都有着内在的严谨逻辑,都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因此,学术界一些莘莘大家称赞李著“体大思精”,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并努力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高水平的专著”,可以说是言之有据的。

作者单位: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生



南海市中旅集團公司

CHINA TRAVEL SERVICE GROUP
CORPORATION OF NANHAI CITY



云影琼楼依山傍水、清逸优雅，是阁下商务、旅游、渡假的理想场所



南海市中旅集团公司按“四星级”标准建造与管理的酒店——云影琼楼

南海市中旅集团公司管理的三星级酒店
——西樵山大酒店



设计独特的宴会厅——富豪轩



地址：广东省南海市西樵山

电话：686799 图文传真：686545 电挂：0688 邮码：528211

ADD: XIQIAO MOUNTAIN NANHAI CITY GUANGDONG

TEL: 686799 FAX: 686545 CABLE: 0688 POST: 528211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者：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电话：3345916 邮码：510050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01044号
邮发代号：46—64 定价：每册2元

国外代号：BM262 北京260信箱